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1/t260/0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高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5号)

长沙市潇湘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期刊登记证第125号

1985年10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4,000 印张: 5.87

印数: 1 - 7,000 定价: 1.25元

目 录

回顾湖南和平解放·····	周 里 (1)
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部队整编经过·····	唐天际 (15)
参加整编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部队的回忆·····	钟明彪 (36)
接管湖南省财政厅的片断回忆·····	欧阳迁 (44)
解放初期湖南教育事业接管经过·····	刘寿祺 (53)
解放初期的周南女中·····	陶萧生 (65)
挥戈南下 解放岳阳·····	郑百年 (71)
南下湘北 接管益阳·····	郭清文 (77)
回忆解放初期益阳地区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史 平 (86)
平江接管前后的回忆·····	梁书文 (92)
回忆对湘潭财经的接管·····	杨 恺 (97)
我所知道的新化两次解放·····	刘道源 (102)
接管宁乡史事片断·····	周德民整理 (109)
武冈解放的点滴回忆·····	李守义 (114)
回忆锡矿山的护矿迎解斗争·····	颜述之 (117)
解放前夕湖南海员工人进行的护船保产斗争 ·····	黄曦龄整理 (134)
解放战争时期邵阳地下斗争回顾·····	叶 苓 (140)

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沙兄弟书店…………… 邓晏如(159)

野火春风战太行…………… 穆明德(170)

补充·订正·质疑

对《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中

汤弼中同志一文的订正意见…………… 张季任(188)

对邓晏如同志《忆塘田战时讲学院》

一文的几点补充和更正…………… 罗 余(190)

回顾湖南和平解放

周 里*

湖南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宣告和平解放的。八月四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领衔，三十多名将领联名，发出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起义通电。五日，湖南耆宿和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麟、仇鳌等一百多人，发出响应程、陈二将军起义，拥护和平解放通电。五日晚上，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受到省会人民的热烈欢迎。

湖南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个重大胜利，在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促进了华南、西南、西北的解放，并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原因

程潜、陈明仁二位将军识时势、明大义，使湖南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之所以起义，并非偶然，可以概括为：大势所趋，情理所迫，要找出路，党有政策。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首要条件。程潜一九四八年七月来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时，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并在山东、东北、西北、华北等地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辽

*作者当时任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书记。

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多万人，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被基本消灭。北平由于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守军，获和平解放。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二十一日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以共产党中央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举行和平谈判。这时，全国包括湖南各界，纷纷呼吁和平。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随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广州。五月中旬，武汉解放，白崇禧的二十多万部队败退到湖南。七月，人民解放军向湖南进军，先后解放临湘、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醴陵、常德、安乡等十余县，对长沙取钳形包围态势。白崇禧令陈明仁守长沙，自己则率部退守衡阳、邵阳一线。湖南人民不愿意打仗，迫切要求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起义的。

程潜、陈明仁起义，又可以说是情理所迫，能识大义。他们都是湖南人，湖南兵连祸结，人民受苦受难的情况，他们是知道的。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即发动内战，在湖南强行征兵，搜括粮食，勒索捐税。程潜回湖南时，又值滨湖严重水灾。湖南人民痛苦不堪，如果再在湖南打仗，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更大的损失。再说，程潜、陈明仁也知道，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发动内战是妄图打垮解放军，消灭共产党，以便维持他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白崇禧要在湖南和解放军打仗，也是妄图负隅顽抗，阻挠解放军进占他们的广西老巢。因此，如果替蒋介石、白崇禧去打仗，当炮灰，牺牲湖南人民的利益，是为情理所不容的。

经过三大战役和解放南京后，国民党反动阵营分崩离析，各自寻找出路，程潜、陈明仁也不例外。程潜是一九四八年上

半年竞选副总统失败，七月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当时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任华中“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与桂系素有矛盾，因程潜也与桂系宿嫌甚深，派程潜回湖南主持军政，可以钳制桂系。但蒋介石并不信任程潜，又派一批湘籍黄埔军校学生回湖南掌握实权，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就有李默庵（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黄杰（兼国防部第四编练区司令）。李宗仁、白崇禧则因程潜过去曾反共，又反蒋，回湖南虽任要职，并无兵权，也就减轻了对程潜的疑忌。而程潜由于过去深受蒋介石和桂系排挤之苦，加以对蒋介石的打内战和种种倒行逆施不满，已萌回湘掌握实力、自谋出路之意。随着形势的发展，眼看国民党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了，他更加迫切地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一九四八年冬天，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受地下党之托，与程潜有过一次谈话。方叔章说：“颂公（程潜字颂云），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是去美国，还是去香港、台湾？你一家有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多钱，到美国去不够用，到香港去也花不多久。到台湾去，蒋介石不要你，你和白崇禧也搞不来。怎么办呢？”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说不能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程潜对今后出路考虑再三，他不能打，不能跑，只有和。一九四八年底，他就要程星龄代表他找地下党联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又表态赞成国共和平谈判。陈明仁的情况和程潜有所不同。他过去反共，但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了硬仗后，却被借故撤职，因此对蒋介石不满。白崇禧想利用他，起用他担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武汉警备司令。然而他与桂系并无渊源，跟着桂系走也是没有出路的。他是

程潜早年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又与程潜是醴陵同乡，关系较深，想来想去，还是回湖南可靠些。一九四九年二月，他从武汉调来长沙，兼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在拜访程潜时，就表示愿意在程潜领导下走和平的道路。

程潜、陈明仁要找出路，而共产党又有政策，指引他们走光明大道。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三月五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第三条明确指出：“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则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省工委正是根据国内和平协定的精神，派代表余志宏先后和程潜、陈明仁见而谈话，向他们讲解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阐明出路的。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程潜、陈明仁终于走上了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

二、地下党策动起义的大体过程

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省工委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以及上海局、华中局的指示，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和平解放湖南的。当时，省工委着重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发动广大群众和各界民主人士，开展和平运动；二是加强统战工作，主要争取程潜、陈明仁走和平道路。这两方面工作做好了，上下结合，水到渠成。

八年抗战，日军侵入湖南，湖南人民历经战火以及日军烧杀的痛苦，在日本投降后迫切要求休养生息。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要求和平民主。在省

工委领导下，城市人民以工人、学生为主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农村人民开展了“反征粮、反征兵、反征税”运动。一九四九年一月，毛主席揭露蒋介石求和的阴谋，提出八项和谈条件。蒋介石“引退”后，代总统李宗仁同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这时，湖南各界人士也都呼吁和平，以省参议会为主组成了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四月，国共谈判，和平运动掀起高潮。省工委又领导城乡人民开展了以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四月一日镇压争取和平示威游行学生的惨案发生后，由湖南大学发起，四月七日联合长沙各大、中学校师生和市民一万余人，举行了声援南京“四一惨案”及争取真和平大会，会后示威游行，运动波及全省。四月二十一日，各界人士还组成了“长沙市人民争取真和平联合会”。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挥戈南进。白崇禧妄图继续顽抗，把湖南投入战火。经过省工委研究同意，通过与地下党有联系的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以省会人民团体名义，前往东安县迎接唐生智来长沙，与程潜合作，发动地方势力，进一步开展和平自救运动。五月二日，成立了以唐生智为主任委员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计划各地都成立自救会组织，并掌握地方武装。五月上旬，白崇禧率部退向湖南后，他强调湘桂合作，反对局部和平，采取高压手段，撤销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逼走唐生智，并对程潜施加压力。这样就更激起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中国民主同盟地下组织还发出了反桂系大同盟的传单。七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湖南，为迎接解放而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的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开展。

在开展和平运动的同时，省工委加强统战工作，成立统战小组，由地下党员、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负责，稍后地下党员涂西畴也参加了这个小组。余志宏主要做争取程潜的工作，也

做争取陈明仁等的工作。涂西畴主要做争取中层军政人员的工作。省工委还派地下党员刘寿祺协助陈采夫（国民党联勤总部铁道军运指挥部第一区少将副指挥官）组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简称民促社），在国民党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

省工委经过研究，认为要争取程潜，就要通过接近程潜的人士去做工作，同时要做程潜周围能够影响和协助程潜的军政人员的工作。在程潜回湖南不久，余志宏就和思想进步并与地下党有联系的马子谷商量，写信请在台湾被蒋介石以共产党嫌疑拘押过的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回湖南，做争取程潜和程潜周围军政人员的工作。余志宏又了解到，住在湖南大学附近桃子湖的省政府顾问方叔章，思想比较开明，在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时曾任行营秘书处长，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请他当顾问，他经常出入省政府，可以和程潜无话不谈。于是通过湖南大学教授王啸苏介绍认识方叔章，并通过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动员方叔章去做争取程潜的工作。

程星龄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来长沙后，我和余志宏多次与他见面，商量如何争取程潜。当时开展了两项影响大的活动。一项活动是王家菜园的时事座谈会。一九四八年九月，经过余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商量，组织了一个时事座谈会，邀请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银行界知名人士唐文燮等五六人参加，每周座谈一次，经常在王家菜园蒋昆家举行，也轮流在刘、唐等家举行。通过座谈时事，提高对时局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另一项活动是桃子湖的便宴。经过余志宏的安排，由方叔章出面，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桃子湖他家请了一次客，参加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蓺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接近程潜的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当时人民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战役

的胜利，正在进行淮海战役。大家漫谈时局，认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败，经济困难重重，人心丧尽，和共产党打仗是打不赢的。李达还直率地说：颂云先生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他还谈到蒋介石不会有兵到湖南来，白崇禧可能还要打的，要注意对付桂系，善于自处。事后程星龄、肖作霖、邓介松将这次便宴谈话情况告诉程潜，对程潜有很大的影响。年底，程潜又和程星龄长谈一次，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地下党联系。省工委向上海局汇报了程潜的情况，根据上海局指示，进一步做争取程潜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并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后，程潜赞成和谈，但因共产党提出的四十三名战犯中有他的名字，他对八项条件中关于惩办战犯一条有顾虑，并下令湖南停止征兵。省工委了解程潜这一思想动向后，便通过程星龄、方叔章去做程潜的工作，随即又由程星龄写信给在上海的程潜的儿子程博洪（曾主编进步杂志《时与文》），请他回来做程潜的工作。程潜经过父子谈心，进一步相信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后，消除了疑虑。当时程星龄和余志宏还考虑到程潜要掌握实力，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程潜来湖南后虽然着手整编六个师，但新兵多，战斗力不强。程星龄说他和程潜商量过，想把陈明仁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省工委分析了陈明仁的情况，认为他对蒋介石不满，靠白崇禧也靠不住，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下，他和程潜一道走和平道路是可能的。于是省工委同意了程星龄的意见，并由程星龄取得程潜同意后，通过与白崇禧关系较深的前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刘斐，到武汉见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白崇禧为了控制湖南，保护广西老巢，即表同意。他不知道这是另有计谋，

还打电话征求程潜的意见，程潜当然表示赞同。陈明仁来长沙后，虽然向程潜表示愿跟随走和平道路，但他和解放军打过硬仗，怕算旧帐，顾虑重重，动摇不定。经过程星龄和余志宏研究，又设法把陈明仁的亲信旧部李君九从台湾请来，通过李君九做争取陈明仁的工作。以后并由李君九（第一兵团高级参谋兼第一处处长）、温汰沫（第一兵团经理处主任）担任陈明仁与地下党的联系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程潜提出要见地下党负责人。当时省工委根据向全国进军命令第三条关于签订地方性和平协定的规定，认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南进的形势下，可以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和平解放湖南。于是派余志宏去见程潜。那时余志宏只有三十二岁。程潜对他说：“我看你不象地下党负责的，我要见你们负责人。”余志宏便到我那里，说程潜要见我。那时党中央有规定，地下党负责人不要轻易出面。我还是要余志宏去见程潜，就说他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有话可以对他讲，还可以通过地下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转达。这样程潜才和余志宏接谈。余志宏按照省工委的意见，向程潜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精神，特别是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政策。程潜表示愿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走和平道路。余志宏又代表省工委向程潜提出三条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革命群众。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可以做到，第三条有些难办，因为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特务要抓人，他管不住，但是可以打个招呼，提出抓人要经过他批准。

五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白崇禧的军队退守湖南。在此前后，白崇禧因湖南搞和平自救运动，非常气恼，对程潜不断施加压力。与白崇禧关系密切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

任唐星从中周旋，掩护程潜。但白崇禧仍不放心，想把程潜搞到广州去当考试院长；同时为了控制湖南，撤换一批倾向和平的高级军政人员，安置心腹。四月先免除邓介松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派他的亲信杨缵荪接任。接着又派桂系田良骥接替邓飞黄任民政厅长，命陈明仁接替肖作霖任长沙警备司令。省政府改组之说，一时甚嚣尘上。当时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向新闻界和地下党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地下党通过党和进步力量掌握的几家报纸大造舆论，说程潜这个湖南“家长”不会走，不能走，省政府改组之说不确，起了支持程潜，稳定程潜的作用。

程潜对白崇禧的施加压力难以忍受，便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派程星龄和刘岳厚去香港，商请刘斐回湖南担任省政府主席。刘斐不愿回湖南，并说有陈明仁掌握兵权，白崇禧深信陈明仁反共，认为颂公不过是个傀儡，就不会危害颂公，颂公不必过虑。程星龄在香港还会见了章士钊。章士钊说，毛主席对颂公走和平道路，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不会追究过去在四平街和解放军打仗的问题。他谈到毛主席说过：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会重用他。程星龄回长沙转达了刘斐和章士钊谈话的意思，帮助程潜、陈明仁消除了顾虑，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潜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请省工委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程潜在备忘录中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备忘录中还提出了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

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程潜在备忘录上亲自签了名，盖了章。省工委收到程潜备忘录后，随即特制夹层箴箴藏好，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送给汉口华中局。华中局将程潜备忘录报送党中央后，毛主席于七月四日给程潜复电：“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复电同意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部队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并说已派李明灏到汉口，请程潜派员到汉口第四野战军洽商有关问题。这个复电是批发设在长沙的地下电台转交程潜的。

七月，程潜收到毛主席复电后，派刘纯正（国防部第四编练区司令部设计委员、民促社成员）去汉口与第四野战军联系，要求解放军从速入湘。刘纯正走以前，余志宏和他见了面，并派地下党交通员同去汉口给他引路和联络。这时，党中央派来参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李明灏已经到达汉口，并已派人去长沙和程潜、陈明仁联系。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都是醴陵同乡，曾任程潜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的教育长，也是陈明仁的老师。一九四八年他投奔解放区之前，到汉口会晤程潜。程潜当时是武汉行辕主任，知道他要解放区，表示赞成，并嘱他代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这次他来汉口后，要他的一个有商人身份的亲戚陈大寰到长沙送信给程潜、陈明仁，借用经商口气，敦促起义，另有毛主席勉励程潜起义的信（与接备忘录后复电内容同）密交程潜。程潜和李明灏取得联系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

七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入湖南，解放临湘县。待程潜和第四野战军取得联系并催促部队南进后，人民解放军随即解放平江、岳阳等十余县，进至长沙附近。白崇禧因程潜与唐生智等地方势力联合倡导和平自救，已生疑忌，在长沙发现反桂大同

盟传单后，更为恼怒，想方设法要把程潜搞走。可是要程潜到广州去当考试院长，程潜又不去。此刻形势紧急，他恐怕程潜起义，便逼程潜七月二十一日去邵阳。这天，他亲自送走程潜才放心，自己随即去衡阳。行前他命陈明仁坚守长沙，守不住时再往湘西撤退。程潜走时，要陈明仁代省政府主席，后由广州政府正式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随程潜走和平道路已有默契，当省工委派余志宏向他解释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特别是章士钊传来毛主席的关怀，并和李明灏取得联系后，他已决心起义。但他始终不露声色，一直以反共主战面貌出现，并修筑城防工事，做出一些坚守长沙的姿态，迷惑白崇禧。当白崇禧七月二十一日退走衡阳后，陈明仁即于二十二日召集省政府官员讲话。他说：“我决心不逞个人的意气，而牺牲三千万湖南人民与五十万长沙市民的利益。”“我担保，长沙不会听到枪声。”此时，第四野战军派出的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已到达平江县。程潜派去汉口的刘纯正随代表团到平江县后，即回长沙向陈明仁汇报了和解放军联络的情况，提到湖南方面也要派出代表团，准备和平谈判。陈明仁知道李明灏到了平江，二十七日派程星龄去平江邀请李明灏先来长沙商谈，省工委委员欧阳方也和程星龄一道去平江联系。二十九日，李明灏秘密来长沙。同日，程潜也由邵阳秘密返回长沙。李明灏和程潜、陈明仁一起商谈了有关起义的事情。

这时，湖南和平解放经过酝酿，渐趋成熟。在省工委领导下，长沙市和各地方工委通过地下党组织、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广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党的各项政策，发动群众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针对白崇禧的强迫搬迁，以及为了防止桂系军队、特务撤退时的破坏和散兵游勇捣乱社会秩序，还开展了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

斗争。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湖南的地下组织，也都开展了反蒋反白，支持程潜起义的活动。随即，省、市工委领导成立了长沙市人民临时治安指挥部，由涂西畴任政委，姜和瀛（宪兵第十团团长、民促社成员）、刘鸣球（湘东师管区补充第四团团长、民促社成员）任正、副指挥。八月三日还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筹备会，市工委委员刘晴波任党组书记。随着程、陈二将军起义条件的成熟，长沙市各项迎接解放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八月五日，经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同意，由程潜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仁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兼任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官（十二月一日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政委唐天际）。同日，组成湖南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唐星、代表唐生明、熊新民、刘云楷、刘公武（熊新民、刘云楷潜逃后改为彭杰加、王劲修）。这天晚上，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三八师举行入城式，进入长沙市区，省会二百多个单位的代表到东屯渡迎接，市区居民十余万人夹道欢迎，欢呼湖南和平解放。

八月六日下午，省、市工委负责人，程潜、陈明仁的代表，湖南和平谈判代表团，省会各界代表，到东屯渡迎接解放军和平谈判代表团来长沙。从八日开始，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对湖南和平解放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

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慰勉，称赞“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湖南宣告和平解放后，由于桂系部队和国民党其他残余部队继续顽抗，以及陈明仁的部份部队叛逃，湖南许多地方仍是人民解放军和地下党领导的或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地方武装经过战斗解放的。一九四九年九、十月进行了衡宝战役，并取得消灭桂系部队主力四万多人的辉煌战果。十二月，湖南全省解放。

三、统一战线的作⽤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湖南的和平解放，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毛泽东同志不但策视而且亲自做统战工作。从争取程潜来说，一九四五年重庆国共谈判时，毛主席和程潜互相拜访，对程潜是有启发的。因此，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七十寿辰时，程潜做了七律十二首送给毛主席，其中就有“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揭明光”之句。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潜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送到党中央后，毛主席又亲自复电勉励，这就更加坚定了程潜起义的决心。

省工委是在党中央、上海局和以后华中局的领导下，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经过形势和政策宣传，积极而又慎重地多方面做工作，不仅争取了程潜、陈明仁，而且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协助和支持程、陈二将军，同举义旗。省工委通过统战关系，还及时掌握了许多重要情况。如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向我们提供了白崇禧下达的《武汉撤退及关于尔后作战部署行动计划》的密件抄件，并多次将情一兵团的情况和其他部队动态告诉我们。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的张严佛经过策反后投向人民，将特备准备逮捕的湖南大学进步师生和地下党员的黑名单告诉我们，使这些同志策够安全转移、撤退。他还交给我们一份省内军统特务名单。省工委还通过程潜的关系，免除了几个反动专员、县长的职务，派出了和地下党

有联系的和能够随程潜起义的军政人员担任专员、县长。如陈采夫任第四区（常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蔡杞材（湘东师管区司令）任第五区（益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颜健（民促社成员）任益阳县长，肖道柏任醴陵县长。这样，地下党掌握了许多国民党军政方面的机密情况，争取了更多的地方势力，控制了一些地区和县，从而加快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

地下党能够比较顺利而有效地开展统战工作，是得到许多进步民主人士的帮助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程星龄、马子谷等外，还有曹伯闻、陈芸田、龙伯坚、凌敏猷、汤菊中等，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有的与共产党有渊源，有的一贯倾向进步。他们不仅协助地下党宣传形势、政策，做统战工作，而且在掩护地下党员、支持群众运动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地下党在农村一些地方开展武装斗争，在建立武工队、游击队、两面武装，以及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率部起义方面，也都得到一些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当时湖南许多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是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在白崇禧的嚣张高压下，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为和平解放湖南贡献力量的。解放后，他们又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对这许多的革命有功人士，党和人民感谢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大法宝。我们要更加广泛地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彻底清除“左”的影响，坚决落实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奋斗。

（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供稿）

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部队整编经过

唐 天 际*

一九八四年八月初,我应邀抵湘,在长沙参加了省会各界人士隆重纪念湖南和平解放三十五周年大会,幸会了许多曾经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他们要我写写当时的情况,我是当事人之一,不好推辞。现将我亲身经历的整编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部队的情况记述如后。

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发出起义通电。当晚八时,程潜将军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四野司令员林彪:“潜等业经八月一日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为主任委员。同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并决定第一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官。特电谕查照,并转飭所属知照。”

为接管长沙,中央军委就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的有关事项,于八月五日电示四野:“我军及肖、王入长沙后,应争取程潜及其军政机关留在长沙,以便商量改编接收等项问题。如程潜要求留下一部份亲信军队和他一起留在长沙以为守卫之

*作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政委。

用，应予同意，并告诫我军以礼貌对待，如程潜不愿意则不要勉强。”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并湖南省委：“我军接管长沙后，除成立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外，湖南省政府及湖南军区两机构不要马上成立，即用长沙军管会名义统一指挥已占各县。我军入长沙望注意维持良好秩序，极大注意做好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他们以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然后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

根据中央和军委指示精神，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指示十二兵团、四十六军：“此次我军进入长沙，即不同于一般占领，也不同于北平的和平接收，而是一种起义性质的和平解决。因此，我入城部队除遵守一般城市纪律及城市政策外，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程、陈准备留二三二师于城内欢迎我军进城，该师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师，过去与我们关系也较久。我军进城后，应以团结的态度对待他们，要以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周到的礼节，和蔼的态度去影响他们，使他们从各方面接触我们时，感到严肃而不冷淡，和蔼而不庸俗；

（二）程、陈所属大部分家眷均在长沙，要主动予以保护与照顾，切勿因住房问题或随便没收等而引起不必要之纠纷，要求部队除坚决执行原封不动的政策外，应规定不查清楚不住，未得上级允许不住。市内警戒区域划分，应事先同他们研究，口令及联络记号均应事先规定，以免引起纠纷。”

八月五日十九时，我部所属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由小吴门进入市区。长沙市十多万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大幅毛主席画像，到处可见，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欢迎行列，从五里牌到南门口，汇成一股洪流，人们以欢笑，以希望，向我军指战员致敬。

八月六日二十时，以金明为首席代表，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和我为代表的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从黄花市进至浏阳河边东屯渡东岸。以唐星为首席代表，唐生明、刘公武等为代表的湖南代表团以及长沙各界群众数百人到浏阳河边东屯渡西岸迎接我们。当我们渡河上岸时，前来欢迎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李明灏向人们一一介绍了我们代表团成员，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明灏，是两方面的桥梁。”之后，刘公武也将参加欢迎的官员一一向我们作了介绍。接着，长沙迎解联合会代表梁绮女士，代表长沙人民向我代表团献了“人民救星”锦旗一面，湖南大学代表献了“人民胜利万岁”锦旗一面，并分别致了欢迎词。金明同志致了答词。简朴而热情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由湖南方面官员陪同分乘二十余辆小汽车进入市区，当车队进入小吴门十字路口时，长沙各欢迎单位代表、各界欢迎群众纷纷向我们献花献旗。我们即下车步行，以礼相迎。当我们来到省参议会（现湘江宾馆）住宿处时，长沙市各界民主人士由民主同盟湖南支部负责人肖敏颂率领前来会晤。随后，我四野代表团首席代表金明，湖南代表团首席代表唐星在省参议会大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之后，湖南代表团即在参议会二楼正厅设宴招待我四野代表团。席罢，我们驱车分访了程潜及陈明仁俩将军。

八月七日二十时，程潜、陈明仁俩将军又在省参议会大厅设宴，招待我们，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我军一三八师任昌辉师长、王文政委等。李明灏介绍金明、袁任远、解沛然和我等与程潜、陈明仁见面后，程潜致欢迎词表示：“希望双方代表团诸君，在很短的时间内，协议一个行动纲领，商洽一个配合方案，以粉碎反动卖国面帮的残余，彻底消灭人民的公敌。”接着由金明同志致了答词。席间，宾主互相举杯敬酒，一时觥筹交错，整个大厅洋溢着欢洽精诚的气氛。

八月八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在南门外席草田段宅举行了第

一次会议，商定谈判议程。随后，在衣铺街乐嘉巷唐生明寓所继续举行会谈，具体进行磋商。经双方商定，将起义部队改编成一个兵团，番号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由陈明仁任司令员，集中在浏阳、醴陵一带整训。成立临时湖南省政府，由陈明仁任省主席，袁任远任副主席。原已设立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改称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陈明仁、金明、袁任远、周里、仇鳌、唐星、李明灏和我为委员，李明灏兼秘书长。这些问题，在商谈中一致达成协议，报经党中央核准后，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及湖南临时省政府即告成立，实施领导湖南工作。

整编起义部队前的一个小插曲

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旬，白崇禧令四十八军张鸿文部沿衡宝公路西进，策应在邵阳的陈明仁兵团叛军第十四军向守备邵阳廉桥的程潜起义部队保安第三师进犯，已跟随程、陈起义的保安副司令官彭杰如组织保安部队进行反击，派保安第二师第四团雷观庄部于衡宝一线水东江附近，迎击白的先头部队，首战获利，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后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退至廉桥以西上下马村。与此同时，陈明仁兵团驻湘乡的七十一军，驻长沙、宁乡一带的一百军，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驻益阳一带的九十七军分别向邵阳叛逃，并与驻邵阳的叛军十四军及白崇禧驻武冈的五十八军互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下，彭杰如与副参谋长李铁肖研究，认为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前，起义部队应作好作战准备，利用敌人心虚，急于逃跑的弱点，采取侧击、伏击、尾击各种灵活战法，打击敌人。当即分别电告集中于永丰以西的何元凯师，青树坪以北的张际泰师，新化一带的周笃恭师和祝凯部，以及驻太子庙一带的汤季楠师和保安第四团、独立团及两个大队等，各向当面之敌积极寻求战机，打

击叛逃部队与白军。彭杰如指挥何、张、汤三个师集中各点，互为犄角，协同作战。这时，各路叛军及白部四十八军、五十八军分别开始进犯。何师堵击叛军七十一军一部及一百军的装甲炮兵于永丰以西地区，并在前进时遭遇九十七军一部于谷水附近，先后与叛军激战三次。张师先后阻击了七十一军的一部及四十八军的一部于青树坪一带。彭杰如率领保安第四团、独立团及两个警卫大队堵击叛军一百军及九十七军各一部于田心街以北地区。汤师与一百军及九十七军各一部遭遇于太子庙以北地区，激战一昼夜。周师分别与五十八军交战于新化大桥边及邵武边境的和尚桥两地。各部战斗结束后，据不完全统计，起义部队伤亡团长以下四百余人，俘敌五百多人，缴获敌人长短枪近千支，以及一些其他战利品。这些战斗既打击了叛军和白军的反动气焰，又咬住和堵住了敌人，为解放军开展衡宝战役，实现中央军委将白军主力消灭于湖南境内，不使之逃回广西老巢的战略布署奠定了基础。

这时，我人民解放军已由长沙、常德等地分别进入益阳、安化、宁乡一带，湘潭也已解放。彭杰如急电程潜商请解放军急速南进，与起义部队协同对敌作战。四野对起义部队的处境非常关注。于八月十七日，电令肖劲光、韩先楚：望通过陈明仁的关系，设法继续争取叛军归回，可采取宽大政策。十九日，四野又电告十二兵团：“白崇禧、鲁道源两部兵力集中衡阳、宝庆及其以北地区，可能向我突击部队攻击，盼告陈明仁，要六十三师及其追击部队勿再前进，最好后撤至湘乡、湘潭以北地区待机。由于白崇禧部队向湘潭西岸反击，并向湘乡、湘潭前进，宋希濂部又以三个军的兵力向常德进逼，四野决定诱敌深入，尔后迂回包围歼灭之。”十九日二十一时半，又电令我四十九军直属队“强行军向湘潭、长沙之间前进，并在这一带收集全部船只，供陈明仁起义部队渡江之用。一四五师、一四六师

即进至湘乡，尔后即以顽强之运动防御抗击追兵，掩护起义部队向湘江以东转移。待完成掩护任务后，亦渡湘江以东，以钳制白军，使之不敢向湘乡以北压迫。一四七师应采取勇敢灵活之游击战，向宝庆、永丰之线前进，拖住敌后尾，使敌不敢冒险向湘乡以北前进。待掩护起义部队全部渡过湘江以东后，即向宝庆、新化以西广大地区进击。”这一部署，四野同时告诉了陈明仁，希望他速令各部立即出发，分别在株洲以北、靖港以南地区渡过湘江，在东岸进行休整。已进至宝庆附近的部队，如来不及转移时，则在宝庆、新化以西地区打游击，并告解放军有两个军留在该地区动作。二十日二十时，四野又指示一三八师，要顽强控制湘潭，掩护起义部队渡过湘江，并派出少数兵力向南游击抗击敌人。二十一日，四野向陈明仁通报：

“敌十八日进占永丰后，昨今两日无动作，仅少数部队向前侦察。永丰之敌兵力大约一个师。解放军数日前已占攸县、茶陵、安仁等地。已飭我军在湘乡、湘潭部队掩护贵部向湘江东岸转移。”

在解放军的掩护下，程、陈俩将军在邵阳地区的起义部队六十三师汤季楠部，保安第一、二、三师及独立团，宪兵十团第一营先后于八月下旬渡过湘江，旋即开赴浏阳一带集中整编。

起义部队的整编经过

湖南和平解放前，程潜将军的地方保安部队连同陈明仁兵团共十二万余人，发出起义通电后，截至八月二十一日止，我们所掌握的实际参加起义的官兵人数为77,183人。十月十二日，在邵阳石下江地区放下武器投诚、现定为起义的六十二师尚有五千余人。其中：第一兵团直属单位1,920人；一百军人力运送团1,847人；一九七师9,216人；十九师五十七团2,590人；

七十一军二三二师9,210人；三〇七师9,223人；十四军六十三师9,243人；保安司令部及保安第一、第二师之四、六团，第三师和第四师之第十二团共28,243人；长沙绥署警卫团2,506人；湖南省暂编纵队司令部补充团1,157人；宪兵十团二个营20人；六十二支队303人；十六后方医院530人；九十四后方医院203人；九十六后方医院472人。我们经与起义部队方面协商达成协议，本着改造提高部队这个宗旨对起义部队进行了两次整编。现将起义部队的整编和去向，扼要记述如下。

一、第一次整编。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主席收到程潜起义“备忘录”后，曾亲笔复电程潜谈到：“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七月十八日十六时，军委复电四野明确指出：“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出的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八月三日，程潜的发言人刘伯谦在长沙《中央日报》会客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程潜一日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等呼吁和平的通电。同日，程潜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文提到：“潜等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敬拟权宜之计，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其原第一兵团暂改称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八月五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所提设立由颂云先生领导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可即施行。”

当时，四野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程潜的复电精神，决定由以金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与起义部队方面具体协商整编事

宜。参加协商的我军代表是：金明（首席代表，十二兵团副政委兼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袁任远（湖南省临时省政府副主席）、解沛然（十二兵团参谋长）、李明灏（新政协主席团代表）和任十二兵团副政委的我共五人。湖南地方及起义部队的代表有：唐星（首席代表，长沙绥署副主任）、唐生明（南京政府参军，代表唐生智）、刘公武（曾任省民政厅长，设计委员）。熊新民和刘云楷虽是代表，但已于八月六日随部队逃走，未参加协商会议。前面已简略提到，八月八日，双方代表在长沙市南门外席草田段楚贤住宅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交换了意见，商定了会议的程序，由刘伯谦担任记录，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鉴于熊新民、刘云楷已随部队逃走，起义部队方面改派彭杰如、王劲修为代表出席。又因我们不同意刘伯谦参加会议，程潜便改派毛注青担任记录。这次会议改在衣铺街乐嘉巷唐生明住处举行。

双方协商结果：起义部队仍保留三个军，番号改为第一、第二、第三军；每军辖三个师，番号为第一至第九师；军师长人选由起义部队自行协商决定；官兵薪饷仍按起义前标准发给；起义部队改编后的名称问题，一致意见，沿用已定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官兵均佩带符号。八月十四日，起义部队开始由长沙望城坡等地陆续移驻浏阳县城以南的大瑶，以西的跃龙市，以西北的永安市等处集结进行整编。一切补给则由我军后勤部供应。

在整编期间，我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抽调十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于九月九日前往起义部队，协助整训工作。根据起义部队要求，我军工作团分工以樊仲黎与王振祥带一个秘书去第一军；杨文谟与黄文谟带一个干部去第二军；钟明彪带一个干部去第三军；覃国翰与吕子明留兵团部。他们于十二日下到各军，帮助各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针对起义部队官兵一时对我

党我军政策的疑虑。对部队前途动摇不定的思想和尚存的反动正统观念等，采取以师、团为单位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召开干部座谈会及士兵代表座谈会，集中排以上干部（有时吸收班长、士兵代表参加）上大课，开办干部短期轮训班等方式，进行了五个方面的宣传教育：一是大讲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人民力量的强大，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必败和蒋、白残余武装必败的客观规律，指出只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前途；二是大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美、蒋勾结反对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事实，揭露美帝援华即侵华，推行侵略、扩张的反动本质；三是大讲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独裁反人民的事实，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领导中国人民翻身的历史；四是大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历史与光荣传统、我军内部民主生活制度、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等，指出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在本质上的区别；五是大力宣传人民政协纲领，组织学习人民政协文件，弄清新中国的性质与前途，确立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意义。通过近一个月的宣传教育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初步认识到要归向人民怀抱，必须割断同国民党的联系。不少起义官兵对起义后仍佩带有“国民党”字样的符号，感到是莫大的耻辱。有的甚至把“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符号撕毁扔到厕所里。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将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起义部队整编后的建制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李觉、魏镇、傅正模、唐生明、王劲修，参谋长李觉（兼），副参谋长黄克虎、文蔚雄、王昌烈，参谋处长李昊，副官处长文蔚雄（兼），经理处副处长秦承武、欧阳崇一，卫生处长张如雄，军法处长梁凤，警卫团长陈明信。兵团下辖第一、二、三军。第一军军长王劲修（兼），

副军长文于一、张诚文、康朴，参谋长陈庚，副参谋长阎敦立。该军下辖第一、二、三师。以原一九七师编成为第一师。师长曾京，副师长刘开悦、程杰，参谋长张绳武。原五九〇、五九一、五九二团改称为一、二、三团。团长分别是范广鉴、程杰和张汉恢。以原二三二师编成为第二师。师长康朴，副师长张镜白、谢醒亚、杨光耀，参谋长郑克林。原一、二、三团改称为四、五、六团。团长分别是张镜白、郝世钢和李醒吾。以原三〇七师编成为第三师。师长余九成，副师长李瑶含、薛岗悟，参谋长梅光儒。原十九、九二〇、九二一团改称为七、八、九团。团长分别是李瑶含、游枢和陈显微。第二军军长傅正模（兼），副军长汤季楠、贺光谦、代文，参谋长贺光谦（兼），该军下辖第四、五、六师（第六师只有一个空架子，欠十六、十七、十八团）。以原六十三师、湘东纵队编成为第四师。师长汤季楠，副师长龙其光、陈棋新，参谋长彭志敬。原一八七团、湘东纵队、一八九团改称为十、十一、十二团。团长分别是陈铭、陈尖苗和陈建春。以原宪兵第十团二营、长沙绥署警备团、湖南省政府警卫大队、保安司令部警卫大队、长沙警卫中队、保安司令部警卫第一大队、湖南省暂编纵队司令部补充团编成为第五师。师长姜和瀛，副师长陈立谟、刘鸣球，参谋长孟文楷。下辖十三、十四、十五团。团长分别是程元、姜定华和刘鸣球。第六师师长代文。第三军军长彭杰如，副军长张际泰、蔡杞材、程邦昌，参谋长廖炳凡，副参谋长李铁肖。该军下辖第七、八、九师。以原湖南保安第一师编成为第七师。师长何元凯，副师长漆启宇，原所属部队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团。团长分别是孙堃、夏定华和漆启宇。以原湖南保安第二师和第四师之十四团编成为第八师。师长周笃恭，副师长黄玉谷，参谋长桂次莲。原所属部队编为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团长分别是雷观藏、李宗青和谢成章。以

原湖南保安第三师、保安司令部警备团和湘西纵队等编成为第九师。师长张际泰，副师长唐日高、李谦，参谋长熊彭年。原所属部队编为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团。团长分别是喻森、唐日高和李谦。另设第十师（空架子），师长向承程。第十一师（空架子），师长陈光中。

部队编成后，实有36,681人。其编余人员中一部份送军校培训，一部份作了转业、复原安置。

二、第二次整编。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我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谭政、肖克和赵尔陆联名发电报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将陈明仁部整编为一个兵团两个军六个师的方案。十月二日，中央军委复电四野：“九月二十九日电悉。同意将陈明仁部缩编为一个兵团两个军六个师。其正式番号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下辖第二一四师至第二一九师。”十月五日，毛泽东主席又将他找程潜、陈明仁、李明灏谈话情况用电报通报林彪、华中局并湖南省委。

毛主席通报的主要情况是：“（一）程潜、陈明仁按其现在的表现看来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在我和他们谈话时，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帮助其整训。（二）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六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至二一九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陈、李三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十月十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二人由此动身经武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说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三）为使该兵团及陈明仁起义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

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整编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以上各点大意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根据军委电令和毛主席的指示，我第四野战军发布命令，将陈明仁部队改编之正式番号予以颁布。起义部队官兵得知后，欢欣鼓舞，强烈要求尽早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人民军队的行列。自十一月一日起，部队番号正式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为加强对其改编的领导，四野抽调十三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于十一月初下到陈明仁部队，结合早期下到该部的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工作团干部共同开展整编工作。此次整编分四个阶段进行。

首先对该部队进行一番考察，一方面了解到部队中学习空气浓厚，要求进步的情绪高涨，要求改造的亦很普遍。在第一军，学习成了官兵的自觉行动，形成了学习的热潮。该军二师五团有的战士自己买纸订成学习笔记本，有的战士俩人合购一枝铅笔共用，想方设法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坚持阅读进步书籍，作笔记、抄生字，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均有提高。该团原是文盲的战士，通过学习，均能认识一百余生字。第二军掀起了学习比赛活动，建立了干部每天学习两个钟头的制度，在学习中，普遍提高了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感到不学习，不能进步，也得不到改造，不改造就不够人民解放军资格。第三军坚持每天上午头两个小时搞学习，以一个小时学文件，读书报，一个小时开展讨论。为使学习不流于形式，军里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培训抓学习搞教育的骨干，连队和机关定期举办墙报，反映学习效果，指导学习活动。整个部队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另一方面，通过调查进一步掌握到陈明仁部队的基本特点：第一军第一师，官兵思想较稳定一些，部队中无特殊情况。第二师五、六两个团北方籍人多，班、排长及军士基本上都在东北、华北各战场打过仗，这个部队里军龄长达四、五年

的老兵占百分之八、九十。他们思想较活跃，不怕官长压迫和制止，敢大胆接近工作团同志，四团稍差一些。第三师官兵大部份是四川人，内部有青红帮的封建团体，好凭私人感情用事，乡土观念特别深厚，排外性严重，干部里边的问题不易暴露，下层人物不敢接近工作团同志。第二、第三军大部份是保安部队编成，没有作过战，相对纯朴一些，无特殊表现。第三军比第二军要复杂一些，益阳人多，凭私人感情用人较多。但工作尚好开展。整个部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民主，下层干部及大部分战士不敢讲话。

第二步，实施宣传教育。这次整编的宣传教育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广泛进行整编动员，反复宣讲整编的意义和目的，整编的步骤和方法，使部队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高度集中精力进行整编。二是开展民主运动，主要方法是，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分析形势，摆存在的问题，提改进意见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基本内容是，肃清封建正统思想残余，建立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肃清军阀主义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清除旧军队的种种虚伪性，提倡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民主运动的正常开展，初步打消了官兵的思想顾虑，充分调动了大家投入整编工作的积极性。

第三步，妥善安置编余干部及干部家属。通过整编，陈明仁兵团编余各级干部共2,500名。根据编余干部的具体情况及愿意受训学习的要求，分别送往兵团干部学校、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和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干部教导团等处学习。全兵团有干部家属3,885名，通过动员，对一部分愿意回原籍的家属，由部队发给路费遣送回原籍予以安置。对另一部分家在蒋管区或无家可归者，均妥善安排，使之各得其所。

第四步，举行兵团成立大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在驻地浏阳县城举行隆重的成立大

会。会场周围贴满了“庆祝兵团成立！”“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虚心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尊重政治机关！”“树立官兵团结、军民一致的民主作风！”“彻底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等标语，呈现出一派热烈的气氛。会议由兵团司令员陈明仁主持并宣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首先，兵团政治部主任方正平致开会词。接着，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作重要讲话，陶铸同志说：“各位来宾先生、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今天二十一兵团正式成立。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它向全世界、全中国人民宣布了二十一兵团的全体同志们，在程主任、陈司令员领导下，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是光荣的。这不仅在于敢冒危险、排除困难、坚决举行起义，对湖南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更在于起义后经过学习与自我改造，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自动地抛弃了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番号，坚决地表示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要求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志们，这是不容易的，这是同志们在陈司令员领导下，经过严重思想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陶副主任讲话结束后，程潜主任的代表李明灏将军、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金明、四野组织部长杜平、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黄志勇先后致词。李明灏将军说：“二十一兵团成立，不但是表面上换一个称号和编制上有所革新，而是要从本质上思想上起一个含有革命意义的彻底变化。第一，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统一号令，一切要和其他解放军的兵团看齐，使其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武力。第二，遵守政治工作制度，努力思想改造、生活改造，消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确定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站立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第三，准备接受高度的科学化、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训练，达到国防军的标准。第四，发扬爱国精神、革命精神，保障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捍卫祖国的国土，消灭一切

帝国主义。现在全国快要完全解放，国内战争虽然快要结束，但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消灭封建势力的任务还待完成。关于对反动残余力量的镇压，革命秩序的巩固，生产建设的发展，人民利益的维护，都是需要人民解放军共同负责的。所以我们二十一兵团在今后必须具备上面所说的那些条件，然后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以陈司令员的英勇坚决和各级干部同志的努力团结，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下，我相信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金明同志致词表示：“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在今后二十一兵团继续前进改造过程中，将以最大的努力给以尽可能的协助。第一、省委会将动员一切力量支持二十一兵团，解决二十一兵团在进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根据上级的指示，湖南工农群众经过发动组织起来之后，我们将力之所及帮助二十一兵团解决各种困难与需要。第二、动员湖南所有党领导下的武装，密切与二十一兵团指战员一同努力，互相尊重帮助，并协助迅速在各方面特别在思想上，得到更大的进步。第三、湖南在秋收征粮工作完成后，将有系统做好发动农民，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及恢复与发展农村的生产等中心工作。希望二十一兵团全体官兵全力支持。”杜部长和黄主任也都代表机关，热烈祝贺二十一兵团光荣诞生。上级首长和来宾讲话之后，陶铸副主任代表中央军委向部队授予了“八一”军旗和印章。各级指挥员接过军旗和印章后，我和司令员陈明仁率全体指战员举手宣誓，由我领颂：

“我们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子弟兵，要永远在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执行政府法令，遵守群众纪律，爱护人民利益，团结内部，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消灭封建势力，忠诚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捍卫者，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如有违背，愿受革命纪律制裁及同志的指斥。”全军宣誓后，兵团司

令员陈明仁发言说：“今天我二十一兵团宣告成立。并举行授旗授印典礼，是我兵团一个最可纪念的日子。我代表全兵团诚恳接受各位的指示，永久地保持这个光荣，并庄严地向大家宣布：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踏上光明之路，开始新生了！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子弟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改造，一切都要向其他兵团的解放军看齐！从今天起，我兵团将要成为一支既具有高度政治素养，又具有近代的军事技术的强大军队了！”陈司令员讲话后，我也讲了话。接着干部代表、军长王劲修和战士代表王佐才发言，他们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统一号令下，自觉自新，努力改造，担负起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大会最后通过二十一兵团成立向全国发出的通电。通电原文如下：“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副主席、宋副主席、李副主席、张副主席、高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副主席、周副主席、彭副主席、程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朱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林司令员、罗政委、邓政委、谭副政委、肖参谋长，并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全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首长，各兄弟兵团，暨全国人民与各界人士钧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正式成立了，十二月二日，在湖南浏阳驻地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会议上第四野战军首长陶副主任亲莅指导，将原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所部，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并荣列于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我们正式接受了颁布的军旗、军印，举行了严肃的宣誓典礼。这是我们全体官兵，从起义三四月来，久已渴望的神圣要求。今日一旦实现，全体官兵，莫不欢欣鼓舞，欢声雷动。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我们一件最伟大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唯有我

们从此真正成为人民解放军，才能巩固我们起义胜利；也唯有我们从此真正成为人民解放军，才能使我全体指战员今后继续进步。我们一致宣誓：一定要永远在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加紧学习，努力改造，努力进步，向我人民解放军一切先进的兄弟兵团看齐。一定把自己变成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与各兄弟兵团并肩携手，以担负起今后保卫人民祖国领土主权的神圣任务，并以保障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之顺利成功。际此兵团成立伊始，敬祈各首长，各界先进人士多加指导，曷胜感戴！谨此电闻，并致解放敬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政治委员唐天际率全体指战员。十二月二日。”兵团成立大会结束后，陶铸同志为了加强改编后部队的思想工作，在部队驻地浏阳停留了三天，参加了兵团司令部召开的为期两天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了各级领导干部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汇报，并作了会议总结报告。陶铸同志离开部队驻地浏阳的前一天，还分别约见了各级干部，进行了个别谈话，被约见的干部受到很大鼓励。

起义部队第二次整编后的建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

陈明仁仍任兵团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方正平任政治部主任，樊中黎任组织部长，刘卓群任宣传部副部长，方国任保卫部长，李杰南任秘书长。第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军长由王劲修担任，副政委杨树根，副军长吴林焕，政治部主任钟明彪，参谋长周志飞，组织部长肖泽西，宣传部副部长芦声涛，保卫部长林恺成。下辖三师个，以第一师改编为步兵第二一四师。师长由曾京担任。政委兼主任由蓝廷辉担任。辖三个团，第一、三团合并改编为六四〇团。团长范庆鉴，政委孙永泉。第二团改称为六四一团。团长程杰，政委李

咨哲。第十三团改称为六四二团。团长程元，政委张潜。第二师改编为步兵第二一五师。师长由康朴担任，政委兼主任由江腾蛟担任。辖三个团，第四、五、六团改编为六四三、六四四、六四五团。团长分别是王克恭、米玉金和李醒吾，政委分别是秦国才、李济民和胡德善。第三师改编为步兵第二一六师。师长由张诚文担任。政委兼主任由曹波生担任。辖三个团，第七、八、九团改称为六四六、六四七、六四八团。团长分别是李瑶含、游枢和钟象孚，政委分别是李军、张辛吾和石中白。第二、第三军合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军长由彭杰如担任。调配干部有副政委王振乾、副军长王振祥，政治部主任张太生、参谋长杨文谟、宣传部副部长李树夫、保卫部副部长彭德辉。下辖三个师，以第二军直属队及第四、第五师合并改编为步兵第二一七师，师长由姜和瀛担任，政委由段辉亮担任，副政委兼主任由吕子明担任。第十团改称为六四九团。团长陈铭、政委罗友生。第十一、十二团合并改编为六五〇团。团长陈兴苗、政委李金铭。第十四、十五团合并改编为六五一团。团长姜定华、政委陈福兴。第七师及第九师一部合并改编为步兵第二一八师。师长由周笃恭担任，政委由肖德明担任，政治部主任胡天蓝。辖三个团，原第十九、二〇、二一团合并编为两个团，改编为六五二、六五三团。团长分别是孙焄、夏定华，政委分别是曾韬、张友壬。第二五、二六团合并改编为六五四团。团长喻森、政委蒋干成、副政委赵旭生。第八师及第九师一部合并改编为步兵第二一九师。师长由何元凯担任。政委兼主任王恨，副主任王泽卫。辖三个团，第二四团一部并入二二团，改编为六五五团，团长雷观庄、政委阎振普。第二四团一部并入二三团改编为六五六团。团长李崇青、副政委林立。第二七团及第九师直属队合并改编为六五七团。团长李谦、副政委韩江平。部队编成后，正式隶属于第四野战军建制。

踏上新的征途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编成后，兵团司令部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由浏阳移驻醴陵，第五十二军移驻攸县，第五十三军移驻安仁。全军集中整训。九月，第四野战军从河南军区部队及第十二兵团抽调一批干部及十二个连队共17,731人，补入我兵团，使全兵团由24,789人，增加到42,522人。这年十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二十一兵团广大官兵纷纷请求赴朝。当时正值广西解放不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当地土匪相勾结，人民群众不能安居乐业。中南军区于十二月中旬作出决定，派二十一兵团进驻广西担任剿匪任务。兵团代号是第七军区。五十二军代号是五〇二部队，五十三军代号是五〇三部队。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五十三军番号撤销，军部人员分别补入各师。一九五二年一月，第二十一兵团部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同时将第四十八军军部（含二十一兵团一部）改编为二十一兵团部。该兵团部于十月改称第五十五军。原五十三军所辖二一七、二一八师合并编为水利工程第三师，二一九师拨归五十五军建制。原五十二军番号于一九五二年一月撤销，该军之二一四师改编为铁道工程第九师，二一六师并入二一五师，拨归五十五军建制。一九五三年五月，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并入华南公路工程指挥部。七月水利工程第三师改为公路工程第一师，隶属中央交通部建制。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一九师番号改为一六四师，二一五师划归福州军区建制。一九七一年，二一五师番号改为八十九师。

一、开赴广西担任剿匪任务。

二十一兵团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底奉中南军区命令，开赴广西参加剿匪，担任了广西南部小瑶山及其周围的四十八寨、

同正、隆安、万承、钦廉、百色、天峨地区剿匪任务。任务虽然繁重,但全军指战员感到担此重任无上光荣,部队士气高涨,斗志旺盛,特别是起义过来的官兵,想到过去无功于人民,起义后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是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大好时机。剿匪战斗中,他们在山岳地带作战,爬山越岭,不畏艰难,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积极搜山夜伏,负伤不下火线,勇猛爆炸山洞,想方设法多捉土匪,多缴匪枪,多建功劳,发扬了我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作风。剿匪中,部队严守纪律,模范执行政策,遵守民族风俗习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争取了群众,团结了群众,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五个月的战斗,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据统计:共歼匪30,164名,缴获枪枝37,716支。

二、抽调部队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

荆江分洪工程区域,位于长江中游,湖南与湖北两省接壤处。在旧中国每逢长江汛期,均造成湖南洞庭湖一带与湖北藕池地区十多个县的洪水泛滥成灾。建国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消除水患,决定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从旧的荆江大堤上建成一条新的坚固大堤,又在荆江南岸太平口、藕池口之间、虎渡河以东,开辟一块面积达920多平方公里的、足以分蓄荆江洪水五十亿到六十亿立方的分洪区,因此,除了要加固围堤外,还要新筑藕池口到虎渡河黄山头附近的南堤,加修荆江右堤,虎渡河东的河堤。另在分洪区北端太平口附近,建造一座长达1,054米的分洪区进洪闸(即北闸),在水库的南端虎渡河上建立一座330米的节制闸(即南闸),用来控制和调节虎渡河流入洞庭湖的水量。整个工程由湖南、湖北两省组成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下设工程总指挥部组织指挥施工。一九五二年初,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荆堤加固和分洪区的围堤、北闸和南闸都必须在长江的大汛到来以前,即六月底完成。中央军委、中南军区

发布命令，将二十一兵团部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领导荆江分洪工程建设，我被调任工程总指挥部总指挥。同时，着调二十一兵团两个师计六个团，18,776名指战员，于这年三月底和四月初分赴荆江分洪建设工地参加施工。这些干部战士在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分别参加了旧的荆江大堤加固工程、虎渡河以东分洪区围堤工程和控制与调节虎渡河的南闸等工程建设。干部战士们在紧张的施工中，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顶风冒雨，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劳动中，广泛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这充分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和洪水赛跑”、“不战胜洪水，决不收兵”的响亮口号鼓舞下，攻克了重重困难，加速了施工进度，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六月底，总指挥部召开了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庆祝大会，二十一兵团大批援建指战员获奖立功。如暂编十五团、十六团、十七团三个团9,524人中，有2,567人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或被记功，其中特级模范38人，甲级模范239人，乙级模范412人，记丙等功1,453人，丁等功425人。

程潜、陈明仁俩将军的起义部队在圆满完成上述两项重大任务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它一部份部队合并，于一九五二年十月改称为五十五军，陈明仁任军长。此后，担负着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

(钟德灿、周顺华整理)



参加整编程潜陈明仁 起义部队的回忆

钟明彪*

一九四九年八月，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通电起义，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当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一三四师师长，受中央军委和四野首长的委派，作为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赴程、陈起义部队工作团成员，参与了接管和整编程、陈起义部队的全过程，后来又留在整编后的第二十一兵团五十二军任政治部主任。现将当时情况，回忆如下，以纪念湖南和平解放三十六周年。

工作团进驻起义部队

一九二八年我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先在家乡平江参加扑城斗争，一九三〇年六月参加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几十年来，多数时间是带兵打仗，做军事工作。四十年代初当过几年政工干部。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组织上于一九四四年八月送我到华中党校学习党的建设和统战工作。经过半年学习，增长了党的知识，初步掌握了开展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结业时，部队正待开赴前线作战，组织上分配我任参谋处长，抓军事工作。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到四十五军一三四师任师长，部队南下列过武汉时，也就是八月下

*作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五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现为军级离休干部。

旬的一天，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找我谈话说，湖南的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率部举行了起义，现已将部队基本上集中到了浏阳县城周围的大瑶、跃龙市、永安市等地区，要求我军派人前去接管整编。他还说：程、陈是湖南人，该部队大部份官兵是湖南人，你也是湖南人，回到湖南去，做程、陈两将军起义部队的接管、整编工作很适合。我即根据陶副主任指示来到了湖南。九月五日，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接受了陈明仁数度请求派干部帮助整编部队的要求，初拟方案派覃国翰（原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文谟（原冀东军区副参谋长）、王振祥（原一二六师师长）、黄文谟（原独立师参谋处长）和我共五人组成党组，覃为党组书记。以顾问名义进驻起义部队。同日十八时，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电呈四野，提出我拟先派覃国翰等五人以湖南军区工作团名义准备于八日出发，直接去陈部帮助工作，此去任务为了解情况及帮助初步整训，先抓军民关系教育，逐步建立连队军人俱乐部，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反动罪行，以启发部队的基本觉悟。随即，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又遵照四野关于进驻起义部队工作团可适当增加名额的指示，将樊中黎（原河南军区联络部长）、吕子明（原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蒋干成（原冀东教导三师副团长）、陈松岳（原辽吉二地委军事部长）等四人调入工作团，工作团领导人为覃国翰和樊中黎。工作团在长沙组成后，于九月九日下午五点多钟到达浏阳，十日下午抵陈明仁将军的一兵团司令部。根据兵团部队的要求，工作团以樊中黎与王振祥和陈松岳去第一军，杨文谟与黄文谟去第二军，我带蒋干成去第三军，覃国翰与吕子明留兵团部。分别于十二日下午到达各军，帮助各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见我们工作团只有几个干部，感到人数太少，便于九月十六日亲笔去信给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

肖劲光同志要求增加工作人员。内容如下：“关于我们部队请你派遣大批政治人员来我部指导学习革命理论以达成改造目的的要求，至今为工作关系所限没有实现。我觉得这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也是整个部队人员迫切的要求，当然要的人数太多了，在你们目前可能要考虑。我想在可能范围内的人员，你们一定可能派得出来的。我的意见是：一、请暂在兵团部、军、师、团、营、连各级设置类似政治部的指导机构；二、他们的任务是指导各级建立学习小组、确定学习方法及唱歌等项目；三、我暂时只要求能使部队人员知道要学解放军才有出路，搞清楚了这点，以后改造就容易了。你的意见怎样？请答复代表我来的李副司令员。”

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领导同志根据陈明仁的要求和部队的实际情况，积极向四野反映，提出尽快抽调政治干部去陈兵团的建议。同时指示工作团的同志搞好调查研究，认真掌握部队情况，努力帮助该部把政治思想工作开展起来。兵团兼军区领导考虑到四野不可能马上给陈部配齐政治干部，在工作团工作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于十月十八日作出决定，继续留我们在起义部队工作，并拟定覃国翰，樊中黎、杨文谟、王振祥、吕子明、蒋干成和我在该兵团部队任职。十一月初，四野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将陈明仁兵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的命令，为加强改编工作的领导力量，又抽调了十三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会同我们共同承担整编起义部队的任务。此次整编按我军部队序列进行。但工作团二十多名干部是远远不够的，四野便相继从十二兵团、十三兵团、湖北军区、河南军区、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一军、四十五军等单位抽调了从连到师的各级政治干部五百三十一人。这批干部于十一月十五日在长沙集中，由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组织学习十天，让他们了解基本情况，端正态度，统一思想。然后于十一月底前陆续分配到二十一兵团任职。与此同时，抽

调了八十二名供给干部补入二十一兵团。从此，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供给工作等，都由我军干部担当起来了。十二月二日，起义部队集中在兵团部驻地浏阳县城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授旗授印大会，正式宣告新的兵团成立，并宣布了干部任职命令，我被任命为第五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的基本情况

湖南和平解放前，程潜将军的地方保安部队连同陈明仁兵团共十二万余人。程、陈领衔通电起义时，陈明仁兵团一些部队叛逃，据准确统计，实际参加起义的官兵计77,183人。其中：第一兵团直属单位1,920人（官佐341名，士兵1,579名）；一百军人力运送团1,847人（官佐92名，士兵1,755名）；一九七师9,216人（官佐827名，士兵8,389名）；三〇七师9,223人（官佐837名，士兵8,386名）；十九师五十七团2,590人（官佐191名，士兵2,399名）；七十一军二三二师9,210人（官佐831名，士兵8,379人）；十四军六十三师9,243人（官佐843名，士兵8,400名）；保安司令部及保安第一师、第二师四、六两团、第三师和第四师十二团共28,243人（官佐2,971名，士兵25,272名）；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2,506人（官佐178名，士兵2,328名）；湖南省暂编纵队司令部补充团1,157人（官佐314名，士兵843名）；宪兵十团二个营520人（官佐25名，士兵495名）；六十二支队303人（官佐79名，士兵224名）；十六后方医院530人（官佐249名，士兵281）；九十四后方医院203人（官佐53名，士兵150名）。以及九十六后方医院472人等。陈明仁的部队起义后，由于白崇禧的反动宣传和黄杰到湖南的大肆策动，出现了成营成连逃跑现象。为了稳定部队，巩固起义成果，根据双方和谈达成的协议，将起义部队先改编成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

三共三个军，每军辖三个师共九个师。部队分别于八月底前开赴浏阳县城周围的大瑶、跃龙市、永安市一带集中，等待接管。九月十日下午，我们工作团到达起义部队驻地。当晚兵团副司令官简单介绍了兵团近况。十一日上午，我们参加了兵团司令部座谈会，并与兵团部各处、科进行了接触，下午又参加了兵团的军师长座谈会。从而掌握到：全兵团于九月九日点验，实有总人数为36,681人，其中尉以上军官5,611人（将官103名，校官854名，尉官4,654名）；士兵31,070人（含上士，中士、下士共6,970名）。装备：全兵团实有长枪、短枪、卡宾枪共14,720枝；冲锋手提机枪695枝；轻机枪910挺；重机枪、高射机枪23挺；发射筒、榴弹筒543具；六〇小炮124门；迫击炮、高射炮68门；电话总机58台，电话单机351架；无线电电动机一部；军号734把；骑马21匹；驮炮驯马252匹；载重汽车42辆；小汽车9辆。部队三个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过去长期受蒋的排挤与歧视，官兵对蒋介石、国民党排斥异己极为不满，对白崇禧的歧视也是极不满的，部队中反动的正统思想虽不如嫡系部队深，但也相当浓厚；一兵团部队皆不是陈明仁原属部队，大部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划归陈指挥的，起义后叛逃了一部分，原建制也打散了，一、二军都是起义后重新编组而成的，三军是湖南保安部队编成的；三个军和兵团部的上层人员及大部分团级干部都是湖南人，与湖南封建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高级军官大部分与程潜关系较深，与陈明仁关系较浅；三个军共有上校以上军官86名，湖南人占62名，其中醴陵人占18名，兵团部校以上军官醴陵人更多，全兵团除个别共产党员外，军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起义是由少数上层人物发动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事前均无思想准备，对起义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全兵团单位多、官多、眷属多，兵少。第一军的特点是：三个师都

是含有地方性质的正规部队。一师一团原是山东民团，二师是原西北军部队，三师是四川部队，士兵大部分是北方人或四川人，军官北方人也较多。如三师四川人占全师百分之六十三；二师军官657名中北方人占314名，士兵6,224名中北方人占4,000名，约占三分之二。第二军的特点是：全军都是湖南部队，大部分是湖南人，组成时间较晚，与程、陈关系较深。四师是原陈明仁部六十三师，其中两个团是一九四八年在湖南组成的，五师是程潜警卫部队及地方部队拼成，军官大部分是宪兵团骨干，六师是一个空架子，军官大多数是抗战后退役失业军官，基本上是湖南人。第三军的特点是：全部由湖南保安部队改编而成，过去是县区保安队，逐渐编成保安团、师，历史最长的不过两年，地方色彩和封建色彩极浓厚。军部即原保安司令部的底子，对各师控制力较强，部队与程潜关系较深，军长和副军长都与程潜是老关系。这个兵团虽已建立组织机构，但没有开展工作，部队犹如一盘散沙，思想也很混乱。官佐对我党我军政策表示怀疑；对部队前建没有信心等等。此外大部分士兵对官佐不满，对官佐贪污腐化，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极端反感，要求将官佐调离撤换；部分士兵感到当解放军光荣，要求马上改编，并要求给家庭发给军属证明书；也有些士兵对我党我军的政策有怀疑，担心把他们当杂牌军看待被编散或缴械，不能享受解放军的待遇；少部分士兵雇佣观念极深，政治上糊涂，认为在国民党里也是当兵，在共产党领导下也是当兵，只要待遇好就行，待遇不好就跑。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使我们对起义部队的整训工作，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实事求是。

整编起义部队的过程

我们工作团进驻起义部队后，遵照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首

长关于抓好起义部队思想教育，使部队成为一支真正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指示精神，我们针对起义部队官兵对我党政策的疑虑，对部队前途动摇不定的思想和反动的正统观念及其他各种糊涂思想，广泛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我当时负责第三军，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宣传教育，我所在的第三军同其他两个军一样，官兵政治觉悟初步得到提高，对我党我军政策的怀疑基本上消除了，部队各种糊涂思想开始得到澄清。部分进步分子与中下层军官敢于公开数说国民党的罪行。对人民解放军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人民解放军内部官兵关系好，部队活跃愉快，军政军民亲密无间，纷纷要求将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次整编后的建制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李觉、魏镇、傅正模、唐生明、王劲修。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军。

十月二十日，四野根据陈明仁将军和广大官兵的要求，电呈中央军委同意后，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这次整编是在前一段通过宣传教育，基本稳定了军心，官兵有了一定觉悟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个整编工作，除全面调查了解部队情况外，抓了开展民主运动和安排编余干部及安置干部家属等工作。全兵团编余各级干部共2,500名。根据干部的具体情况，分别送各级干校学习。全兵团有干部家属3,885名，按照一般动员回原籍的精神，动员了一部分家属回原籍予以安置，对一部分家在蒋管区或无家可归者，均安排进了工厂企业等单位。此次整编后的建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第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我当时任该军政治部主任。部队编成后，于十二月二日在浏阳县城举行兵团成立大会，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专程到会作了指示，并代表中央军委向部队授了军旗和军印，程潜的代表李明灏，湖南省委负责同志金

明，湖南军区代表黄志勇，四野组织部长杜平等负责同志也都到会祝词，共聚欢庆二十一兵团成立。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程、陈两将军起义部队的第二次整编。

（钟德灿、周顺华整理）



接管湖南省财政厅的片断回忆

欧 阳 迁*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顺应历史潮流，发表了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受到了人民的高度赞扬，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义声昭著，举国欢迎”。这一壮举，使当时长沙五十万军民避免了一场兵火战乱之火，为湖南开展新区工作和恢复经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是随着南下解放大军于八月五日下午进入长沙市区的，同行人员有童福康、张一、贾盛德、李田耕（贾、李不久即调往零陵专区）、李金莲（李当时因事留在武汉，延至九月才赶到长沙）等。接管湖南省的主要领导班子，我记得是党中央在天津决定的，但到武汉时，由于形势发展很快，一部分干部便分到广西去了，其中接管湖南财经工作的干部，如宋乃德、徐明、章伯森、陈均、梁春阳、王化民、张安南、刘兴国、易治琳等，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我们入境后，在湖南省工委领导下，首先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查研究和思想、组织两方面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了解到湖南的大致情况是：湖南全省的行政区划，共分十个专区，即长沙、衡阳、郴州、常德、益阳、邵阳、零陵（又名永州）、永顺、会同、沅陵；两个省辖市，即长沙市、衡阳市，以及七十七个县。湖南的耕地面积为五千多万亩，占全省总面积六分之一，其中水田为三千五百多万亩，旱地一千五百

*作者当时任湖南省财政厅副厅长，现为副省长级离休干部。

多万亩，洞庭湖平原十个县的水田占全省水田总面积五分之一，素称鱼米之乡。一九四九年稻谷总产量约为113亿至127亿斤，但这些数字都不大精确。湖南全省的总人口数目，号称3000万，但实际上只有2900万，这是由于解放前长期战争（征兵、拉夫、派役）、天灾时疫、饥饿贫困等等因素所造成的。

接管前的湖南财政收入，除部分来自田赋征实外，主要靠国民党中央拨款维持，自从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广州，自顾不暇，因而拨款中断，湖南财政已陷于极度困难境地，据说原湖南财政厅长蒋昆在任期间，为实现程、陈两将军和平起义的心愿，迎接解放，需款迫切，实行了下列四种临时措施：

（一）分配盐商承购食盐。

（二）拍实积存矿砂。

（三）截留国税局税款。

（四）提用中央银行库存硬币。

八月六日，我奉命正式接管财政厅，记得交接那一天，没有举行什么仪式，蒋昆没有到，由该厅主任秘书王伯庸代交，除有一颗用红色绸布包好的“湖南省财政厅”印章外，仅仅是一千块银圆，另有湖南公产登记册（其中有在湖北房屋30栋，地基1,389方丈，旱田35,16千方丈，全年收益为803.6万元，本省房租、地租为5,742万余元），原财政厅起义人员名单各一份，财政档案2,224宗，档案较系统完整，能反映湖南财政历史面貌，没有什么遗失，这是湖南地下党努力的结果。据了解长沙市解放前数月内，湖南地下党通过“促进和平起义小组”的程星龄、马子谷、刘岳厚、余志宏、蒋昆、王伯庸、唐文燮和一些民主人士以及进步的群众组织，如“湖南公务员联谊会”等，有力地团结了长沙市大多数思想较进步的人士，粉碎了白崇禧“空室清野”的阴谋。当时财政厅各科室都配备

了思想进步的职工，各自负责档案和办公用具的保管，直到解放前夕，便把全部财政档案装成几十个箴簏，堆积在财政厅的大院。像是搬迁待运（当时湖南省政府准备迁往邵阳），然后用旧书报杂志照样装成了十多个箴簏，指派专车运往邵阳，佯称重要档案早已运走了，以掩盖督促者的耳目。与此同时，则将最重要的公产契据妥为装箱，清点密封起来，乘机隐藏，其票照部分（当时等于有价证券）则指派专人负责，其余剩积在财政厅大院的档案，又指定欧阳震、闻英两人负责保管，欧、闻两人系七月中旬蒋昆接任后，由地下党联系人余志宏转托马子谷向蒋昆推荐到财政厅工作的。

接管前的财政厅，厅长蒋昆，厅内设有四室五科，科以下设股，各科室职掌及其主要负责人员，兹分别简述如后。

秘书室：襄理厅务，综核文稿。主任秘书王伯庸，秘书彭恭、石德义。

视察室：检查各县市财政、税捐业务后，提出检查报告。主任龙赞，视察李鳌、程云路、田益三等。

统计室：主管统计、会计等数字，作为制定财政法规的根据。主任张伯芹，副主任易熙，股长肖先梁。

会计室：主管会计、出纳等事项。主任李焕荪，职员鲁美云等。

第一科：主管省级预算、核签省库经费、配拨省级公粮。科长龚泽楚，股长王和政、黄克寰、龚幻鹤。

第二科：主管省县公产等事项。科长傅真枢，股长王殿黎、蒋宗原、王呈芝。

第三科：主管地方财政等事项。科长熊为琦（熊是留法学生），股长杨秋帆、金兆锋等。

第四科：主管税捐法规的拟定，征收业务的指导，征收机构的设置与裁并，员额经费的核定，票照的制发等事项。科长

原为孙以谔，蒋昆接任后，孙要求回安徽原籍，蒋派刘健夫接任。股长何庆安、傅海筹、周鸿钧。

第五科：主管总务。科长罗永宜，全科分三股，人员名额已记不清了。全厅职工为141人。

接管后的财政厅，经湖南省临时政府八月十九日第一次省务会议决定，将原有五科四室调整精简为三科一室，即：财务行政科、公产管理科、公库会计科、秘书室，并将原湖南田赋粮食管理处改为粮食局。同时又将原中央系统的国税局改为税务局，财政厅四科的税捐业务亦划归该局统一管理。以上两局均隶属财政厅。原属中央审计部的审计处和湖南省政府主计处合并为一处，定名审计处，也隶属财政厅。

接管湖南财政工作，是在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的财经接管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接管工作结束，该部便改为“湖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由省委书记黄克诚兼任主任，宋乃德为副主任，刘君实任秘书长，刘兴国亦是该会的负责人之一。

接管后的财政厅，其科、室、股以上人员名单如下：厅长宋乃德（兼），副厅长欧阳迁，秘书主任童福康，秘书彭恭、光明，视察王伯庸、石德义、总务罗永宜（罗不久即离去）、王德仁，财务行政科长龚泽楚，副科长熊为琦，公产管理科长傅真枢，公库会计科副科长张一，科长李焕荪未到职。一九五〇年六月，即调魏长捷来厅任该科科长。仓库主任李金莲，股长肖诗礼、王和政，卞从义、冯家骏等。全厅职工为87人。

并属财政厅的审计处，设正副处长三人，处长欧阳迁（兼）、副处长周平、曾邦熙（曾到职不久即离去），不久即从湘潭县调杨志挺任处长，我即辞去兼职。处以下设审计、统计两科，由徐光，曾宪枢分任科长，李笃辉任业务秘书，程志刚任总务秘书，全处职工为35人，其中有杨克观、刘雪涛、金启佑、周

浚、周羽仪、刘艺超、许兆明等人。

改隶财政厅的粮食、税务两局，其主要负责人：粮食局局长王迁，副局长徐羽、张安南。税务局局长林梦非，副局长刘录铨。

此外，同时接管的还有原中央系统派驻湖南的单位，计有国税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另有湖南省银行以及其他私人银行如复兴银行等。银行系统，则由章伯森、赵元彩接管。章伯森任湖南省银行行长，赵元彩任副行长。

新成立的省财政厅，各科室职能如下：

秘书室：综核和撰拟文稿，保管机要文件，审编各科室工作计划、报告以及人事登记、考核、调查等事项。

财务行政科：指导省、市、县财务行政和农民负担的调查研究，拟定和执行农业税实施办法以及农业税征收入库等事项。

公库会计科：掌管岁出、岁入预决算，审核其它支出法案，支拨临时垫款，收发配给实物，保管仓库物资，指导和监督金库业务，搜集整理各项会计资料等事项。

总的来说，财政厅是省政府的一级机构，领导和管理全省的财政、税收工作，制定和执行财政、税收和财务会计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编制和实现财政预算，审核和编报财政决算等事项。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财政厅由三科一室相继增设到六科二室，即人事科、预算科、文教事业科、经济建设科、农税科、行财科、办公室、监察室。此外，还增设有两个二级机构，即保险公司、财税学校。

在这段时间内，担任过财政厅长的有宋乃德、夏如爱（均系兼职），副厅长欧阳迁、马品三，主任秘书是史星三，人事科长是

刘先达。

一九五三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将粮食局改为粮食厅，直属省人民政府，林梦非任粮食厅长。一九五四年六月，财政厅的组织机构，又经过一次调整，设办公室、监察室、预算处、经建处、行财处、农税处、人事科。我在这一年七月上旬就调到省林业厅去了。

回顾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的接管工作，系采取“民主协商、局部改组”的和平方式进行的，接管财政也不例外。当时这种和平接管方式，在政治上给西北、西南、华南等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其行政当局以积极影响；军事上为我解放大军继续向前挺进减少了许多阻力；经济上为接管机关财务避免了不少损失；特别是对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但是，原有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充斥，情况既复杂又紊乱，善后工作非常艰巨。

首先在接管人员方面，我们采用三种办法处理，即大部分人员继续工作，少部分受训，极少数遣散。对遣散人员真诚相待，指明出路，分别不同情况，发足路费和遣散费。

一九四九年，湖南省临时政府财政厅及所属单位的接管人数，其处理情况如下：

财政厅：原有职工141人，遣散19人。

主计处：原有职工35人，遣散5人。

审计处：原有职工35人，遣散6人。

税务局：原有职工92人，遣散15人。

粮食局：原有职工178人，遣散37人。

总计省财政厅、主计处、审计处、税务局、粮食局，原共有职工489人，遣散82人，另有113人受训，实际留用了294人。

当时机关工作人员待遇，采用两种过渡办法，一种是供给制，一种是包干制，对南下人员实行供给制。供给制分大灶、

中灶、小灶三等，另发鞋袜、日用品、棉被、棉衣、单衣、蚊帐等实物，棉衣两年一套，单衣一年一套，干部子女除各按统一标准供给外，还可请保姆（每个婴儿请一个保姆），由国家负担。对起义人员实行包干制，也即包干供给制。一九四九年八、九两月每人分大米150市斤。后考虑到大部分起义人员家庭负担过重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一下子又不能全部包下来与南下人员统一实行供给制，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底，把原来的包干制标准作了适当调整，每月最低供大米150斤，一般为180斤，最高为250斤（也可能是280斤，记不清了）。到了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因物价波动较快，为保障机关人员生活，乃统一改为“工分制”。工分制采用实物组成，每一个工分所含实物数量为三机大米1.5市斤，龙头细布4方寸，麻油5钱，粒盐5钱，按每月不同市价计算，叫做“工分值”（每月在报上公布）。供给制分三个等级，即大灶56分，中灶72分，小灶88分，原发上述实物不变。包干制则按行政职务分为四个等级，即科长350至510分，秘书、视察340至470分，科员、股长300至400分，科员、办事员260至370分，全部包干，直到一九五三年国家实行币制改革后，才统一改为薪金制。

一九四九年接管后，湖南财政最主要的任务有二个：一是支援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我记得当时经过湖南的部队和战马是很多的，连吃粮和带粮共拨大米二亿三千万斤至二亿五千万斤，基本上保障了供给。二是筹备开展新区工作的经费开支，我记得当时中南局拨了一笔接管湖南的经费，约为五十亿元，但在武汉就用去了一半，到达湖南后，还剩二十五亿元交到省库后拨供各地开支。此外，还补发国民党第一兵团起义官兵的欠饷一亿多元。当时任务相当繁重，百事待举，特别是旧的财政制度已不能适用，新的财政制度来不及建立，许多实际问题，又不得不及时妥善解决，困难是很多的。虽然在工作上没有发生

什么大的问题，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由于接管经验不足，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如原田粮处长黄甲起义之后，又乘机潜逃邵阳（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使工作受到一些损失。二是接管人员少，忙于日常事务，遣散工作做得不细致，个别不应遣散的人也被遣散了。

建国初期，财政经济工作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当时，湖南财政收入来源于农民所交的农业税的比重大，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政权建设、民主改革、整顿社会秩序等方面。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二月份，全省财政总收入为401万元（包括公粮收入，工商税收入和其它收入等），除支出外，年终结余202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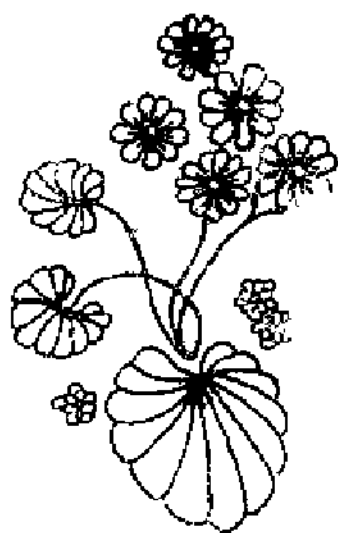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为了继续保障解放军的供给，同时配合开展清匪反霸，进行双减（减租、减息），各项所需经费更多，因此，全年总预算数字是相当大的。湖南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经济处于萎缩、瘫痪状态。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我们遵照党中央制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原则上采取节约资金，投入生产等措施，以便逐步转入到恢复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我省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多次提出的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恢复生产，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通过四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工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财政状况也逐步得到好转。仅举农业税收为例，征收农业税实际完成稻谷数：一九五〇年为20亿斤，一九五一年为28亿斤，一九五二年为29亿斤，一九五三年为30亿斤左右，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在财政支出方面，由于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正确领导，广大干部发挥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不仅证保了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供给，

战胜了困难，而且每年都有所节余，一九五〇年为160万元，一九五一年为242万元，一九五三年为4,939万元。这些库存节余数字，都可以说明当时财政收支是比较稳定的。”

（王和政、欧阳震、何庆安整理）



解放初期湖南教育事业接管经过

刘 寿 祺*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湖南和平解放已成定局，在人民解放军未入湘境时，我党即在河南开封配备了我省各战线的接管负责人。八月五日我人民解放大军进入长沙城，随即正式成立了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会下按战线分置若干个部。临时省政府副主席袁任远同志兼任文教接管部部长，我担任副部长。当时，文化教育都由教育厅主管。所以解放后省教育厅曾改为文教厅。这里，我只就教育方面谈一谈接管的情况。

接 管 前 的 准 备

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我中原区文教接管部教育处就草拟了接管湖南教育的计划方案。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结合已掌握的湖南教育情况，拟定了“暂维现状，逐步改造”的接管文教事业的总方针，计划方案详尽周密。

方案决定，首先接管湖南省教育行政机关教育厅。学校则先接管设在省会长沙的几所公立的大、中学校，如湖大、克强学院、湘雅医学院、音专、省立一中、一师、长沙高工和长沙护士学校等校，其余设在各专区、县（市）的公立中等学校分别由各专署、县人民政府（市立的由市教育局）接管。对各级私立学校，只作一般的政治领导，暂不接

*作者原系湖南省政协常委，当时任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部副部长。

收，但须宣布方针，规定条例，改革课程，取消训导制度，审查处理训导主要人员，呈报登记校产、设备、人数，实行民主管理，公开经费开支。对教会学校，只要其能接受上述宣布的方针，亦可允许继续办理，但不许强迫学生信仰宗教。方案对接收时应注意掌握的基本精神也作了具体规定：第一、接收学校原则是维持现状，继续开学，逐步改进，切忌造成混乱现象。第二、注意掌握政策，量力从事，不可操之过急，或急于求成。第三、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制订接管计划，准备不好不动手。第四、一切命令指示，必须先呈报请示文化接管部，而后宣布，以免出现各自为政的纷乱现象。第五、集中使用力量，对每个单位的接管，必须根据批准制订的接管计划进行。在接管过程中，各项手续必须完备，如人员、物资以及各项设备必须清点造册上报。第六、注意配合党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青委工作，做到意见一致，步调一致，达到顺利接管的目的。方案对接收以后应着手开展的工作作了三点安排：第一、各校接管人员要向全体师生员工宣布党接管学校的方针、政策，并组织学校行政干部和政治、历史、语文等科教师以及学生进行短期训练。第二、准备安置与收容因接收而失业、失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第三、组织计划开学后的工作，确定各级学校开设的课程及教学人员与准备充实干部。

接 管 的 经 过

湖南和平解放后，长沙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基本上按照中原文化接管部的计划进行工作。临时省政府副主席兼文教接管部部长袁任远和省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等几位领导同志随时召集我们了解情况，分析问题，研究作法，指导我们的工作。根据湖南和平解放的特点，以及为了适应迂回曲折发展着的政治形势，我们认为“暂维现状，逐步改造”的文教接管总方针十分

正确。在接管对象方面，决定首先接管湖南省教育厅，由我负责。原教育厅厅长李祖荫先生是积极支持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的教育界的老人（原湖大教授、法学院院长，解放后即调北京），加上党的地下工作者组织发动的进步力量的配合，对省教育厅的接管是比较顺利的。同时，我们按照计划研究部署接管各级各类学校。由于湖南各地解放有先有后，因此接管时间不能要求一致。

大学方面，原订接管对象是湖大、省立克强学院、湘雅医学院、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后增加国师和私立民国大学。

湖南大学是湖南历史最久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是我省高等教育的重心。解放前的几年里，每年毕业的学生都在300人左右，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解放前后，湖大一直是湖南学运的中心，推动民主运动甚力。

湘雅医学院创办于民国初年，一九三〇年始由私立改为国立，抗战期间曾迁贵阳，抗战胜利后复员长沙。毕业学生以服务公私医院与医学教育的最多，在中国医务界甚有地位，曾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

国师是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创办于一九三八年，开始设于蓝田（现属涟源县），一度迁移溆浦，后迁甯岳。国民党中央政府原拟把这所学院办成全国性的师范大学，故一直没有冠地名。国师虽面向全国招生，但一直办在湖南，其历届毕业学生绝大多数服务于湖南教育界，为我省中等教育师资的培养起了积极的作用。省立克强学院和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因办学时间不长，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音乐专科学校。

私立民国大学原设北京，抗战中搬迁益阳、安化、溆浦、宁乡等地。一九四九年九月由宁乡迁至长沙，租赁圣经学院为校址，行政组织欠健全。学校虽经营了许多生产事业，如机器厂，米厂、锯木厂、轮船、煤矿等项，因负债银洋近二万元及煤炭

一万多吨，以致经济困难，无法维持。

解放以后，省委和省政府为了适应当时大学教育的需要，以及集中力量在湖南办好一所大学，经呈报中原人民政府批准将省立克强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及国立师范学院与私立民国大学都合并到湖南大学，共设七院（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财经、工程、农学、教育），分26个系。当时有学生3,439人、教职员676人、工人314人，规模比原湖大扩大一倍以上。于是，原有校舍很不够，加上破旧损坏难以适应需要。经省政府核定，特别拨给修理费大米30多万斤。私立民国大学并入湖大后，该校资产由长沙市军管会财经部负责清理接管。国立湘雅医学院，因关系着人民治病就医的问题，故仍单独设立。

公立中等学校，如设在长沙市的省立一中、一师、长沙高工、长沙高级护士助产学校是第一批进行接管的。预定接管代表即为各校将来的主要领导干部。选派干部，条件较严，经过多方面慎重选择，决定将原地下工作者余志宏、郑琼、廖晨光、施无己、任惜余、李文华等分别配备为湖大、湘雅、一中、一师、高工、长护等院校的接管代表。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召开了接管代表会议，九月十一日正式开始接管。

接管这批学校前，都分别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如有系统地研究地下党所提供的调查资料；从正面或侧面分别了解各校具体情况；通过地下党及其所领导的各校进步核心分子（包括教职员、学生与工友）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然后分别拟定了接管各校的具体计划；建立集中领导与统一的汇报制度，每隔三日口头汇报一次，每周书面报告一次。在接管前，特约集思想进步、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人员，根据接管政策，研究拟定具体实施方案。由于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周密，上述学校的接管工作都如期顺利完成。后来，湖南大学因接收合入省立克强学院、音乐专科学校、私立民国大学与国立师范学院四院校，

范围广，手续繁；设在南岳的国师接管又较晚，故这些院校的接管工作直到年底才完成。当时，被接管各校原有工作人员很少更动，各校负责人除长沙市一中校长更换外，其余暂时不变。

对各专区、县的及省属但地处专区、县的公立学校，接管方式和步骤也基本上是按照文化接管部的规定精神办理的，只是有许多省属中学由当地专员兼任了校长；部门办的学校如衡阳扶轮中学（即现在的衡阳一中）就由铁道部门接管，并由当时衡阳铁路管理局局长郭维城同志兼任校长。

对于私立学校，按照中原文管部计划方案的规定精神，只进行政治领导，原则上不接管；但要宣布方针，规定条例。

我省私立中等学校所占比重是比较大的。解放前夕全省共有公私立中等学校450所；而私立的就有267所，占五分之三。历史悠久，办学成绩突出的明德、周南、岳云等校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

这二百多所私立中等学校中，有一部分是由于抗战期间，适应一般农村子弟躲避兵役而纷纷入学的需要而办起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为了摆脱政府要提拨祠庙社产的规定，以图保产而办的；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培植势力或以此作为个人政治桥梁而创办的。不过，象这些学校除一部分办理比较认真，有较大成绩外，大都设备简陋，师资质量差，社会信誉很低。由于社会的原因，湖南的私立学校，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基础不稳固，基金不实在，有的根本就无基金，立案时的田契，很多是假借的，人事制度也不健全，校董事会有名无实，经费主要来源靠学费收入。

长沙解放后，我们即先后召集中等以上学校校长、教职员及学生代表举行了三次会议，宣布文教接管政策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王首道、袁任远等领导同志亲临指导，指示我们文

教接管工作要“宁慢勿乱，稳健勿偏”。

我们根据省委、省政府领导研究确定的原则对学校做了几项具体规定：在行政方面，一般学校都要增设校务管理委员会，除校长与教导、总务二主任及工友代表一人当然委员外，余额由教员代表（占五分之三），学生代表（占五分之一）担任。在经费方面，经与财政厅共同商定，公立学校教职员暂维持原职原薪，私立学校教职员薪俸比照公立学校标准，由各校自行商定，公立学校编造预算暂以大米计算，并厉行精简节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裁减冗员。以前各校征收的俸米或敬师米均予取消，已收了的，也劝其照退，私立学校征收学米，应尽可能减低数额，并须陈报核准；学生公费（或奖学金）在中原人民政府未颁订新办法以前暂维持原状，但以往因从事国民党特务活动而取得公费者应予取消；私立学校经费自行筹措，但校产、校具等不得变卖、转移或隐瞒。关于学校教导工作方面也在向王首道、袁任远、周小舟等同志汇报、请示后做了几项规定：（一）各校训育、军训、童训制度及其机构一律取消；训育主任及训育员，应暂停职；特务教职员应解职离校。（二）各校公民课程一律取消，增加政治常识课目。（三）各校英文课程应予减少，国文、历史教材均采用审定课本，除由新华、三联各书店尽量供应外，并责成各专署、各县政府设法筹运供应。（四）教员教课时间应加限制，不可负担过多，致无法认真教学，并松懈对学生的辅导工作。（五）各中学各年级均准转学插班，但须经过考试，程度相当方可编入适当班级；中学各班人数不得少于25人，亦不得多于60人。

以上各点，均报经上级领导批准，湖南临时省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以《关于目前教育方面几个问题的指示》加以明文规定，下达各校。这个指示对私立学校董事会、联立学校理事会也提出了要求。

解放前，私立学校的董事会、联立学校的理事会中精英、理事，很多是国民党的党团首要人物，即使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亦不例外，如周南女校原是革命前辈朱剑凡先生为了解放妇女、改造社会而毁家兴办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周南的董事会就逐渐为国民党军阀、政客如赵恒惕、张炯、余霭传、余先砺等所把持操纵。直到长沙解放，肖劲光同志提出周南应恢复朱剑凡先生办学的传统，学校才改组。十月十八日湖南临时省政府以府教廉字79号文件发出《关于目前教育方面几个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关于私立学校的董事会、联立学校的理事会等，在过去为掌握校产，筹划经费的机构，在目下暂维原状的原则下，我们仍希望其组织健全，确实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并切实与校管会采取联系；但以往这种董事会、理事会组织中，国民党的党团反动分子，往往把持操纵，因此我们对于董事、理事人选，同样地也不能不加以调查甄别，所有国特分子和反动派，决不容许混进其间，以掩护其活动。教育厅已于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发出文件，并颁订《私立中等学校董事会组织纲要》，希望各校慎重翔实填报，听候处理。”

这样，我们在加强对私立学校的管理上，除抓紧督促学校建立和健全校务管理委员会外，同时强调了校董事会的改组、革新。也就是把私立学校的改进工作和公立学校的改进工作纳入同步的轨道。但私立学校的性质仍未改变。

当时省政府对整个中等学校的领导管理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省立、联立、私立中等学校有关创设、停办、合并及设班、编制、经费标准、主管人任免都由省政府掌握，并随时征询专署或县的意见。（二）县立中等学校有关创设、停办、合并及设班、编制、经费标准在省政府规定原则下，由各县政府转呈专署（长沙市径呈省政府）核定转报省政府备查。校长则由县市遴选报由专署（长沙市径呈）转呈省政府统一任用。

(三) 各专署对所辖的公私立中等学校要经常代表省政府就近监督考核。除前两项所举各点外，其余如政治上的领导，教育计划、制度办法的执行以及对日常和临时发生问题的处理，均为专署的任务，情节重大者应将处理情形及时报告省政府。

接管后的措施

在全省范围来说，很多私立中等学校的基础原不稳固，加上解放前夕国民党的破坏，以致学生人数减少，员工生活比较困难。解放前后有的停办，有的合并办理。有的地方在解放之初，由于接管繁忙，往往未经批准就将学校合并或停办了；但也有随便增设私立中等学校的，如零陵地区的祁阳天主堂、零陵中华圣公会都未经批准就自行办学。有的地方还有私人随便开办中学的。

根据上述情况，当时考虑到对私立中等学校，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另一方面还必须大力扶持。因此，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特制定《湖南省管理私立中等学校暂行办法》公布施行。主要规定如下：

一、私立中等学校必须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及人民政府所颁教育法令或指示办理。

二、董事会已立案之私立中学，应一律重新登记。

三、私人或团体创设私立中等学校必须依照规定办理立案手续，非经批准立案，不得招生开办。

四、私立中等学校董事会之产生或改组，应报由当地人民政府审核转报省教育厅备案。

五、私立中等学校董事会所筹得或保管之财产，除为学校开支外，不得移作别用，如属不动产，非经省教育厅批准，不得转移。

六、私立中学办理成绩优良，确符合大众需要者，得由政

府酌予奖励和补助；违反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不遵照政府法令，经考查属实，以及办理成绩不良，经督促后仍无改进者，撤销其立案。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不能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或不称职时，得令董事会改选或解聘。

通过这些规定的执行，私立中等学校的办理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和准则。刚解放时，有些学校的创办人或负责人随同国民党政府逃亡，学校因无人负责而陷于瓦解停顿状态。当地政府便吸收部分思想较进步、态度较开明的社会人士参加到这些学校中去；有些学校确实找不出合适的行政领导人员，则由当地有关方面推荐适当人选，获得董事会同意后，由董事会聘任。同时，采取措施从物质方面予以帮助。自一九五〇年上学期起普遍发给员工补助费，首先是按学生人数的多少及办理的成绩分等发给临时补助。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五一年上学期共发出大米250多万斤、人民币27亿余元（旧人民币）。一九五一年下学期起，进一步按教师人数计算定额补助费，计每人每月补助大米300斤，按工薪单位发给。这样，全省私立中等学校的员工生活便得到了保证。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大多数学校趋于稳定，连在解放前夕停办的私立中学大多数又恢复开办。

由于占全省比重很大的私立中等学校得到稳定，全省的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都得到稳步发展。

不久，又分期分批接办了私立中学。

本来，解放之初，中央和中原人民政府指示对私立学校原则上暂不接办，但全省各地陆续解放后，曾有一些私立中等学校，特别是一些私立中等职业学校或因本身无法维持，或因当地确有需要（如财会职业类），一解放就经当地政府予以接办或并入公立学校；但这是当地政府个别决定，并非省里统一安排。后来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广大干部、群众的子女要求升学的日益增多，国家对于具有一定文化

程度与觉悟的青年的需要量也越来越大，中等学校培养新生力量的任务随之加重。我省私立中学（私立中等职业学校一九五〇年起陆续为各地业务部门接办）虽经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但由于历史上造成的原因，在校舍、设备、领导力量、师资等方面，终不免受到限制。因之，绝大多数私立中学的负责人、教师、学生及其家长都纷纷要求政府接办。于是，我省经报请中南和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分期分批接办私立中学。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一批接办的有明德、周南、清华、广益、岳云等五校；一九五二年暑期第二批接办六十四所，和一所联立中学。其中包括接受外资津贴的教会学校六所；一九五三年八月第三批接办了四十一所。除第一批办学成绩优良、社会信誉好，解放以来就是我们重点扶持的五所私立中学外，其余几批按中央统一规定，先接办接受外资津贴的私立学校，后接办中国人自办的学校；先接办成绩较差的学校，后接办成绩较好的学校；先接办经费困难的学校，后接办经费还能维持的学校。接办步骤是先分地区摸清各私立学校的情况，然后根据上述原则订出接办计划，报经中南教育部批准执行。所接办的学校都派了新的行政领导人员。接办时，我们首先对学校师生员工讲明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注意做好团结工作，防止造成混乱，然后订出学校工作计划，同时强调加强对师生员工的思想教育工作。

从接办我省私立中等学校的全过程来看，我们坚持贯彻了“暂维现状，逐步改造”的文教接管总方针，同时采取了“宁慢勿乱，稳健勿偏”的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教育事业是千秋万代之业，是百年树人的大事，处理教育方面的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旧中国，湖南教育界经受过深重的灾难：抗战时期的民族灾难不说，只说军阀混战时期，这个军那个军来了，学校校舍就变成他们的营房，学校不是被迫解散就是被迫停课。尤其当军阀们盘踞

湖南时，教育经费首先被提作军饷，使广大教职员工无以为炊。回忆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上半年直系吴佩孚军进占长沙、衡山一带，省银行被抢劫一空，几乎所有省立中等学校都无法维持下去而被迫停学一学期；“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省政当局更明令禁止学校开学，停课达半年之久。湖南和平解放，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然而我们的学校教育却仍弦歌不辍。这在湖南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就拿前面讲过的那几批接办的私立中等学校来说，现在不仅校舍、设备、规模成倍地扩大了，而且绝大多数都成了各地、市、县的重点学校。这也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下面我再讲几件解放初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冬，农村开展了减租退押。由于不少在职教师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运动进入高潮时，农民们纷纷进城直接到学校传唤教师回乡，引起一些教师惶惶不安，也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我们及时将这一情况向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以及周小舟同志汇报，省委即责成土改委员会作出规定，凡在塾教师的土地关系问题，应通过城乡联络处处理，农民不能直接到学校带人。这样就稳定了一些有土地关系的教师的情绪，也维护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一九五〇年冬，全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我们组织大批教师参加土改工作队。他们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得到了锻炼。

为了更好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之初我们曾先后发起组织了长沙市高教联、中教联、小教联、省教联、省教育工会，并成立了湖南教师社与科学通讯社，出版《湖南教师》月刊及《科学通讯》月刊。通过这些群众团体及书刊，广泛地联系群众，推动了全省文化教育工作。

解放初期，由于学校内部结构有些变动，人事安排上还不

能按部就班，因而有些知识分子一时得不到适当的工作。加上解放前就有一批失业、失学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人，人民政府都予以妥善安排就业。湖南在解放的第一年，一方面为了支援东北、西北的建设，另一方面也为了妥善安排我省知识分子就业，我们曾接纳了东北、西北人民政府招聘团来我省进行招聘。两地先后在湖南招聘不在职教师千余人，招收学生1,150余人；我省革大和军大也招收了学员13,000人；省直机关和各专区、县干部训练班招收干部16,600多人；省文教厅也单独招考失业教师600人送革大学习。另外，对年老丧失工作能力的教授、讲师、作家及中小学教师则发给救济米。并普遍提高了公私立学校人民助学金数额。照顾贫寒优秀学生不致失学。

我们除适时解决本省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外，还解决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流亡学生的问题。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诱胁，华北、华中有些学生纷纷向南流亡，自山东省流亡来湖南的学校计有济南第三、第四、第六联合中学，烟台联合中学，昌潍临时中学，豫衡联合中学等六校，共有师生员工10,454人。将近解放时，这些学校大部分迁移去广东、广西两省，但有些学生仍留在湖南。我们采取了资助与救济两种办法。凡有家可归或有校复课的学生，予以资助（发舟车费和伙食补助费）；凡无家可归或不能回返原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则介绍转入相当学校就读，并给予生活费。这样安排的学生共约五百余人。

回顾湖南解放初期对文教事业的接管，在省委黄克诚、周小舟两同志和省人民政府王首道、袁任远两同志直接领导下，以及地下党和南下同志各方面的配合和努力，确实做到了稳健不偏，有条不紊，比较顺利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以后我省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解放初期的周南女中

陶 蒲 生*

一

解放战争后期，周南女中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中共湖南省、市工委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汇集了三方面党的力量。一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周里同志派去的地下党员陶蒲生同志，她按照周里同志的指示，与进步教师李静、李淑纯（当时均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组成三人工作小组，负责学校上层的统战工作，并争取、团结教职员工，支持革命的学生运动。再方面是以中共长沙市工委河东学运区委领导的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简称“新研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全校学生，积极开层“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战”的学生运动，组织同学护校、迎解，“新研会”周南小组有黄代明等会员十余人。第三方面是由小教支部发展并领导的地下党员文德容、彭玉城同志。这三股力量，互相配合。因此，这一时期周南的学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如广泛地开展读书活动，创办“骆驼”等近二十种墙报，宣传革命真理，组织各种灵活多样的文艺活动。团结群众，鼓舞斗志，更是周南当时开展学运的重要特点。周南学生冲破黑暗势力的阻挠，奋勇地参加了各次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积极地组织了护校迎解活动。

* 作者原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解放前夕在周南做地下党工作，后来参加了对周南的接管，现为湖南省政协委员。

当时，周南女中的校长周昭怡，事业心强，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是我党在周南开展工作争取团结的主要对象，我们邀请她参加读书会，确定专人与她联系，帮助她认清形势，正确地对待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在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她的态度逐渐明朗，支持和参加了一些迎解、护校工作，并毅然参与了唐生智等发起的响应和平解放湖南的签名。

二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长沙和平解放，随即成立了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肖劲光同志担任了主任，袁任远同志任临时省政府副主席兼文教接管部长，刘寿祺同志任副部长。

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文教接管部都非常重视恢复和发扬周南的革命传统。鉴于马日事变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周南女中的创办人朱剑凡先生被迫逃亡，周南的董事会一直为一些军阀、政客如赵恒惕、张炯、余籍传、余先砺等所把持。因此，长沙一解放，肖劲光同志即亲临周南视察，并向文教接管部提出周南应恢复朱剑凡先生的革命传统，学校应改组。八月二十九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以文教字第壹号公函湖南省政府教育厅请令飭周南女校校长周昭怡及原创办人朱魏湘岳会同改组该校校董会。又据朱湘岳、周昭怡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发出的函件称：“敬启者，顷奉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令，以周南女子中学董事会应由原倡议人朱魏湘岳（朱剑凡先生的夫人）会同现任校长周昭怡重新改组，并将改组情况册报备案。等因自应遵办。兹敦聘肖劲光、周小舟、石磊（即曹瑛）、董纯、韩淑仪、李咏南、李佑汉、杨周群、朱超、曹国智、李静、左学谦、黄士衡、朱湘岳、周昭怡等十五人为本校董事。”随后，新董事会正式成立，肖劲光任董事长，推举了朱超为校长，周昭怡为副校长。省教育厅在九月

十四日下文指令周南女中董事会，对呈报推选朱超为私立周南女子中学校长，周昭怡为副校长准予备案。在新董事会成立之前，文教接管部的袁部长和刘副部长曾找周昭怡谈话，指示周南改组的必要性，就是要公开党的领导，恢复朱家办学的革命传统，你也要留下工作。因此，周昭怡校长比较愉快地接受了这次改组校董事会的任务。

在酝酿成立新董事会的过程中，学校里也曾出现过某些曲折，经过文教接管部和学校地下党的及时处理，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新董事会终于顺利地产生了。在新董事会的领导下，学校实行了民主管理，组织了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校务管理委员会，同时根据省委、省人委关于校育问题的指示精神，取消了训育、军训、童军制度及其机构，改革了课程和教材，如取消公民课，增设政治常识课，国文、历史教材采用审定课本等等。同时，公开并建立了学校的党团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团员，输送了大批学生参军、参干，支援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工作。

根据解放初期文教接管以“暂维现状，逐步改造”的总方针，周南女中当时虽尚未改变私立学校的体制，但它已接受了党的领导。

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教式（51）字第4,726号通知周南董事会“周南女中改为省立”。通知称：“你校自解放以来各方面均有较大进步，我厅为加速学校进步而准备条件，树立楷模，经呈奉中南教育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学教字第1,367号批复核准将你校改为省立。”并要求董事会即召开结束会议，负责办妥学校财产、债务的清理册报及其他交接事宜，勉励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在已有的基础上更加提

高。回顾解放以后，自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指令周南改组，成立新董事会以来，周南女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明确了办学的目的和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对如何办好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学校十分关心，迫切要求弄清楚新旧教育的根本区别。于是，我们组织全体教职员认真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有关部分和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讲话。通过学习，联系实际，进行新旧教育对比讨论，从而逐步明确了新旧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办学的目的不同。因此我们办学的主要任务，正如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所指出的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了贯彻这一指导思想，我们要求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逐步树立学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们曾组织教师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批判旧教育思想，去精选教材，进行力所能及的教学内容的改革，如批判杜威的教育思想，总结教学经验。我们还十分重视学习老解放区和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当时各项政治运动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正在广泛迅猛展开，我们强调了学校教育要密切配合各项民主改革运动，把政治思想工作有机地落实到教学中去，以逐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思想，逐步树立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在一九五一年订立学校工作计划时，我们把搞好教学，明确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放在首位，通过学习和总结工作，鲜明地提出“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通过课堂教学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来造就一批智、德、体、美全面发展的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人

才。”指出：“要把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贯彻到教学和全校各项工作中去。”

第二，认真贯彻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组织和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刚解放时，周南的教师，绝大多数原来就在学校任教，其中不少教师任教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由于他们是受的旧教育，不少教师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根据一九五〇年初的调查，全校师生有三分之二出身于地主家庭。因此，他们在思想感情上不免或多或少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着一些联系。但是，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阶级，在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他们是可以而且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早就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了，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贯彻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方针，办法是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如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简史》《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列著作和有关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大家联系实际，弄通思想。引导教师在教学实践和参加社会改革活动中改造自己，如组织教学观摩，经验交流，组织教师带领学生访贫问苦，进行社会调查，参观“从猿到人”、“谁养活谁”、“美帝侵华罪行”等大型展览，参加各种诉苦会、控诉会等等。一九五〇年冬，又组织教师参加土地改革，要求他们以身作则，站稳立场。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教师的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周南教师虽然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人较多，但在整个反封建斗争的过程中，都表现很好。我们在启发教师进行思想改造的活动中，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不开斗争会，不带帽子，不打棍子。因为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思想改造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和采取任何粗暴的方式。

一九五一年，由于不少教师要求更多地接受党的教育，我

们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党章学习小组，吸收一批优秀教师参加学习。这些教师后来大都成为学校的骨干，其中不少教师被输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和湖南师范学院等单位，成为这些学校的教学中坚。

第三，贯彻“暂维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使学校在团结安定和良好的教学秩序中稳步前进。我们在贯彻这一方针时，不仅在教育改革的步骤上严格按照中央和省文教厅的指示，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而且一直强调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建立良好的学习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师和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循序渐进地完成教学的任务。由于当时各项民主改革的迅猛展开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学校里曾一度出现运动过多，学习秩序有些紊乱以及领导多头、师生关系有些紧张的现象。我们与有关方面联系，提出了统一领导，师生团结，搞好正课，建立良好的学习秩序的要求，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从而及时克服了这些现象，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时，不少教师因在农村有一些土地关系，发生过农民进城直接传唤教师回乡，引起教师惶惶不安的情况。我们及时向上级领导反映，并根据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规定，帮助教师通过城乡联络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稳定了教师的情绪，维护了学校的教学秩序。

挥戈南下 解放岳阳

郑 酉 年*

一、和平解放岳阳城

一九四九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基本解放。是年四月十一日，我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一五九师从河北霸县随主力挥师南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于六月一日到达湖北孝感萧家巷一带。七月八日部队从萧家巷出发，军、师主力向湖南省平江县方向前进，七月十六日挺进平江。我四七五团由杨立副师长兼参谋长率领沿长江开进，作为军、师侧翼警戒。过江后，由蒲圻转南经临湘县向岳阳进军，担负解放岳阳的任务。

岳阳是南北水陆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重要。我团于七月十七日在嘉鱼过江，十八日在临湘县城宿营。当天，自称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第六支队司令的李长江到团部与我联系，说他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拟与我商讨起义之事，他的部队驻扎在桃林区的山沟里，并向我讲了岳阳城的一般情况。我团因主要任务是先占领岳阳，为南进、西进的大部队打开通道，补充给养，所以暂定李部在原地驻扎，听候调遣，并向他交待了我军的政策。十九日，我团在云溪镇休息就餐后，从岳阳来了一名叫杨青的人，自称与武汉3130部（我地下党所领导的城工部）有联系，他是前来接应我们的。说岳阳保安团与他讲好准备起义。下午又来了一个名叫杜德珍的，是

*作者当时任四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五团参谋长，现为师职离休干部。

铁路工人，也讲了与杨相同的话。听了两人对岳阳情况的介绍，我团夜间出发时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先由侦察股长聂海田带领武装侦察排先期进入岳阳，摸清情况后与保安团直接联系，部队如果听到城里有枪声，即从城陵矶展开，攻打岳阳城，二是如果保安团确实放下武器起义，我团即在城陵矶车站休息整装，准备列队举行入城式。七月二十日早上部队正在整装待命，侦察排来人报告，城里无军事行动之意，侦察排已到县政府，并见到县长兼保安团长许新猷。部队便整队从城陵矶沿铁路线入城，到县政府前集合。全团的司号员集中在前面吹着嘹亮的军号，团宣传队在号兵之后锣鼓喧天地跟进，团直、各营分两路纵队以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进入城内，岳阳城人民早就闻知我解放大军将要到来，加之侦察排先期到达，群众即自动地烧了开水，街两旁挤满了人群，鞭炮齐鸣，热烈欢迎我军入城。县政府人员也在政府门前聚集表示欢迎。团首长向部队和周围聚集的群众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各部队分头到宿营地休息。当天，我们向上级电告我团解放岳阳的情况，第二天宣布岳阳城在人民政府未产生之前，由我团实行军事管制。二十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了岳阳解放的消息。

二、收编游杂武装

七月下旬，岳阳城的局势趋于稳定后，团党委考虑到我团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但不收编好许新猷、李长江两部游杂武装，团主力就不能派出去打开局面，剿匪、征集粮草支援前线的工作就难以进行。时间长了，就连我团本身吃粮也会成为问题。而这些工作又不能等待各级政府建立后再去完成。因此，经研究决定，先将岳阳城里的保安团收编，再解决临湘的李长江部问题。许新猷部在我眼皮底下，虽然许向我表明态度，我们告诉他的事都一一答应，但他的部队情况我们并不了解，

不解决总是个问题。李长江部在我团背后，不解决也有后顾之忧。

团党委决定对许新猷部先收编教育，派我政治干部去任教。许新猷当时态度不错，回去即将部队全部按规定集中。我们派去的政治干部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讲当前的形势与我军要解放全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方针，要他们看清形势。同时宣传我军是人民的军队，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还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许部的士兵很愿意接受这些宣传教育，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家庭，又是被保甲长抓、拉、抽、派、雇等几种形式强迫当兵的。通过教育摸清了许部士兵的思想情况，他们普遍反映家中有困难想回去。我们掌握情况后，决定争取在七月底前把许的保安团解决。我们找许来团部向他讲述了当前的形势，劝他应当为人民立功等。同时也指出他的部队因各种困难不能再维持下去，应将武器集中保管，排以上军官集中学习。许很理解我们的意思，表示尽早解除武装。这样也了却了我们一桩心事，不然出了事他本人也不好交待。我们同他具体商定了解决的办法，按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同他一起到第一中学，许将保安团全部人枪集中，告诉排以上军官到一中另一教室集中，解放军首长要训话。随后向士兵发出架枪的口令，把手榴弹袋、子弹袋、刺刀放下，他向士兵讲了几句话后，由我团预先分配好的干部带回宿舍，各自取衣服、被子去了。士兵离开后，我团作战股长李子建带人将武器弹药等装备登记好运回团后勤处，许又到教室要排以上军官把枪放下，人到外边集合，并讲了话。尔后，我们就将该团的官兵分别送到城内的另一地方集中进行教育。

我们紧接着在士兵中进行登记和体检，根据他们各自的志愿，参加我军的欢迎，不愿参加者发给路费和证件遣送回家。实际上补充到我军的只有258人。对许新猷本人，我们要他回到县

政府去，等待人民政府接收。七月下旬，我南下工作团到达岳阳，县委、人民政府各部门开始办公，出了安民告示。许将一切向我人民政府作了移交，县政府人员58名，各种档案卷宗齐全。当年冬天，许新猷还参加了洞庭湖堤坝修复工程，表现很好，后到专区商业局工作。

岳阳城内问题解决后，我们即调临湘县李长江部于八月初到岳阳第一中学集中。李长江部是由临湘自卫团、警察大队及湖北省蒲圻自卫团一部和特务大队组成的，自称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第六支队，李长江任司令，副司令胡大士，政委王立农，参谋长刘子全，辖四个团，第一团团长李扩海（以敌特务大队为基础），第二团团长骆振湘（原临湘自卫团），第三团团长李拓（原警察大队），特务团团长邱以琴。按照收编保安团的经验，先派政治干部去进行教育，在方法上有一点不同的是开始教育时就把排以上军官与士兵分开进行编队。这样军官认为是对他们的特殊照顾，士兵看到长官不在，就能大胆讲话，以便掌握情况。

李部上层人员思想比较顽固，与许新猷部不同，对收编有抵触情绪。但当时湖南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两将军已于八月四日宣布起义。我们向他们讲解长沙和平解放的意义和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觉得大势已去，同意接受收编。我们立即动手，当天就用解决保安团的方法，将其武器收缴了。然后对军官进行教育。不久，奉上级指示将许、李两部军官全送长沙军分区教导队学习（驻湘潭市）。李部的士兵经教育后，大部分遣送回家。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五日，我团收编国民党地方军共计4,763人，其中军官265人，士兵4,498人，歼灭敌正规军13人、地方军398人。

三、建立地方武装

长沙和平解放后，随后周围各县城也相继获得解放。但当时我们仅控制了各个县城，公路沿线以及城镇附近部份乡村、广大农村仍为游杂武装和土匪所控制。游杂武装数十股共一万四千余人遍布全地区，尚有近万人的土匪武装成群结队流窜各地，抢粮索款，造谣惑众，造成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甚至长武公路上也时常受到土匪的抢劫骚扰，使我接管、支前等工作不能顺利开展。

为了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发出了主力地方化和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这是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和巩固胜利的正确方针。但贯彻这一方针，由主力部队转化为地方部队，却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过程。不久，一五九师改为长沙军分区，九月初分区领导机关及地委分别由平江、岳阳移至湘潭。当时部队的思想情况，一种是愿意地方化，另一种是不愿意地方化。愿意地方化的并不是都领会了毛主席的“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指示精神，而有的是在较大程度上包含了个人得失的因素。如愿数卫戍部队，住在城市，主力地方化后可避免走远路，不再爬更多的高山。这种思想在部队内是比较普遍的。当然也有个别干部想借此脱离军队，改行做地方工作。一方面是部队生活艰苦，但主要考虑的是在地方工作找对象容易些。另有一部份人（干部占多数）不愿意离开野战军，认为地方工作不光荣，工作不正规，进步慢，同时对生活待遇也有些考虑。为了克服上述的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认真贯彻部队地方化精神，我们对当时暴露的思想归纳起来加以分析，然后再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提出问题，组织大家讨论，求得统一认识。这样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我四七五团改为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后，为了建立县、区地方武装，将二营四连改为湘阴县大队，

三营七连改为岳阳县大队，九连改为临湘县大队，并抽调大批干部作为县、区武装建设骨干。

根据上级指示，我团还抽出兵力以排为单位，全面展开清匪反霸，进行军事接管，深入农村征粮和建立革命秩序。

各县大队组建后，各区中队也相继开始建立。当时四县共分二十八个区（临湘五个、岳阳七个、湘阴十个、长沙六个）每个区中队三十多至四十人不等。这支力量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对巩固新生政权，完成征集粮款等任务作出了很大成绩。各区中队初建时战斗力弱些，但他们吸收了当地贫苦青年参军，这些青年有人熟地熟的优势，成为剿匪的一支新的力量。我团部队、各县大队、各区中队协同剿匪，首先集中力量剿歼顽固的大，中股土匪，使其反革命活动失去武装依托和政治影响。其次，加强城乡治安工作，打乱匪特地下部署。第三，放手发动贫苦农民通过减租反霸，向地主阶级进攻，树立农民优势。第四，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取消保、甲制度，建立人民自己的基层政权，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匪首，设立检举箱和土匪自首报到处，号召群众知匪报信，见匪就抓，不给土匪以资助。家家清匪，人人反特，成立规劝小组，展开亲劝亲、友劝友等互劝活动，使残余匪特失去了农村阵地，不得不向人民政府投案。从此，长沙、岳阳、湘阴、临湘四县的局势基本稳定了下来。

（湘潭军分区政治部、岳阳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南下湘北 接管益阳

郭 清 文*

一、南 下 湘 北

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广大华北解放区干部，积极报名参加南下工作队。当时，我在冀南区党委所属的临清地区馆陶县委工作。冀南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动员广大干部踊跃报名，尤其是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由于领导的反复动员，大家情绪很高，仅临清区就有一千多位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南下。当时冀南区党委共辖六个地委。南下前夕，分别组成了六个新的南下地委领导班子。我们这支队伍组成后，于一九四九年春节，集中在区党委所在地——威县学习。主要是进行出发前的思想教育，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行军纪律、宣传全国各地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以武装南下干部的思想，使之适应新的工作和战争环境。我们从威县出发，步行六天，大约是三月底到达开封。到开封后我们又集中学习了两个月，主要学习党对解放区的方针、政策、法令，听取部队首长对解放战争形势分析的报告。当时党中央已经为解放区制订了新的政策，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只有这样才能坚决贯彻执行。在开封学习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针对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作者当时任益阳地委第二书记兼益阳专署专员，现为副省长级离休干部。

在中南方面，我第四野战军强渡长江天险，占领了华中重镇武汉。接着又挥戈南下，分中、西、东三路进军湖南。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通电起义，湖南获得了和平解放。

在开封学习的后一阶段，还重新组编了各地委领导班子，我们冀南区党委所属的干部组成一个支队，下分六个大队。临清地委和大名地委的同志合并组成第一大队，朱效成同志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编组后部队开到了郑州市住了几天。这时，大队长朱效成调走了，周惠同志从二大队带来了一些同志和我们组成新的大队。周惠同志任书记兼大队长，我任副书记兼副大队长。原来听说我们大队南下去江浙，后来改为去湖南益阳。从郑州到武汉，我们乘火车走了六天时间。火车开得慢的原因，一是交通被国民党军队破坏太厉害，路上很难走；二是沿途到处要让路，我们到信阳后在车上整整停留了一天。五月下旬才进入武汉市，我们支队扎在汉阳。因湖南还没有解放，我们只好住下来学习。请湖南的地下党负责人周里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给我们介绍湖南各地区的情况，商讨今后如何开展接管工作。那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我们学习中央指示，结合研究开辟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部队首长指示我们，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不应歧视，要根据立功的大小，给以相应的报偿；对国民党政府的旧职人员，要区别对待，表现好的，大部分应当留用；要动员工厂的工人，立即开工，生产自救；对工人、农民中表现好的积极分子，要细心考察、培养、提拔为骨干。当时南下干部不多，每县约八十至一百人，分到每个区，除了区委书记和区长外，只能配三至五名干部，其余均都只能在地方上培养选拔。

七月下旬，我们大队八百多位同志分乘六条小火轮，从武汉出发向益阳进军。路上一共走了七天时间。第一天到湖北嘉鱼的金口，第二天到岳阳城陵矶。在岳阳停留了两天后，派人

先同当地地下党组织联系，了解益阳和平迎解的准备情况，侦察国民党游杂部队的动向。周惠同志从岳阳取道前往长沙，向省委汇报，听取上级领导对益阳解放后的工作指示。我和杨新一同志带领大队伍于八月六日到达益阳，从学门口码头上坡。在我们到达益阳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一四六师在师长刘奎、副师长赵峰、政委齐渭川同志的率领下，已于八月三日解放了益阳。当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市区时，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奔走相告，庆祝解放。

八月中旬，益阳地下党同志与南下同志胜利会师。第一个与我们见面的是地下党湘中工委书记官健平同志，他同周惠同志一道从长沙来益阳，后来被任命为地委组织部长。还有张乐和刘静安同志领导的突击十二大队。所有的地下党同志，他们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坚持斗争，为迎接益阳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二、接管政权

接管益阳地区国民党政权的工作，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分三条线进行。第一条线接管各县党部，具体由杨新一同志负责；第二条线接管保安司令部和湘北师管区，由杜一夫同志负责；第三条线接管旧专署，由我和孟信甫同志负责。我和老孟去旧专署机关时，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杞材已去长沙，由保安副司令龙叔韬代办移交手续。龙叔韬、颜健是益阳和平迎解的有功人员，因此，接管时许多问题我们首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一道商量。当时在专署的旧职人员，我们基本上保留原班人马。接管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保障供应，安定秩序，稳定人心。要求工厂立即开工，商店照常营业，银行、税务部门按时办公。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接管政府工作这条线，还成立了几个工作班子。由张毅川、田蕴裕带队接管银行、商业部门；

苗兴华带队接管税务部门；史平带队接管教育部门和各中学，并督促准时开学；李子滔带队接管信义医院和县医院（后改为益阳地区人民医院）；刘喆负责接管城市建设事业。各中小学除清洗少数特务分子外，其余均保留了原班人马。只有培养师资的益阳师范学校，地委比较重视，聘请了当地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林伯森为校长，任教多年的老教师田凯元为教导主任。地专机关的接管从八月十日开始，到月底结束。其余各县的接管工作八月二十日前后才开始进行，大体经过了半个月时间，到九月上旬已陆续将各县党部、警察局、参议会基本上接管完毕。接管各县前，地委召开了各县负责人会议，交待对接管工作的要求、步骤、作法及工作重点。特别强调指出工作的重点是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生产，稳定秩序，安定人心，保障人民生活。各县在接管工作中都是首先广泛宣传，安定群众，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各县均召开了职员思想动员会，讲明我党的态度，反复交待政策，指明前途。注意掌握思想动态，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益阳地区接管前，除宁乡县党部、参议会成员逃跑，警察局投降姜亚勋部，安化各旧政权机关早已溃散外，各县都是由我武装部队临时成立治安委员会或城防司令部，维持局面、恢复生产、安定情绪的。各县警察局的文件、档案、收发文簿，除宁乡、安化外大部分都已接收，只有个别秘密文件不全。湘乡、汉寿、沅江的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大都被争取过来，作了交待。汉寿还供出了一部分下层秘密特务组织。湘乡县收缴了全部警察局的武器、弹药（其他各县均已由人民解放军部队缴械），审查了全体旧职人员，分别作出受训、留用、遣散和个别处理的决定。接管工作大体完成后，为了迅速巩固人民政权，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具体指导下，我们研究了各县组织机构，搭起了领导班子。选出了大批干部，奔赴全区各地，建立地方政权机构。益阳县委书记张力耕，县长董早冬，

沅江县委书记李哲，县长侯鸿业；汉寿县委书记梁向明，县长鲁清；安化县委书记王俊臣，县长曾广成；宁乡县委书记李瑞山，县长张继源；湘乡县委书记刘洪源，县长宋子兴。这些同志到任后，以身作责，艰苦深入，联系群众，积极打开了地方工作的局面。

三、借 粮 支 前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势如排山倒海，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二野、四野主力部队经湖南向西南、华南挺进，为了支援大军南下，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及时供应部队的粮食，保证部队的给养，因此必须搞好借粮支前工作。同时也为了解决国家干部和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与促使工厂开工，商店营业，活跃市场流通（当时市场多以粮代币）都必须保证粮食供应。

地委为了取得借粮支前工作的经验，先在宁乡、益阳两县进行试点，动员了大批干部下去协助工作。万达同志带队去益阳，我带队去宁乡。试点工作九月结束，十月在全区全面铺开。我们当时采取的借粮政策是：一、利用原有乡保长借粮，除个别明显的特务分子外，对原有多保长一律留用，责令他们戴罪立功。二、沿用解放前的粮银制度进行借粮，以原有田赋册为基础定任务，凡粮册上有名，而实际已无土地者不借；对贫苦农民，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少借或免借；对大户，重点屯粮户要多借。三、由各县、区组成借粮工作队，发动贫农，依靠群众，实行借粮评议，然后发榜公布。由于金区各县干部的积极努力，广大农民满怀翻身的喜悦，纷纷踊跃送粮，终于提前完成了借粮支前的任务，受到了省委的表扬，金明、周小舟同志还亲自来益阳，总结了我们的借粮经验，肯定了我们的成绩。

在支前工作上，我们要保证衡宝战役和二野路过我区的供给。我们共支援部队：一、粮食六十九万余斤，柴八十四万余担，草五万余斤。二、协助完成了资江渡军任务，共渡过部队五万五千余人，汽车六百余辆。三、供给了过境先遣部队与后勤部队所需用品，如铁锅、水缸、铺板、水桶、电线、电杆等，在沧水铺、黄溪桥、资江南岸各设立粮草站一个，沿常长公路在衡龙桥、沧水铺、宁家铺、迎风桥及益阳市汽车站设置了茶水站。四、发动群众向解放军赠送慰问品，并写了许多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鼓舞解放军进军的情绪。

安化县的借粮支前工作，做得更为出色。据当时资料记载：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底止，先后进入安化的解放军队伍达十多万人，战马两千多匹。安化历来是一个缺粮县，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如何保证驻军的给养，是摆在全县人民面前一个极其艰巨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县委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把筹粮支前作为安化全县的中心任务来抓，成立“军粮供应站”，提出“一切为了支前”的口号，要求各级党组织，农会均全力以赴，放手发动群众，抢收稻谷，熟一丘，割一丘，边熟边收。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县共为驻军筹粮三百多万斤。解放军战士中北方同志多，为了照顾北方同志爱吃面食的特点，还派熊志宁同志到蓝田镇向九家面粉厂商借了三百多袋面粉。同时，还供应了大量的肉食、蔬菜、柴草等。此外，还发动妇女为解放大军赶做了九千多双军鞋。一四七师向新化进军时，部队给养困难，地方党组织知道后，很快为部队筹措了二十五两黄金和四百元银洋，帮助解决了给养困难。

当时，安化没有公路，交通极不方便，运输全靠肩挑。在“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全县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个个踊跃上阵，给驻军挑运粮食。从安化龙田、新化塘井边、蓝田漆树坪至梅城，从东山、木孔、长乐至仙溪山口等几

条主要道路上，每天都有近千人的运粮队伍川流不息，他们顶烈日，冒盛暑，爬山越岭，表现了安化人民热爱子弟兵的深情厚谊。梅城东村有个五十八岁的贫农傅新保，每天自带干粮为大军运粮，一个来回有三十多里，每天坚持运两次，他说：

“我年老力衰，一次挑不起二百斤，但为了给大军运粮，可以多跑一次。”他的邻居邹洪元，是一个瞎子，家里很穷，靠打草鞋为生，因为农会曾分给他两石谷子，帮助度过了春荒，他感激不尽，主动报名为大军运粮。傅新保劝他：“莫作孽，你眼睛看不见，怎么运得粮呀！”他说：“新保公，你就做个好事，在路上搭我一把，保证你走一丈，我走十尺。”一天，他挑着谷子，走到大额头坳上，摔了一跤，脚部碰破了一块皮，鲜血直流，傅新保马上扯来草药，帮他包好伤口，嘱他把谷子寄在这里，明天帮他担去。但他不同意，强忍着剧痛，跛着脚，硬把粮挑进了梅城。第二天，他又照常来运粮。

为了使解放军伤员早日恢复健康，县委还在培英堂设立了“安化县伤兵招待所”，由党员张文毅负责，协助部队医疗卫生队工作，从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六日止，共办了半个月。许多伤病员治愈后，怀着对安化人民的感激心情，奔赴了前线。解放军南下时需要知识青年入伍补充新鲜血液，县委立即动员，很快就输送了四百多名知识青年随军继续南下，向衡（阳）宝（庆）进军。

追歼白崇禧部的“衡宝战役”打响后，一四七师奉命取道新化，向邵阳进军，县委组织了三千多人的支前队伍，帮助运送弹药、粮食，抬担架，派出五十名骨干担任向导、侦察和联络工作，还调去湘中一支队三团，按照一四七师的部署，配合作战。部队由蓝田出发，直攻邵阳，在尖山岭与敌三〇七师遭遇，激战一天，歼敌三十余人；缴获大炮二门，各种枪枝一百多支。一四七师邓贵卿师长，给中共湖南省委发了电报，表扬安

化县借粮工作出色，支援前线有功，感谢安化人民对子弟兵的大力支持。

四、清 匪 反 霸

一九五〇年春节刚过，益阳地委又立即开展清匪反霸，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过去湖南土匪横行，危害乡里。益阳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分子与少数反动地主和匪特互相勾结，到处破坏，组织抢粮，阻碍运粮，奸淫掳掠，造谣破坏，放火杀人，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不安，对革命政权危害极大。湘乡县杨家滩和娄底一带，汉寿县酉港等地，时有土匪骚乱。致使当地工农不安心生产，商贾无法正常营业。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安化县东坪发生了“二八惨案”，桃源天主教传教士陈枚士，勾结桃源土匪头子王逸志，纠合匪众260余人，由土匪头目郭炎、唐东初、宋董安率领，分三路长途奔袭东坪。当时我东坪区政府有南下干部七人，只有独立团一个班警卫，敌众我寡，在战斗中我区委书记韩侯、区长申林、区委秘书王耀卿、区武装干事李传录以及一位刚参加工作的新干部共五人，及武装班战士九人，均壮烈牺牲。针对这一情况，地委迅速成立了剿匪司令部，由益阳行政专员公署和益阳军分区联合颁发剿匪布告，晓喻全区军民。三月二十四日，我们组织全区武装部队兵分两路，大举进剿土匪。一路由孙洪、杜一夫同志带领军分区大部分武装去安化剿匪。他们与桃源部队配合，迅速歼灭了股匪，生擒了匪首郭炎、唐东初、湛象文，后被公审枪决。另一路由我带领军分区一个营，协同主力部队到湘乡县西部剿匪。为了扩大剿匪队伍，地委还动员了当时在益阳干校学习的大批学员，到各县协助剿匪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法令，维持革命秩序，保证地方治安。剿匪大军进驻安化、湘乡后，我们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孤立

匪众，坚决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宽大政策，对个别为首纠集土匪武装作乱、残害人民、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罪魁，召开审判大会，公布罪行，坚决镇压。对外逃者，我们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追剿通缉，归案法办。对率众自动投降或携械投诚的匪首，按其立功大小，分别给予奖励。对在战场上自动投降者，准予立功自赎，从宽处理。党的肃反政策，对瓦解匪众起到了积极作用，全区有数百名胁从者在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向区乡人民政府投案自首，悔悟自新，办理登记手续，交出了武器、弹药、文件。有的人还向人民政府检举匪特秘密组织和潜伏的武装特务，并主动带路，协助政府追捕缉拿匪首，铲除匪患。我们在大力进剿的同时，又挑选一批出身贫苦的青年农民，经过武装培训，迅速建立民兵组织，在交通要道增设哨所，日夜站岗放哨，指挥交通，维护治安。这样连续战斗了三个多月，基本上肃清了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经过接管政权、借粮支前、清匪反霸，为全区农村创造了开展土地改革的条件，为彻底摧毁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陈乐群整理)



回忆解放初期益阳地区 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史 平*

一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通电起义，人民解放军进驻省会长沙，湖南获得了和平解放。在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向南挺进的时候，我们接管益阳地区各级政权的南下大队，于八月十三日到达益阳县城。这个大队在地委书记周惠、第二书记兼益阳专署专员郭清文率领下，迅速接管了湖南第五专署及其所辖的益阳、宁乡、沅江、汉寿、湘乡、安化等六个县的政权，并立即开展了筹粮支前，收编游杂武装，清匪反霸等一系列工作。当年冬天，又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减租退押。这样很快安定了社会秩序，顺利地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前后不到一年时间。这实际上也为一九五〇年秋季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个局面的迅速开创，主要是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积极努力、发奋工作的结果。此外，在整个益阳地区发动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做好各地中小学教师和大批学生的思想工作，也是当时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作者当时任益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现为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顾问、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二

我们一进入益阳地区，就发现了一个不同于老解放区的情况。八月十六日，我找到一位小学主事了解情况。他告诉我：仅益阳就有省立五师、龙州师范、教会办的信义中学、县立中学、县立职业学校、商业职业学校等，还有豫章、五福、林翼等中学，在乡下办的则有斐英、育才、五州、蛇山、修山、广威、武南等十八所中学；全县完全小学有一百二十多所，初小达一千一百二十四所之多。这就是说，湖南益阳地区的教育事业是比较发达的，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我把这些情况向郭清文同志汇报后，他对我说：“新区有这么多学校，我们过去是没见过过的，这与我们在华北时一个地区只有一、两所中学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要有适应新情况的思想准备。地委决定你兼专署的文教科长，主要抓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从此，全地区的青年工作和文教工作就都由我负责了，地委负责人周惠、郭清文、秦雨屏等同志对此十分关心，经常给予指导，使这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益阳地区的中等学校到一九五〇年夏季统计，仍有省立中学和师范等四所，县立中学十所，私立中学二十一所，共三十五所。有教员七百一十六人，学生一万多名。实际上人数还不止这些。比如沅江县中学，原有十个班，学生近四百人。解放初期参军参干后，至一九五〇年夏还有学生二百七十人。可见原来教职员、学生人数还要多些。工作份量是比较重的。

进入地区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全部瘫痪，百废待兴，要恢复生产，恢复商业，恢复交通，还要复课。但是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开展。当时刚刚解放，人民扬眉吐气，残留的匪特却在阴暗角落里散布谣言，进行破坏。八月中下旬，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来空袭，并传说国民党军队要在衡宝线一带组织反

扑。当地匪特造谣说，共产党来了，夫妻要重新搭配，南方女的要配北方男的，年轻的要配年老的。虽然这些谣言很快随着国民党军队从衡宝线上溃逃和人民解放军与县区干部同群众的接触而烟消云散了，但各阶层群众中还是有不少人对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或抱有顾虑。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时是活跃的，他们中有一批地下党员和受党影响的积极分子，有的看到过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懂得人民解放军南下时的约法八章。显然，利用知识分子去宣传扩大党的影响势在必行。我们很快同地下党的同志一道，发动了益阳县城关的教员、学生和一批青年组织了一个临时性的城关区宣传队，在城乡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号召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庆新中国的诞生。这些同志在宣传胜利形势、鼓舞人心、安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各县城关和各乡镇也依靠当地中小学开展了类似的宣传活动。地区出版的《湘中日报》在发动和组织全区的宣传工作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冬，我们利用各校寒假的机会，在益阳县中学举办了一个寒假学园，召集全地区各个中学和部分完全小学的教师代表进行了短期的学习。主要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还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讲座，目的在于使大家能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及奋斗目标，从而团结一致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这个学习班时间不长，收效很好。来参加学习的教员情绪饱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益阳地委及时肯定了这种有效的学习方式。

经过这次寒假学园的活动，我们对全区的中学情况和主要负责人有了一定的了解，全区的中小学到这时已全部接管，广大教员的情绪也基本上稳定了。随后专署文教科长由益阳县的进步人士林柏森担任，这是益阳地区解放初期第一个由党外人

上担任的科长，副科长由李仲麟担任。我即调地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兼统战部副部长。林柏森同志在解放前主持过长沙的蔚南女中，同我地下党有过联系，思想进步，作风朴实，很有威望。李仲麟同志是地下党员，年轻，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在一大批正直诚恳的中学教师支持下，很快打开了全区学校工作的局面。

三

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开始后，全区人民对此极为关注，我们又抓住这一机会对全区知识分子进行宣传教育。

益阳地区的中学有很大一部分是私立学校，并且或多或少占有田产，学校的领导权不少是掌握在地主豪绅或他们的代理人手中。教员和学生的绝大多数是城乡清苦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或因家庭关系，或得到族学、地方势力的资助，同土地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首先做了提高他们对土地改革的正确性、必要性的认识的工作，很多与土地有牵连的知识分子都提高了觉悟，能正确对待这场运动，不少人还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

广大知识分子是反帝爱国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几十年来对共产党的恶意宣传和当时崇美、恐美心理的流行，在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就难免存在着一些疑虑和模糊认识。为此，我们于一九五〇年暑假和寒假，分别举办了学园活动。参加的人员是全区中学教员和部分完全小学教员以及一些中学生代表，人数最多时达到一千多。主要进行时事政策和形势教育，按教员和学生分别编成班组，提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风，发扬民主，交流思想，提高认识。大家都心情舒畅，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在二十多天的学习中，我们还开展了建立青

年团的工作，发展了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学园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地委和各县委青委的负责人、干部等。他们同广大教员、学生朝夕相处，推心置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体现了建国初期我们党同知识分子的良好关系。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集中学习的办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因为广大知识分子都自觉地提高了思想觉悟，而不是被迫的，说明知识分子对党、对新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记得一九五一年二月，益阳地委针对寒假回家的学生，向各县发了这样一份文件，指出：“一、应以积极态度争取团结回乡学生，他们愿参加土改者，应欢迎；有怀疑不满者，应向他们教育解释，不要采取敌对排斥态度，即使有错误，一般可以劝告教育，罪恶大者由政府出面处理，不能交农民斗争。二、地主家庭的学生带回去的衣服、被褥、行李、书籍、文具等一律不准没收。如家庭财产全部被没收者，应适当按农民一样分给一份。”现在看来，这个文件在当时是合乎实际的，并起过积极作用。在全地区一年多的全面土改运动中，始终没有发生过来自知识分子的阻力。相反，大批教员和学生都自觉地投入了运动，并且表现很好。此外，经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觉悟也有了提高，民族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当时不少青年学生还听从党的召唤，踊跃参军，奔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如现任湖南省委对台办副主任范重平同志就是当时参军的。

四

解放初期，广大知识分子的进步是迅速的。记得我们一进入益阳地区，一大批知识分子就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革命大熔炉里来了。当时，益阳地委举办的益阳干部学校招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大批是知识青年，他们当中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父与子一同来学习，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也有仅经过

几天的学习)就编入了地区和县的各种工作队,到实际工作中去发挥作用并接受锻炼,为开辟新区工作做出了贡献。

另外,还有一批有专业知识的教员,转到各条战线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前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就失业了,不失业的也有许多人用非所学,无处发挥才智。这些同志在解放后大多根据自己所学,投身到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化等各个岗位,成为这些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入了党,成为了共产主义战士。至于广大中学生,许多人都积极参军参干,也有些人考上了大专院校,后来还出国深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家学者。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所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失误也不少,好在我们比较及时地纠正了。省政协文史办毛注青同志要我写一篇回忆文章,我想这些事情今天看来也有一点现实意义,就匆匆写了这些交卷。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平江接管前后的回忆

梁 书 文*

我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进入平江县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初调离，前后将近两年。这一段战斗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进 军 县 城

一九四九年二月，当党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按“抽强留弱”的原则，组成五十万南下大军时，我在山西省晋中行署一专署任民政科长，被通知随军南下。当时齐寿良同志是晋中行政区忻县县委书记。该县抽调一百一十多人组成了南下工作团第三大队。这个大队于三月十五日从忻县出发，首先到石家庄郊区塔钟村集中，约于四月初由塔钟出发到河南巩县，一边待命，一边修整。这时上级对干部配备做了一次调整，我就是这次调到忻县南下工作队的。约在五月初从巩县出发迂回到南京，稍事休息，即改乘轮船到达武汉，再经过湖北通城，越幕阜山，于七月十八日进入平江县城。当我们随军进入平江县城时，锣鼓声、鞭炮声和列队群众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县城顿时沸腾起来。其时我在行军中感染了痢疾，身体虚弱不适，是带病入城的，但在这欢乐的海洋里，一切病痛都忘得一干二净。

*作者原系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当时任平江县委委员、县政府副县长。

我军入县城前夕，平江县旧军政人员，已仓惶撤退城外四乡，城内被掠夺一空。我们首先组建了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班子。县委书记齐寿良，组织部长郑先存保，宣传部长王斌，武装部长张世乙。县政府领导成员是：县长齐寿良(兼)，副县长梁书文(县委委员，分管政府工作，同年十月改任县长)，公安局长郭兆铭(县委委员)，县政府秘书曹杰仁，民政科长张定域，财政科长李浣泉，建设科长吴振南，粮食局长骆奇勋，合作科长史付桂，工商科长兼银行行长史付银，教育科长(缺)由科员李曙初代理，税务局长曹志仁。接着县委又任命了六个区的党政负责人。县、区两级领导班子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二、征粮支前

平江是我军进入湖南的重要通道。湘潭市委、湘潭县委、长沙县委、浏阳县委及醴陵县委都必须经过平江才能到达各市、县开展工作。从平江过境的解放军，有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的六个师，再加上炮兵部队、后勤机关共计九万余人。如何克服各种困难，保证大军的后勤是一项十分紧急的任务，我们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的社会力量，迅速组成了平江县支前委员会(临时性的群众组织)，成员三十余人。各区亦相应成立了支前会。县政府宣布所有保甲人员均继续奉职，为人民立功，不得玩忽职守。同时，我们采取了向富裕户实行借征、秋收后抵交公粮的临时措施，比较迅速地解决了支前需粮的紧急问题。这种借征办法，自然触及了地富阶级的利益，因此，一些人心怀怨恨，但又不敢公然抗拒。于是玩弄阴谋，盗用当地一些老同志的名义，诬蔑共产党“不顾群众利益，横征暴敛，挥霍浪费”。这些老同志，明察秋毫，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并在《湖南日报》多次发表文章予以揭

露，这不仅给别有用心的人一个迎头痛击，同时对平江县的支前工作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九月初召开了全县秋征工作会议，仅用一个多月时间，约计征收公粮660万斤。尤其是翻身群众交粮十分踊跃，他们说我们现在交的是“解放粮”、“翻身粮”；有的还要求我们增加收粮点，增加过称人员。县委对征粮干部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要态度和藹；二要随到随收；三要注意质量；四要每日结帐上报。这也是征粮工作能顺利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安 定 人 心

平江解放前夕和初期，有些群众对共产党不了解，有的携眷外逃，有的闭门不出，有的变卖家财。

为了安定人心，我们广泛深入地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大量张贴印发有关我党我军政策的布告，并通过各种形式，做思想工作。说到这里我想插叙一个不幸的事故。

事情是这样的：八月初的一个凌晨，平江县城驻军某部一个新兵在练习射击时，枪枝走火，正路过此地的祖孙两人同时中弹，不幸身亡。事故发生后，平江城内议论纷纷，我们立即召开了党政军民联合座谈会，决定对肇事者予以逮捕，对死难者家属由县长率各方代表前去慰问并给予抚恤；并在第三日召开追悼大会。追悼大会那天，会场张贴了一副对联：“大敌当前，操练失慎，误伤人命；鱼水相依，追悔莫及，共吊亡灵”。在追悼会上，我们将肇事者带到现场。到会群众包括死者家属，惟恐我们对这个不慎走火的战士处理过重，一致要求免除刑事处分。这件事由于我们处理及时得当，得到了受害者家属的谅解和群众的称赞。也收到了宣传政策的效果。

四、解除游杂武装

在开展支前、安定人心工作的同时,如何抓紧有利时机,迅速解除游杂武装,这是长治久安的大事。平江的游杂武装,主要是县长江溢清率领的县政府的全部人马和三个警察中队,张杰率领的平江第一自卫大队,戴子涛率领的平江第二自卫大队,以及活动在平江东南部和东北部的李高峰、魏农清、胡次云等率领的游杂部队共约二千多人。由于他们已走投无路,内部出现了分化瓦解迹象,因此,我们相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能够审时度势,选择自己的光明前途。基于这种分析,我们采取了“攻心”的对策。除正面进行政策宣传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军政人员的至亲好友和各种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去晓以大义,转告他们只有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办法见效很快,原警察局的一个分队,在分队长朱定华率领下向我投诚了,继而第二自卫大队大队长戴子涛也率领全部人枪(二百五十人)也向我投诚,除魏农清惯匪外,其余均先后放下武器,归向了人民。魏匪最后被我剿灭。

五、培训干部

平江解放后,外来干部仅一百多人,需才孔急,县委采取积极慎重的组织方针,利用启明女子师范校舍,举办干部短训班,时间约十天,招收具有高、初中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先后共办了四期,培训干部三百六十人。加上从地区建设学院分配来的毕业生,党训班派来地下党同志和在各项工作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县委和县政府共吸收干部五百多人。县委一再强调“新老干部的团结”,号召“老干部要以身作则,遇到困难,带头突破”。实践证明,广大新干部在老干部帮助下,工作努力,成为各个部门的骨干,为平江县解放初

期的建设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恢 复 生 产

为了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县、区均成立了生产领导委员会。吸收各界代表和县里的知名人士如唐炳初、丰肖知等参加会议，一起研究工作。在刚接管平江之后，我们首先抓了被国民党破坏了的大光电厂的抢修工作，我们组织人力，经过二十天的苦战，于八月中旬就使电厂恢复了生产，县城又重放光明了，这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我们对颇负盛名的平江土布生产，也采取了扶植措施，对由于缺乏棉纱与销路不好而被迫停产的二千多户靠织布为生的居民给予了帮助，让他们恢复了生产，并对他们实行免征税收、发放货物、供应棉纱、解决运销的优惠政策。这样就使整个平江的纺织工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在农村，我们发放了救济粮七万斤，货物八十万元。采取“各种作物，谁种谁收”的政策，使农民顺利地度过了灾荒。

以上所述，仅仅是平江解放初期，在接管旧政权后开展工作的一些片断回忆，很不全面，也难免有错误之处，有待知情同志补充指正。

回忆对湘潭财经的接管

杨 恺*

回顾湘潭解放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清晨，在白色恐怖下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斗争中迎来了黎明的湘潭人民，从四方八面聚集到一起，怀着迎接光明，迎接解放的激情，喜气洋洋地迎接解放军进城。当时火车、汽车都不通行，靠湘江船运，迎接的人们自觉地坐在街道两旁。下午四时，从长沙方面驶来的船队到了。顿时，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雄赳赳、气昂昂的解放军队伍进入了湘潭，从此湘潭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湘潭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湘潭市工委在湖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团结各界人民开展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征粮、反征税、反征丁”的斗争。解放前夕，针对敌人的破坏阴谋，开展了“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的斗争和群众性的护厂、护校、护店等活动，并成立了湘潭市各界迎接解放和平委员会。

刚解放的湘潭，敌我阵线还很分明，从柵木桥、中路铺以北是解放军，茶恩寺以南是白崇禧部的兵，其间还有一个游杂武装活动地带。我地下党在一九四九年大军渡江前组成的武工队有四十多条枪，由唐杰带领，分三个分队，主要任务是保卫下摄司电厂和县、市工委机关。一支驻扎在东平镇荫梓屋场附

*作者当时是湘潭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现为株洲市政协主席。

近。当时我正规部队都投入潭宝战役，武工队担负了保卫新生政权和维护社会治安等艰巨任务。我南下工作团进城时，湘潭武工队随之入城会师。

和平解放湘潭，并非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后就完成了。湘潭解放前夕，湘潭地下党从各个方面作了敌我友三方的社会调查，发动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与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同时还做了策反以及建立地下武装等工作。当时驻在湘潭的部队是陈明仁的两个师，一个师驻扎湘潭街上，一个驻扎在易俗河附近。南下工作团接管湘潭后，我一三八师驻扎在文庙。当时湘潭县长吴声鎬（湘潭人）是白崇禧的亲信、国民党少将高参，这是白崇禧逃跑前安下的钉子。一九四九年五月，程潜原已派马良骥任湘潭县长，没多久，吴声鎬在白崇禧所谓“军政一元化”的号召下，竟带一营国民党的军队包围了县政府，武装夺取了县政府大印，自己当了县长。从此桂系势力控制了湘潭县。国民党县党部有党、团两派，他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都没有跟程潜、陈明仁弃暗投明的打算。也是和平解放湘潭一股较大的阻力。白崇禧虽逃跑了，但并不甘心，扬言要在古历八月十五日打回长沙过中秋。国民党飞机也天天在长沙、湘潭上空扫射侦察。特务趁机制造谣言，破坏社会治安，斗争十分尖锐，情况非常复杂。

南下工作团进驻湘潭后，八月十八日在湘潭新群中学（现湘潭市第二中学）与地下党城工委所属党员胜利会师。会师后的工作很多，而最重要的：一是支前，保证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二是搞好接管和清匪反霸工作，巩固革命政权。当时湘潭县委指示，征粮支前、接管和清匪反霸分途进行，因我对城市情况比较熟悉，解放前又作过一些调查，故分配我负责接管财经工作。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作好全县的接管工作，市内接管分成

军政、文教、财经三个组，由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员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同志混合编成。我负责财经组，参加财经组的还有李万通、崔庭俊、李隆大、贺昭武等同志。

当时百业凋敝，工厂很少，属于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只有湖南省银行湘潭分行、中国农民银行、复兴银行、税务局、盐务处，另外有一个民生工厂。完成对它们的接管，对稳定物价、安定人心、恢复生产秩序都会有极大作用。

我们在接管前反复学习了党的城市接管政策，即入城的八条规定，并详细具体地分析了已掌握的各被接管单位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地下党和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在一九四九年上半年调查的部份资料。还分析了被接管单位人员在湘潭解放后的思想动态。同时吸收被接管单位的积极分子，聘请专职会计和熟悉财经工作的同志参加接管。

接管开始后，我们每到一个单位，即召集全体职工和武装人员，向他们宣传党的城市接管政策，宣布对所有被接管单位的职员、工人，仍实行原职原薪，以稳定情绪，迅速恢复生产。还宣布了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不许隐藏现款、实物、枪支，不许私自逃跑、暗中破坏等要求。我们依靠工人和中、低级职员，摸清了进步人员名单和个别反动分子的情况，分别找他们谈心，根据不同情况，开展思想工作。对所移交的各种物资、资料和档案均严格对照审查，防止隐瞒伪造。接管工作基本上能顺利进行。除民生工厂个别负责人（周姓，原系国民党军官）抗拒接管，受到惩处外，一般都能积极参加移交和清理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护盐斗争。这是发生在接收盐务处以前的事，但与后来能完整地接收盐务处有直接关系。食盐是一种敏感的物资。抗日战争期间食盐奇缺，一石谷兑一斤盐，解放战争期间食盐供应也一直紧张，居民普遍存在怕闹“盐荒”的

思想。掌握了食盐，对稳定民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湘潭盐务处的几个食盐库里有存盐五百多万斤，如何保护这一批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是当时地下党的一项重要任务。那时国民党湘潭盐务处长黄勉夫是民革组织成员，他向我们提供很多内部情况，我也以记者身份多次采访他，了解了存盐及盐务处人员的情况。这为我们接管盐务处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晚，陈明仁所属国民党第八十师一个团，拒不参加起义，假借名义，率部队从长沙经株洲窜至湘潭往衡阳逃跑，企图投靠白崇禧。这个团的部队逃经湘潭城时，得知国民党湘潭盐务处有大批存盐，于是指挥一部分军队打开一个盐仓，抢走了存盐百多袋，有的拿到市场上抛售。我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劝阻居民不要购买，收效很好。为了切实保护好余下的存盐，地下党城市工委一方面要原盐务处职工严加看管，不许坏人乘机拿走分散，在这一斗争中立功；同时由地下党员屈秉生、冯柏华发动搬运工人、私营工商业者、城市居民共同保护食盐。八月十一日以刘旭同志为首的湘潭县委进入湘潭，杨第甫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兼湘潭县长。县委对保护这批食盐也非常重视，指示李克孝（原地下党县工委书记）和我立即赴长沙向省委请示解决办法。当时湘潭至长沙的火车、汽车已全部停开，轮船往来也不正常，长沙市还处于戒备状态。为了及时赶至长沙，我跑到湘潭电机厂，找到了当时接管该厂的军代表陈光同志，向该厂借了一部吉普车，当天上午和李克孝同志赶到了湖南省委临时办公地址——湘雅医院。医院内解放军和干部出出进进显得非常繁忙，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找到了罗正坤同志，由罗介绍见到了湖南和平谈判首席代表、长沙军管会负责人金明同志。我简要汇报了湘潭当时处于真空状态，五万担食盐部分遭抢掠的情况，请迅速派解放军进驻湘潭，全面维护治安，保护好城市。金明同志要我写个简要报告给程潜

省长，同时指示我们发动工人群众和积极分子共同看管和保护好食盐。接着，李克孝同志找到了原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周里询问了湘潭迎解的准备工作以及地下党员思想状况。我们都作了简要的汇报。省委领导同志反复叮嘱我们要完整地保护好城市，特别是当前迫切需要的各类军需民食物资，以保证供应前方解放军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

为了传达贯彻省工委指示，当天下午四时，我与李克孝同志乘车回湘潭。车到黄土岭出长沙城时，解放军佩戴警备军管袖章，手持红旗，阻止吉普车前进。因为长沙市已宣布戒备，大小车辆只准进城，不准出城，出城需要军管会许可证。这时，我们心急如火，只好趋车返回湘雅医院，找到了周里同志，请他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军管会，军管会在信上盖了公章，我们将许可证交了解放军，才出了城，这时天已黑了，到湘潭时已是半夜。

第二天上午，我们向湘潭县委刘旭书记及副书记兼县长杨第甫同志汇报了金明同志的指示精神。县委按照金明同志意见作了具体部署，主要是发动工人、学生、进步分子采取各种保管好食盐的措施，同时装运一部分存盐到其他地方保管起来。这批食盐直到解放军一三八师进驻湘潭，才移交给湘潭地区盐业公司。我们接收盐务处的几十条枪及部分黄金、银元、旧币等则移交地、县有关部门，请予按册核实验收。国民党抢走的七、八十包盐，也终于被追回来了。

当时拒用人民币之风甚炽，交易有用黄金、银元或以物换物的。我们则将追回的几十包盐投入市场，只收人民币，不收银元、黄金。这样一来，很快就稳定了市场和民心，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威信。

（株洲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我所知道的新化两次解放

刘 道 源*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这是我不能忘怀的一个日子，那一天新化正式宣告和平解放。我作为起义人士，有责任追述当时的情况。

新化和平解放前的形势

新化，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十县（市）之一，在前六区所辖七县一市中，最先举起和平起义的旗帜，仅比长沙和平解放晚八天。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国民党新化县党、政、军、警人员二千余人，为首者是当时的新化县县长伍光宗。

伍光宗是一个在反共营垒里谋生二十余年的陆军中将，他是新化县横阳区三塘乡老屋场村人，出生于一九〇一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曾任国民党陆军预备第四师少将副师长（师长是傅正模）、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中央军官总队中将副总队长、湖南全省保安司令部集训处中将副处长、湖南军管区中将高参等职。一九四七年底，他辞去中央军官总队中将副总队长的职务，回到了湖南。他受到同乡好友马子谷等爱国人士的启发，对共产党、毛主席提出的实现国内和平的主张有了理解。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伍光宗对国内形势有了正确的估价，坚定了跟随程潜将军走和平解放湖南光明

*作者当时跟随伍光宗一道起义，是伍的表侄，现任新化县政协常委。

道路的决心。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潜委派伍光宗回家乡新化担任县长，他于四月五日离长回新化上任。和伍光宗县长同车到达新化的还有李孝先、伍子凤、李才键、邹今揆（民盟）等人。

湖南地下党省工委对新化迎解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随同伍光宗来到新化的李孝先，就是党派来新化担任地下党总支书记，加强党对新化迎解工作领导的；同时，省工委又委托马子谷推荐李孝先担任新化县政府主任秘书。伍光宗来新以前，马子谷、姜和瀛、魏镇等受省工委的委托，事先在长沙召集伍光宗、伍子凤、李孝先、邹今揆、李才键等具体研究了新化的迎解工作方案：一、伍子凤回新化帮助胞兄伍光宗主持县政府工作；二、伍县长必须高度信任李孝先；三、团结原有官员，迅速安定人心；四、从长沙带一批亲信骨干回新化，掌握县政府、自卫总队、警察局的实权；五、扩充地方武装，争取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到一个师的兵力；六、依靠和保护爱国人士，争取群众支持；七、取得湘中一支队的支持；八、事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等待时机举行起义。

李孝先同志到新化后，于同年五月建立了新化和锡矿山两个地下党总支，李孝先任新化总支书记兼锡矿山总支委员，颜述之任锡矿山总支书记兼新化总支委员。李孝先为使总支成员正确认识新化形势和正确对待伍光宗县长，特将省工委指示及伍来新充任县长的意图，分头向总支成员作了介绍。指出只要把伍光宗的工作做好了，新化的和平解放便无问题。总支成员随同李孝先同志看望了伍县长，并公开向伍县长转达了省工委对伍县长的期望和要求。伍县长当即表示一定走和平解放新化的道路，请省工委领导放心。

伍县长到职后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宣布：“凡自愿继续工作者，一律留用”。接着，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自己带来的二十多

名亲信骨干，充实到县府担任重要职务。李孝先被任命为县府主任秘书，伍子凤任县府顾问，邹今接任县府民政科科长，杨华俊任县府机要秘书，周普霖任县府人事秘书。我是伍县长的表侄，当时被任命掌管县府所有文件的收发。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掌握全县军权。第一步将自卫总队六百余人枪，整编为两个大队，六个中队，伍光宗亲自兼任总队长掌握指挥权；撤掉与自己争权的唐止戈的总队附职务，提升周不让为总队附；任命老部下李才键为参谋长，堂弟伍静波为军需主任。第二步撤销警察局所辖的警察所，改编为五个保安警察中队，直属警察局领导，并规定统由自己指挥。第三步扩大县政府的警卫武装力量，将县政府警卫队改为警卫大队，加配轻重机枪，充实人员，任命同乡亲信伍云卿为警卫队长。同时，充实县长的随身警卫武装力量，由原来二人扩充为八人。第四步，控制部分乡的武装力量，掌握这些乡的政权和军权。第五步，将在乡军官会改为军官大队，由自己兼任大队长。第六步，对自卫总队、警察局所辖武装骨干进行全面摸底，随时掌握思想动态，指使亲信暗地监视对迎解工作有反感的人，提防他们捣乱。

伍县长通过以上措施，地方武装的指挥权已基本操纵在手，为和平解放新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化的第一次解放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长沙和平解放。八月六日，邻县安化也宣告解放，李孝先和伍光宗得悉后，立即派代表刘泉清、谢骥良、周裕凡前往安化县城同我解放军一四七师首长联系商定有关和平解放新化的事宜。伍光宗在县府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在会上谈完当前形势，表示要效法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脱离国民党政府走和平解放道路，并宣布率部起义、和平解放新化、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决定，希望到会人员拥护

决定，服从命令，同他一起走和平起义的光明道路。八月十一日下午，前去安化的代表来电，一四七师先头部队今晚进城，后续部队定明天子时进城。李书记和伍县长为了解放大军迅速横渡资江进入县城，立即部署力量架设浮桥。当晚刘泉清等陪同一四七师政治部副主任傅东华、供应部长赵治安率先头部队从县城北郊、资江对岸塔山湾码头乘船渡江，李孝先、伍光宗、文诚先、潘宗信等率各界代表到江边迎接。李孝先、伍光宗等陪同一四七师首长一道进入县政府，先头部队住在县立女中。当晚深夜，伍县长通电各乡镇公所，向全县人民公开宣布起义，命令全体军政人员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新化，并号召全县军民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热烈庆祝新化和平解放，积极支援前线。六月十二日凌晨，一四七师后续部队进入新化县城，沿途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县府职员连夜赶写欢迎标语。八月十二日清晨，欢庆标语贴满县城内外。当天下午，在原国民党县党部礼堂，召开了新化县各界代表一百多人参加的庆祝新化和平解放的大会，伍县长代表县政府和全县人民迎词。之后，方鼎英代表各界发言，表示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新化。解放军一四七师政治部副主任、代理副师长傅东华代表解放军讲话，对县长伍光宗选择的光明道路表示赞扬，号召全县人民同解放军并肩战斗，战胜敌人，早日解放全中国。当天下午，新化《明报》头版全文报道了伍光宗县长率部起义和平解放新化的宣言。当晚，还召开了军民联欢晚会。

我军一四七师解放新化后，乘胜向邵阳挺进，先头部队很快伸入到了新化、邵阳两县边界地牛山卡。八月十八日，一四七师又奉命进行战略撤退，决定暂时退出新化回到安化县城梅城休整和驻防。在撤退前，一四七师师长郑贵卿等在新化县城新庄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上级命令和撤退意图，共同研究了撤退方案，会议决定由湘中一支队负责湘乡与新化

之间的警戒任务，由伍光宗、李孝先率领新化的起义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配合他们同时撤离新化县城。

新化的第二次解放

八月二十日晚上，我军部队和伍县长率部撤离新化县城后，国民党十四军十师张用斌部又进犯新化县城，国民党六十二师同时进犯了锡矿山镇。谢孟良等带领军官大队直属区队投靠了敌人。敌十师进驻县城后，师长张用斌即委任唐吉俊代理新化县长，重新组成县政府，并颁发“新化县政府印”临时木印一方，委派谢孟良为新化突击总队长。以谢孟良为首的原在乡军官大队改为“新化突击总队”，下设两个支队四个直属区队。敌军和县政府重新统治新化人民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血洗伍光宗兄弟全家，要活捉共匪头子李孝先，通缉叛匪头子李才健、邹今揆等。敌十师布置两个团的兵力防守在县城沿河，修筑战壕、碉堡作为防御工事。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驻到伍光宗县长的家乡监视伍光宗兄弟的家属。

九月初，伍光宗与魏镇率部一路到达安化县城同解放军一四七师胜利会师后，两人同时奉命调省另行分配工作。伍光宗被调任陈明仁部副军长，但因新化尚未再次解放，伍暂不愿赴任，请求上级党组织批准待新化第二次解放后再调动，上级同意了伍的要求。

伍光宗、李孝先在安化期间，为配合解放军第二次解放新化，曾从安化多次派员到新化境内联络起义乡长胡念坤、刘华黎、李勃等，指示他们设法收集枪支、子弹运到新、安两县边境，为织建新化县地方兵团突击大队提供武器。

我人民解放军一四七师，奉命于九月中旬从安化兵分三路挺进新化，左路兵力从锡矿山线进军，中路兵力从吉庆线进

军，右路兵力从圳上、白漆线进军，三路兵力齐头并进，向新化形成包围圈。中路部队于九月二十日左右到达鸡叫岩，左右两路部队于九月二十七日相继到达了陶塘镇附近和白漆。同时，伍光宗、李孝先也率部紧随一四七师从中路挺进，我也参加了。我军左路部队在陶塘受到国民党六十三师阻击，激战三天三夜后才将敌军击溃，解放了锡矿山。激战中，我军牺牲教导员一名，敌军伤亡多人。我军右路部队在白漆过河时受到敌军十师阻击，经过十多分钟战斗终于取胜。中路部队从安化到塔山湾沿途无阻一路无战事，到十月五日（即农历八月十四日）黄昏，才同驻守在县城的国民党第十师发生激战。敌军为了阻止我军渡江进城，事先集中兵力死守资江两岸，上下几里密布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沿河大小船只全被封锁在资江两岸用兵看守，企图顽抗。我军为了一举击溃敌军，集中主力先驻守在资江东岸前沿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然后于十月五日黄昏时开始进攻，战斗打得很激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军无法顽抗，只好仓皇逃命。晚上十点左右就结束了战斗，我军迅速过河，先头部队安全进驻了县城，新化城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由伍光宗、李孝先率领的八十多名起义人员也和解放军一路进入了县城。

敌军第十师被我军击溃后，全部逃往邵阳。叛变投敌的县自卫、保安警察部队1,300余人枪在刘镇越、唐吉俊、周不让等带领下全部逃往洋漆、半山等地，企图负隅顽抗。我军进城后，留一部分兵力维护治安，大部分继续追击敌人。

新化第二次解放后的第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日，一四七师全体指战员，在全县人民热烈欢庆新化第二次解放的欢乐声中，同县城群众一起，热热闹闹地欢度了中秋节。

县人民政府未成立以前，由起义县政府暂时代行人民政权职责，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全力以赴督促各乡积极征集粮草，支

援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同时指定李才健任军事科长，主持维护县城治安和军事清理工作，确保通讯线路畅通。

十月二十日，上级党委派来的南下工作队一百余人到达了县政府，起义县长伍光宗表示热烈欢迎，妥善安排了住宿和生活。二十一日，中共新化县委和新化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尹之席任县委书记，赵文元任县长，苗静斋任副县长，县以下设六个区，各区人民政府和区委会也同时宣告成立。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起义县政府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办理移交手续前，由赵文元县长主持召开了一个联席会，县人民政府和起义县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到了会，双方互相握手致意。赵文元县长和伍光宗在会上分别讲了话。赵县长在讲话中代表县人民政府对伍光宗率部起义和平解放新化以及跟随解放军第二次解放新化的行动给予赞扬，同时还赞扬了其他的起义人员。赵县长讲完话后，宣读了邵阳地委任命伍光宗为邵阳专署民政科科长调令，伍光宗办完移交后前往邵阳专署上任。不久，又调任邵阳市副市长。地下党总支书李孝先继任县人民政府秘书长，兼任县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县立中学校长。其他起义人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本人被安排为县人民政府直属粮食仓库干部。

接管宁乡史事片断

周德民* 整理

解放前的宁乡县管辖二十个乡，一个镇，共有七十七万多人口。最末一任县长是张溉。解放前夕，宁乡有共产党的地下区工委三个，共有地下党员六百余人。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湘中一、三支队，湘中纠察总队拥有五千多人枪在境内活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如求实、求真、激流、大江等读书会、学会、学社的成员几乎遍及全县各中小学。他们大量地印发宣传资料，举办墙报、大字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军进军捷报，不断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为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以后，县乡保甲头目，惶惶如惊弓之鸟，有的设法向我地下党和游击队靠拢，有的携款远遁。唯有特务头目黄钟、胡民领等尚布置死党作困兽犹斗。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进军常德、长沙和株洲，势如破竹。活动在宁乡境内的各支游击队在地下党指引下，乘胜清剿残敌，抢占战略要点，保护桥梁、仓库和要道。打入城厢镇的地下党员则通过各种渠道保护文书档案、邮政电讯，护城、护厂、护校。

八月八日二十一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一四六师先头部队，在湘中一、三支队和地下党紧密配合下，从益阳方

*作者系宁乡县委党史办干部。此稿根据宁乡县档案馆有关档案材料编写而成。

面开赴宁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县城北门入城，直冲南门，占领南北通街，一举把盘踞在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截为两股，分割包围迫使敌人缴械投降。宁乡宣告解放。霎时全城鞭炮喧天，欢声载道，大街小巷开门欢喊，迎接亲人。

八月九日，宁乡地下党负责人周政、李平、伍健、何逸仙等率领大批同志进入县城跟解放军接头，向部队慰问和祝捷。全城秧歌锣鼓数日不断，盛况空前。

因为南下工作团还未到县，部队又要继续进军，政权接管工作暂时不能进行，于是由地下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研究决定，成立临时性的管理机构“宁乡县人民治安委员会”负责维持城厢治安，筹集军需粮草，支援过境部队。宁乡县人民治安委员会由李平任主任，成一介任副主任。随即何逸仙等也在石潭乡等地成立乡的治安委员会，开展借粮支前工作。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十二点左右，南下工作团抵达宁乡县城。二十六日即和县治安委员会及地下党负责人接头，二十八日在县城城厢镇东郊莓家田举行南下工作团和宁乡地下党同志的“南北会师”大会。会上正式决定成立中共宁乡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县委设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青委、妇代会等机构，县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文教科、工商科、建设科、财委会、人民银行、税务局、粮食局、邮电局、公安局等机构。由李瑞山任县委书记，吴玉玺任副书记，张继源任县长。县委、县政府各部门都有地下党员参加工作。并决定把全县二十一个乡镇划分为十个区、一个镇，成立区委会、区人民政府，城厢镇改名城关镇。八月二十七日向全县人民宣告宁乡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成立，在县城召开了庆祝大会。县长张继源召集旧政府及所属县城各机关留用人员训了话。讲解了党的政策，勉励他们服从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争取立功受奖。

二十八日开始进行接管工作。接管分民政组、文教组、公安组、企业组、交通组、武装组、司法组等七个组，在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分系统进行接管。首先是接管物资和文书档案。并对留用人员进行登记摸底，在安排工作的同时进行了了解和考验。

当时县委、县政府机关设在泇水北岸、离南门桥不远的骆公祠，即现在县酒厂所在地。负责接管工作的主要是南下工作团来宁乡的一百六十多个干部，还吸收一部份地下党同志参加。他们大都住在骆公祠，睡地铺，吃粗粮，白天分途工作，晚上碰头汇报。接管文书档案的工作主要由地下党负责。

国民党留下来的除了文书档案和一些机关办公用具以外，银行没有钱，粮食局没有粮。县人民政府从进行接管之日起就安排大批力量筹粮、收税。为了驾轻就熟，凡愿留下的原有税务人员统统留下，只是把国税、地方税合并起来征收。开始一天只收几万元，十天后，一天可收二十多万元。可见当时商业、手工业和工矿业生产的发展和恢复是很快的。为此，又在黄树、道林、双江口等集镇分设三个税务所。由于税务工作开展顺利，保证了当时必要的财政开支。

接管乡保工作需要大批干部，筹措粮草又必须在农村进行。为了充实干部队伍，“南北会师”后，县委随即在莓家田开办短期的“宁乡干部训练班”，头一期就抽调了一百多个年纪较轻、有一定文化的原地下党同志参加训练，然后与南下干部一同分配到各区成立区委会、区人民政府，进行地方政权的接管工作。乡村政权接管工作，首先是从八月二十九日以县城附近六个乡、三个区为试点开始的。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四日，县委、县政府派出三十多个同志到这些乡村摸情况、搞试点，主要是依靠地下党和贫雇农提供情况，当地一些小学教员、青年学生、开明士绅也主动配合工作队进行新政权的组建

工作。先成立三个区，后又成立七个区。区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保、甲长基本还是照常进行工作，鼓励他们戴罪立功，立功赎罪，立功得奖。直到土改前才改组。各区政府成立后，先后都召开了保甲长会、知识分子会，农民代表会、开明士绅会。我们的干部向他们讲天翻地覆的大好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讲革命前途，说明借粮的意义。除保甲长以外，还吸收一批活跃的知识青年和开明士绅参加征借工作。由于干部艰苦深入，宣传到家，坚持按政策办事，群众反映人民政府办事公道，作风正派，干部说话和气，联系群众。不但中农、小土地等积极交粮，地主，富农交粮的也不少。宁乡县一九四九年粮食总产量是三亿九千多万斤，我们借粮只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点五，负担合理，群众拥护，这也是接管工作中借粮任务完成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接管过程中，接管收编游杂部队是一项复杂繁重的工作。宁乡县委、县政府成立以后，根据上级指示，把这一工作交给湘中一、三支队分区负责。县政府只接管整编了属于湘中一支队四团的彭立人部。将该部整编为两个连。清洗了个别不宜继续留在队伍中的人，其余都留下来了。另有一支为地主掌握的武工队，经过说服他们放下了武器。为了保卫各区人民政府的安全，各区都成立了区武工队，他们配合剿匪部队在全县剿灭土匪三十七股，捉匪六百六十八名，促使自新的有一千二百零二名。共缴获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六挺，步枪一百五十七支，手枪九十八支，火箭筒一个，子弹一万多发。最后镇压了顽匪十八名。保证了地方的安全。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和支持，全县各界力量，尤其是开明士绅，和大批起义人员的协助，宁乡县的政权接管工作是比较顺利的。这为以后的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度荒、土地改革等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本文根据宁乡县档案馆藏《中共宁乡县委接管工作二十天情况汇报》和《进入宁乡工作一年总结》以及一些知情人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宁乡县委党史办供稿）



武冈解放的点滴回忆

李 守 义*

武冈是一座古城，素称湘西南重镇，明末桂王曾在此建都。城墙全用青石筑成，十分坚固。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和平解放通电发出后，全省大多数县都响应程潜的号召，宣布和平解放，武冈却不是和平解放的，是通过战争解放的。当时国民党武冈县军政界头头计有副师长黄范、团长苏治纲、县长邓英杰、省参议杨韶华、警察队长谢光明等，纠集大约三个团兵力，企图凭借武冈坚固城墙，负隅顽抗，以阻挡我军的进攻。在武冈四围城墙上分兵把守，巡逻放哨，临解放前三、四天，就紧闭城门，禁止通行，空气很是紧张。

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天津支队，担负着解放武冈的重任，他们前三、四天就到了武冈山城，对武冈形成包围态势。一面休整队伍，一面侦察情况，作攻城准备。征集民间梯子，扎成云梯，准备爬城，选择全城的制高点大炮台为突击点。十月十日黎明，发起进攻，先行炮击，继以轻重机枪火力，掩护步兵前进，整个大炮台被硝烟盖住，变成一片火海。此时守城敌军，为保住大炮台制高点，亦以凶猛火力，封城锁墙，双方争夺甚是激烈。我天津支队的突击连，如同猛虎一般，爬上云梯，奋勇越城，前仆后继，不顾牺牲，直到将红旗插上大炮台

*作者系党外人士，当时任武冈县中华基督教会负责人、武冈县首届各界代表大会副主席，现任武冈县政协常委。

之巅。占领大炮台之后，即向城内发起冲锋，敌军纷纷溃退，大部缴械投降。除敌团长苏治纲一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俘。如国民党副师长黄范、县长邓英杰、警察队长谢光明以及县府各级官员，都当了俘虏。我解放军天津支队在攻城战斗中，伤亡数十人，鲜血染红了大炮台下的野草黄花。整个战斗不到一个上午即告结束。

战事一结束，解放军出榜安民，各商店第二天就开门营业。解放军文工团穿红着绿，在大街上扭秧歌，不几天又在三义官演出革命现代戏《赤叶河》。人民群众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与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从而使军民关系日益融洽，闭塞的武冈山城，出现一派新气象。

武冈解放之后，由解放军天津支队，组成城市工作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王仲儒任主任，指派夏石泉、刘冠士为治安委员会正副主任，负责维持治安、征集粮草、支援前线等工作。在这段时间，一些被留用的区、乡旧职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也想争取立功补过，一时社会秩序，尚称安定。

十二月初，南下干部到达后，成立了武冈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尹子明，副县长徐然，秘书长高子才。其时，我是武冈县中华基督教会负责人，亲眼看到解放军指战员和共产党干部的作风，与国民党完全不同，从内心深处，敬佩和拥护共产党。一心只扭紧紧跟随着党，做些有益于革命的事。

一九五〇年三月，武冈县召开首届首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我被邀参加，经党组织提名，当选为大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并驻县办公。党、政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有：第一任县委书记李砚农，南下老干部，现在湖南省委工作；第一任县长尹子明，第二任县长李前义；副县长王仁轩、李长枚，县委组织部长丁磊等。在党的周围，还团结了许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如选出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周调阳，是个著名的老教育家，

常委石易安、夏石泉都是老知识分子。工商业者肖其先，工人代表管国才等，也都被选入领导班子，分管一定工作。这里可以看出，共产党历来就非常重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

一九五〇年六月，武冈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求县一级迅速建立人民法院，以便处理不断增多的民、刑案件，县委决定由人民政府县长李前义兼法院院长，由我兼审判员，在法院主持日常工作。不久由省里司法训练班派来六个人，其中三名审判长，三名书记员，成立了武冈县人民法院，由县长李前义兼人民法庭审判长，公安局长牟虎林为第一副审判长，我为第二副审判长，开始受理有关土改、镇反等案件。一九五二年春，我被任命为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武冈县召开首届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后，不数月，武冈县委又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农民协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镇反及土地改革运动。

当时，武冈四乡土匪滋扰，很不安宁。武冈第一任公安局长林杰，在湾头桥剿匪牺牲了；黄桥区政府区长李某被土匪打死；高沙区土匪密谋围攻区政府，幸得曾光炎（民主人士，解放初期任过高沙区治安主任）报信，作了转移，区干部得免于难。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保证人民政权的巩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及时发动了一个严厉打击土匪、整顿社会治安为中心的清匪反霸运动。经过清匪反霸，社会秩序很快趋于安定，土地改革也得以顺利进行。

（华南整理）

回忆锡矿山的护矿迎解斗争

颜述之*

紧 急 任 务

一九四九年冬初，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大军即将横渡长江，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

当时，蒋管区一片混乱，国民党政权正在作最后挣扎。世界著名铋都锡矿山也面临着灾难。根据各种情报，国民党将在逃亡之前抢劫锡矿山的近千吨库存精铋，并对工程处的百万元固定资产进行疯狂破坏。为了保护人民的矿山，挫败敌人的阴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决定在锡矿山建立党组织，开展护矿迎解斗争。

十一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全省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中心长沙市，我按照约定的地址，来到伍正心同志家里。省工委书记周里（化名唐同志）和我见面，委派我去锡矿山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并做了如下指示：

- 一、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保护矿山，迎接解放。
- 二、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 三、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 四、方法：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目前利益和长远利

*作者当时任锡矿山地下党总支书记，现为娄底地委副书记。

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同时，周里同志还讲了跟敌人作秘密斗争的经验及今后的联系方法等。

为了帮助我打入锡矿山，第二天，省工委负责干部工作的常杏云大姐和负责统战工作的沈立人同志和我接上了头。通过他们的介绍，我认识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第二区特种矿产管理处顾问、民主人士马子谷先生。

马子谷先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祖籍新化。他同情和支持革命，把我当亲人一样接待。为了掩护我去锡矿山工作，取得合法身份，马子谷先生亲笔写信给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第二区特种矿产管理处锡矿山工程处主任赵天从，并将我介绍给锡矿山矿业警察所所长邹务三，说我是他的“亲戚”和“学生”，“务请”他们“帮忙”替我在锡矿山找个职业。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我到达锡矿山，受到赵天从主任的接待。虽然当时到处都在“裁员”，但由于我手里持有马子谷先生和邹务三的书信，赵天从主任只得设法安插。约莫过了半个月的光景，赵主任安排我去工程处总务课上班，主编一张叫《新闻简报》的油印小报。由于职业的需要，我可以到处走访。这为我了解和掌握社会情况带来了方便。

锡矿山分南、北、冷三区，长约三十里，宽不到一华里，工人大都集中在北区陶塘和南区飞水岩，跟外面只有水路可通。矿区从北到冷有一条简易公路可通汽车。工人队伍由三部份组成：一是官办的锡矿山工程处有一个锑矿，两个炼厂，一个机电厂，一个电厂，职工二千一百多人，其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职员约三百多人，这些职员成份复杂，政治态度多种多样，有的是从东北、华北等解放区跑来的，组成了一支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队伍；二是私营的商矿六、七家，炼局三家，也有一千多人，他们大都是半工半农的矿工，

流动性大，觉悟低；三是镇上半失业的居民三千多人。

国民党在锡矿山设有区党部，书记是老奸巨滑、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杨执端，还有一个镇压劳动人民的矿业警察所，拥有人枪二百多，所长是杀人不眨眼、绰号“屠夫”的邹务三（工程处矿警队也有武装矿警七十余名）；此外，封建“圈子”组织遍布全山，其中龙头大哥杨定轩有将近二十年的统治历史，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还有残酷的“丢洞子”的暗杀手段，通过把头（一般是“圈子”的组长），“圈匪”组织伸入到矿山的各个角落。

然而，在工程处有将近七百名近代产业工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思想比较开朗，受“圈子”的影响也比较少。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不少人原先还曾参加和亲眼看见过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

扎 下 根 来

由于我的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我很快深入到职工中去了。工程处所属厂矿有我的四、五个老同学，通过他们，我认识了不少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

二、三月间，是矿山最动荡的时刻，经济困难，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人们思想极端混乱，敌人造谣，把共产党说得可怕极了。我串联了锡矿几个老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新观察》《新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每周一次，大都利用星期天，地点在单身宿舍。长期接受国民党宣传的年轻人，对这些新杂志、新事物感到很新鲜；又因为我刚去过北京、上海，又从长沙来，谈起蒋管区学生运动，他们都觉得津津有味。接着，我在工程处又组织了第二个、第三个读书会。

同时，我根据一些年轻人的爱好，在工程处组织了球队、

歌咏队。当时，工程处有一个工程师名叫谢子朴，他会唱歌又会打球，是读书会的成员，我找他商量组织歌咏队，他非常同意。经他串联，工程处年轻爱唱的人都参加了，连一向自称清高，不问政治的工程师朱清云也担任了歌咏队的指挥。接着杉山里机电厂、北区锡矿、冷水江电厂也成立了歌咏队。《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是个好地方》《唱出了一个春天来》《跌倒算什么》《金凤子开红花》《燕子》等革命歌曲唱遍了山城。

这些新歌一出现，震动了不少人，不会唱的围着听，睁大了惊奇的眼光。也有些怕事的便出来阻拦：“你们这些人真是不要脑袋，这是些什么歌？呀你们不要脑袋不要紧，将来还会牵连全厂的人，快别搞了！”尽管这样，唱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连一些老工人也加入了歌咏队的行列。

歌咏队团结了一大批年轻积极分子，也影响了一些老工人。起了启蒙的作用。

三月间，省工委先后派了三个同志来矿山了解情况，传达指示，并帮助工作。其中要数文诚生同志呆的时间最长，他是省委派到新化、锡矿山两地的联络员。

省工委决定在锡矿山建立党总支，由省工委直接领导，指定文诚生、李孝先和我为委员，由我担任书记。同时新化也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也是我们三人，由李孝先担任书记。我们在新化开了几次秘密会议，研究了互相配合的问题，并决定先在锡矿山发展党员。

在工程处一个黑暗而狭窄的油印间里，有一个油印工，名叫潘洪铭，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情况熟悉，又有许多朋友。他的父亲从小就是帮工的，后来当了兵，回家后得了半身不遂之症，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维持，因此家境贫困。他从小只读过几年书，大部分时间是作

工，捡野砂，当学徒，在饥饿、屈辱中度日子。

我是编辑，他是油印工，接触机会甚多。我很关心他，帮助他，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成了知心朋友，在慎重观察之后，我开始向他进行革命宣传，并暗示自己的真正身份，这个年轻人，曾经和矿山多灾多难的朋友一起，办过一个小小的油印报，流露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但是怎么办就不清楚了。他日夜盼望共产党来，多年的幻想，现在共产党果然来了。他迫切要求参加组织，后得到了批准。他是矿山第一个秘密发展的地下党员。

接着，我交给他工作任务，要他把知心朋友一个一个串联起来。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和工作需要，经过慎重考察，党总支发展了第一批地下党员，他们是：电话工刘家鹏、被北区开除的失业知识分子张孝怀、机电厂动力工刘正光、实验炼厂事务工刘世典，工程处油印工孙道、陶塘镇贫民谭忠。

那时吸收党员是秘密地个别进行的，写的自传在仔细研究审查后就销毁了，但都庄严地宣了誓，保证“不泄密，不怕牺牲，积极参加护矿迎解斗争，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在发展党员中也遇到不少困难，由于前一段时期，锡矿山没有党的活动，有的串联对象不相信地下党组织的存在，怀疑是“圈子”搞名堂。因此我们必须和串联对象交朋友，秘密找他们谈话，启发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消除他们的怀疑。

我们的建党重点，最初是放在工程处杉山里机电厂。因为当我们秘密建党的时候，矿山的“圈子”和外地的土匪互相勾结，暗地里在矿山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是私矿。私矿的矿工，流动性大，受压迫深，“圈子”的影响也较深，我们一时插不进手。

为了向他们讲清党和“圈子”两者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我们特地印发了《党章》《新民主主义论》及《目前的形势和我

们的任务》等文件，还办了一个党内刊物《锻炼》，介绍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让建党对象秘密传阅。

发展第一批党员后，我们的人逐步深入到工程处各个主要生产单位。他们最初的任务是每个党员交二、三个真心朋友，逐个进行，不搞横的联系。四月份之后，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尖锐了，对我们也越来越有利了，我们又发展了一批党员。

锡矿山地下党组织从三月份开始发展，到五月停止，历时两个月，秘密发展了五十六名党员（其中工人五十名，职员、知识分子六名），建立了杉山里电厂、北区锡矿、实验炼厂三个支部以及处本部、冷水江电厂、陶塘镇三个直属小组，这些地下党员大部分是好的，在护矿迎解斗争中起了骨干带头作用。

群众性的护矿斗争

根据我们当时掌握的可事情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省政府曾多次密串工程处，企图强行运走九百二十吨库存精锡和发电功率很大的美制透平机等贵重设备，同时锡矿山本地的反动势力也觊觎工程处的资财和枪枝，随时准备伺机抢劫。这些情况，给开展护矿迎解斗争带来了严重性和迫切性。

四月初，矿主段楚贤，认为战时锡品出口困难，资金周转不来，无法进行生产，打算让源和炼厂在烧完已收购的十几吨砂之后停产。源和炼厂一停产，不仅影响该厂两百多职工的生活，而且供给源和炼厂矿砂的太源、阜成、天宇等采矿公司的六七百矿工也将失业。这时土匪头目杨定轩，正加紧勾结龙山土匪，招兵买马。他利用工人失业的机会，提出了“有饭同吃，有福同享”的骗人口号，企图用“护工队”的名义把失业工人拉过去。他们开始活动，委派骨干，散发印信符号，计划第一步先抢劫南区，再抢劫北区，然后上龙山为匪。眼看私矿

一停，他们就要动手了。情况太紧急了，虽然我们刚刚立足，力量还小，但在新形势面前，我们也当机立断作出了决定。一方面以杉山里机电厂、南炼厂为重点，公开揭露土匪阴谋，提出“护厂保家”的口号，把护厂斗争与职工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得到广大职工的响应，很快成立了南区护厂纠察队，选举刘正光当队长，方正当副队长，连夜赶制了两百多把梭镖、铁棍，准备了大量的火药瓶子、鸟枪，日夜放哨。一场紧张的群众护厂斗争开展起来了。另一方面，我们发出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段楚贤的，信上说明了当前的形势，还寄给一份关于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文件，并告诉他：土匪正利用工人失业的机会，企图破坏矿山，对此，你负有重大责任，另一封是给杨定轩的，揭露他的阴谋，指出：若执迷不悟，将来必定遭到人民的严厉清算！这两封信，我们是用中国共产党湘中调查组的名义发出的，那时在益阳、常德、安化一带有一支党领导的湘中游击队。结果段楚贤打消了停工念头，杨定轩洗劫矿山的阴谋也跟着破产了。党领导的护矿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南区的纠察队从此一直保存下来。

四月下旬，大军渡江后，形势迅速发展，蒋管区处于最混乱的时刻。那时矿山混乱到什么程度呢？一是附近土匪多，三五一伙，昼伏夜出，打家劫舍，弄得人心惶惶，不敢下乡。二是封建帮会十分活跃，到处有人喝雄鸡血酒。“结盟拜把”，出现什么“一百零八条好汉”、“三十六友”、“十三姐妹”、“十三太保”等组织。尹立言的土匪部队也在矿山扩充势力。三是谣言多，什么“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天津解放后，一些工厂的工人把职员吊起来打”等等，谣言就象瘟疫一样传开了。经过我们调查，制造谣言的人是工程处电台的台长黎树嘉。他是一个特务，北京解放之后溜到矿出来的。这些谣言使一些不明真象的职员和居民更加惶恐起来。四是工人起来了，

但斗争目标最初不是对准特务、矿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而是对着职员。因一些工人平常受过某些职员的打骂，如今在动荡的时刻，这些矛盾激化了。在实验炼厂就发生了几起工人打职员的事。这使一些职员害怕起来。揭穿谣言，加强劳动群众之间的团结，把矛头对准反革命破坏分子，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于是我们决定办一个地下刊物，并大量散发有关政策的传单。

这个刊物取名《团结》，用意是团结职工，齐心对付破坏护矿斗争的敌人。刊物着重介绍当前的形势和新解放区工矿被接管情况，宣传“三原”政策等，我们还用了一定的篇幅，解释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他们过去有对不起工人的地方，为了今后长远利益和当前护矿斗争，应该团结他们，不应打击他们，职工一家。这个刊物先后出了二十多期。翻印的传单，主要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土地法大纲》等。这些宣传品的来源，一些是长沙带来的，一些是新化铅印后送来的，一些是工程处的收音机收到、我们自己刻印的。我们还有一批热情的供稿者，锦矿有个进步的技术员潘青，就写过不少的稿子，当然大部分稿件是我们写的。印刷工具是自己制作的一部简单的油印机，印刷地点在潘洪铭家的楼上。都是夜深人静之后干的，宣传费用是自愿交来的党费。

对于上层分子和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将宣传品带到外地邮寄给他们；在本地散发的宣传品，是由各厂矿的党员包干负责，在天雨和没有月色的夜晚沿途送去，第一次传单出现之后，矿山各界人民感到十分惊喜，敌人却慌作一团，加强了戒备措施，镇公所还贴出布告进行恐吓。但是同志们没有退缩，干得很起劲，方法越发巧妙了。杨执端是很喜欢吃梨子的，有一次，他在买回的梨子里却发现了一张小字条，上面写道：“继续顽抗，其果自食”。杨执端吓得直打颤。

通过办刊物，发传单，收到了预期效果，职工团结了，谣言也慢慢消失了。职员、工人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传单和刊物不但在矿山起到了提高职工觉悟和团结战斗的作用，而且在矿山附近几十里之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月二十一深夜，是一个不平凡的时刻，工程处的收音机播放了新华社发布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早晨，通过传单，大军渡江的消息传遍了矿山，人们又象沸水一样地翻腾起来。在新形势面前，大家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前段，我们曾经公开筹组“职工联谊会”，由于反动分子破坏而流产了。我们考虑，搞公开的组织，反动势力必然和我们争夺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搞秘密组织。“工人解放社”这个省工委指示广泛发展的锡矿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就是这时成立的。解放社的任务是团结职工，积极参加护矿斗争，迎接解放。我们以党员为骨干，要求每个党员发展三、五名工人社员，组成一个小组，只有三十多天时间，就迅速发展了三百多个工人解放社员，遍布全矿山。组织起来的工人，斗志昂扬，办墙报、组织纠察队，护矿斗争的声势更大了。

从三月到五月这一段时间，工程处的职工每人每月只能领到四斗米，二元五角钱菜金。自从南京解放后，工程处断了经费来源，眼看连职工的最低生活费也找不到着落了。今后怎么办呢？人人都很焦急。

这时候，有些人提出分工具、材料和存饷，有些人则提出遣散工人。这些主张，跟团结群众、保护矿山是有矛盾的。但是没有生活费，又怎么能团结职工护矿呢？在这关键的时刻，地下党鼓动群众派代表到工程处请愿。结果，工程处组成一个代表团，由赵天从、王进修分别任正副团长，先到长沙二特处，后又急忙转赴广州，要求国民党拨给维持费。赵天从等想了许多办法，终于要回五万块银元。

这在当时本是一件很大的喜事，为团结职工护矿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当这笔银元运到矿山的时候，却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几乎流血的斗争。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反复较量了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工程处的全体职工与矿霸、圈匪、警察的斗争；第二个回合，是工程处广大职工与特务陈延熙等少数人的斗争。经过是这样的：赵天从回到矿山的第二天，电话工刘家骥告诉我，矿山各界代表明天要到工程处开会。我估计是为那笔银元的事，当天晚上从冷水江赶到矿山，急忙找到潘洪铭、刘家骥、刘正光等人商量，连夜通知地下党员动员工程处厂矿职工明天早晨赶到工程处应付不测事件。第二天一早，工程处的前坪已经有了上百名工人，接着人群从四面八方向工程处涌来。一会儿，杨执端、邹务三、杨定轩、李益坚、李汉光等坐着轿子，带着十几名佩一色新盒子枪的勤务兵，威风凛凛地到了工程处。赵天从等早就在门外恭迎。

会议一开始，就显得异常紧张。讲话声、算盘声混在一起。突然杨执端板下脸站起来，扯开喉咙说：“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工程处欠我们的钱不能不还！”“拍”的一声，他一个巴掌打在桌子上，“莫怪我老杨不认人，抢了去，上山顶杆子（当土匪）……”，他还没有讲完，“呼”一声，会议室的门被一脚踢开，接着从愤怒的人群中飞来一只茶碗，向杨执端打去。杨执端一闪身，茶碗打在他身边的刘正坤工程师手上，鲜血直流。簇拥在屋外的人群大喊：“打死杨执端！”这时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约莫有千余人，有的还回家继续喊人，把办公楼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一群向会议室涌去，被矿警挡在楼梯上。占据了工程处两个山头的警察，架上“花机关”，向天鸣枪，夹杂着一片推弹上膛的声音。一时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工程处被一片喧哗的声音罩住了。情况十分紧迫，杨执端

暴跳如雷，嘴里直抖嗦：“这……………这还了得！”赵天从急得面如土色，口里不住地喊：“诸位冷静！诸位冷静！”他时而走到窗口，向外面摇摇手，时而坐到主席位上敲桌子，不时向杨执端拱手：“得罪，别怪。”

这时我们分头和几个地下党员商量，要刘正光出面，以杉山里机电厂纠察队为核心，吸收其他厂矿的积极分子，组成一个临时纠察队，维持秩序，统一行动，把一群散乱无组织的人团结在我们周围。果然，我们的人一出头，积极分子就找来商量了，提出各式各样的对策。

会议僵持着，我抽空走到赵天从身边，建议暂时休会。赵宣布休息。这时他急得六神无主，连忙对我说：“你跟邹先生熟，帮我劝劝，请他维持秩序。”我答应了，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们商议之后，他们来到我的寝室开了一个小会（我的寝室就在办公楼上）。我跟邹务三见面自然要寒暄几句，这使“两豹”愕然，不知是怎么回事。在工人们的强大威胁下，杨执端的神气早丢了一半，邹务三坐在我的对面，急得直摇头，杨定轩假装镇静，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小会开始了，赵天从望望我，请我发言。我就开了个头：“邹先生，两位杨先生，现在情况很紧，看来，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我转向邹务三说：“邹先生这责任可大啦！现在，我们都被工人重重包围，冲不出去呵！万一出了事情，大家将同归于尽。你考虑怎么办？”邹务三一听，脸色一变，站起来拍着胸膛说：“今天如果发生流血事件，由我邹某负完全责任。”当即他派勤务兵通知警察：没有他的命令，不准乱开枪。邹务三不敢轻举妄动，也是有他的一番考虑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做过九年新化的警察局长，镇压了百多个革命青年，如今恐慌异常。逃走吧，没有钱，不走吗，将来又怕杀头。他的亲戚、朋友也劝他立功赎罪。在这种情况下，他表面上表示不破坏矿山。暗地里却在作“上山打游击”的准备。

当时邹务三是矿山的实权人物。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我把理一说，邹务三顺水推舟软了下来。同来的其他人也奈何不得。经过磋商，工程处拿出五千元作矿业警察所的维持费（当然，邹务三他们也少不了从中捞一把）；至于工程处的其他欠款，留待以后再说。下午，邹务三一伙走了，警察也全部撤退了。

紧接着，工程处内部围绕这笔维持费展开了激烈斗争。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特务分子陈延熙一伙，主张每个职工发三十块钱作“遣散费”，把一千一百多名职工全部遣散回去，剩下下来的一万余元，企图私吞。这是一个阴谋，我们当然不答应，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挫败了陈延熙的阴谋。会议决定：职工每人发二十元应变费，其余仍按过去一样按月发给生活费。

经过这一场斗争，地下党团结了更多的群众，群众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代言人看待。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从此也不敢小看工程处职工的力量了。

八月初，长沙已经和平解放，眼看锡矿山就要解放，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了。杉山里机电厂的地下党员把护矿迎解的口号公开提了出来，得到群众的拥护。工程处以赵天从主任为首的上层人物，酝酿成立护矿委员会。经过各方面反复协商，确定厂、矿长为当然代表，还从职工中选出若干代表。工程处护矿委员会正式成立后，赵天从为主任，王进修为副主任，下设秘书、财务、粮食、交际、救护、保管、治安、通讯等组。我们不少地下党员当选为代表，治安组的组长是刘正光，组员大部份是我们的骨干。护矿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的转折，护矿斗争由秘密转向公开。

赵天从主任是一个爱国的科技工作者，他为锡矿山护矿迎解斗争作出了贡献。在护矿委员会的掩护下，我们的工作更顺利了。各单位的纠察队正式成立，工程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员工自动参加了纠察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站岗放哨，保护矿山不受敌人的任何破坏。

在这段时间，地下党组织还发动工程处员工募捐了七百多元救济镇上的贫民，因此护矿斗争得到了他们的支援。

黎明前的战斗

八月中旬的一天，解放军一四七师一个团，路过锡矿山，向邵阳进军。他们需要我们筹粮、筹鞋、带路。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随即把几个支部负责人找来开紧急会议并作出了决定。

一、由镇公所负责供应粮草，潘洪铭负责督促，抽调二十名工人协助。

二、大量收买和募捐鞋子。

三、召开工商业老板会议，公平买卖，不得借故关门。

四、组织工人、学生、居民热烈欢迎解放军。

不到天黑，杉山里机电厂就送来了三担鞋子。接着，其他单位也送来了。职工送的布鞋共有五百多双，有些人连脚上穿的新一点的鞋子也捐了出来。我们第一次公开发动群众，脚腔热情地支援了子弟兵。

一个星期过去了，前进的解放军忽然又悄悄地经矿山向北折回安化去了。

新化李孝先来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是部队要从矿山借些银元，并且要我们一定在今晚赶到新化，到师部研究一个重要问题。我向工程处借了五百银元。后从段楚贤开办的源和炼厂借了三十两黄金，取了两支短枪。下午我带着几个武装工人到新化去了。师指挥部正从新化撤到曹家坪，市面很混乱。在那里我见到一四七师的张师长、李孝先，还有湘中游击队的负责人姜亚勋。

张师长感谢我们的支援，解释了撤退的战略意义。为了不

从正面惊动敌人，部队暂时撤到安化待命。估计敌人要掩护主力逃回广西，会据守新化一带。现在敌人一个军尾随而来。张师长说：“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当夜，张师长派了一个班，护送我们回矿山。

第二天早晨，陶塘镇公所的前面已经挤满了人，其中有解放军的伤病员，还有几匹伤马和大堆文件。昨天晚上，部队的首长指示：伤病员要设法藏在矿山附近乡下，文件埋藏起来，伤马由我们留用。我们估计，解放军撤走，敌军可能上山。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呢？经仔细考虑，伤病员还是送到安化为好。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方面找医生敷药、治疗，另一方面迅速找来八十多个民伕，电话通知已经公开地下党员身份的几名党员，每人从工程处借了两元钱路费，由钟仲尧负责带领，火速行动。第二天，他们安全护送伤病员到达安化，把伤病员交给了部队。在我军战略撤退的日子里，谣言特别多，闹得人心惶惶。杨执端像黑夜的老鼠一样，又出现在矿山，还得意洋洋地打电话给吴威荪：“现在又是雨过天晴了。”锡矿山又陷入新的混乱之中，比以前紧张多了。我们估计，匪军上山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决定：地下党员未暴露身份的，隐蔽下来，由刘正光负责；已公开身份的，分散隐蔽在矿山附近。

在这个非常混乱的时候，杨定轩、杨执端利用“圈子”，暗中加紧了反共活动。邹务三也从新化潜来矿山，躲在屯军山矿业警察所。新化送来的情报说，他企图组织“游击队”。我们决定：趁解放军侦察排还在矿山，抢先抓武装，必要时用武装保护矿山。

我找侦察排赵队长商量，他答应用武力支援我们。一清早，我以矿山地下党负责人、军代表的身份并利用马子谷的关系，到警察所找邹务三，说明当前我军的胜利形势。当时，新化县长伍光宗已宣布起义。我们指出邹务三的唯一出路，只有

靠拢我们，我们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否则，将由解放军出面，解除警察武装，后果自负。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邹被迫同意以下三条：一、交出矿业警察所的权力，派潘洪铭为副队长，谭忠为小队长；二、屯军山警察百余人全部撤出矿山；三、交出短匣子枪三十枝和弹药若干，以武装工人。

在撤离的几天中，邹务三表现很不正常，偷偷跟他的“老部下”窃窃私语，并派人暗中跟邵阳专员通电话。我深感此人变幻莫测，不易对付，留在矿山，后患无穷。因此，决定调虎离山，将他弄到安化去。我们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让他带两个勤务兵，并派潘洪铭护送（实则是监视）他去安化。几经动员，他才勉强答应了。他们跟侦察排一起同行。

邹务三去了，敌人还未上山，矿山表面上又趋平于静。为了加强我们的武器装备，我们又从段楚贤处搞到七枝崭新的德造二十响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

我军转移到安化不久，敌军六十三师盘踞了新化。就在这个间隙里，省政府在邵阳筹划了一个新的诡计。原来在长沙解放前夕，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企图抢走锡矿山库存精锑，结果被阻止了。长沙起义后，省政府一部份顽固派逃到邵阳，又垂涎锡矿山这笔财产。

一天下午，省建设厅长余籍传，在四五十个武装的保护下，来到矿山。

地下党负责人在杉山里研究了发动工人阻止运锑的事。但硬阻是不行的，他们有武装作后盾。只能用需求补发欠薪的理由去拖。拖下去我们就胜利了。下午，各单位选出代表四十多人集结在杉山里机电厂开会，选出了刘正光等五人作代表去交涉。

刘正光等到了工程处，只见办公室两厢警卫森严，窗口上还架着机枪；一见只有五个人，余籍传才答应接见。刘正光把

职工几个月没有发饷，卖衣服典家具的情况说了一遍，告诉他：“工人迫切要求解决生活困难。”余籍传突然发了脾气：“谁讲的，共匪捣乱，一定要运。”交涉没结果，刘正光回来，把经过向大家一传达，都怒吼起来。四十几个代表和几百名工人马上向工程处进发，沿途贴标语、喊口号。余籍传见来势很凶，知道不妙，怕自己陷在矿山回去不了，为了脱身，要赵天从出面接见代表说：“现在不马上运走，等工资寄来了再说。”他们原来的计划是，将库存锡由冷水江下河运至新化接着用汽车运走，必要时还派军队前来协助，由于工人們的斗争，这个劫锡计划彻底失败了。余籍传不得不在当天下午离开矿山。

锡矿山库存的九百二十吨精锡，我们早已分散隐藏。在工人們的护卫下，这些锡品和其他设备一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敌人上山，锡矿山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陶塘街上，持枪的敌人和便衣特务横冲直闯。工程处、杉山里机电厂、北区梯矿等单位，也布满了便衣特务。一到黄昏，就宣布戒严，不准随便通行。杨执端、杨定轩、李汉勋跟敌军许营长接了头，并拟定了一个十一人的黑名单，悬赏通缉我们。还派武装日夜搜捕。

锡矿山的工人和我们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他们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为隐蔽的同志送消息、送饭、送衣服。杉山里机电厂曾锡周厂长为了掩护地下党员，要他们躲在楼上不要出来，他还造了一本新名册，敌特来时，指着名册对他们说：“这些人上个月就离开厂里了。”来来往往的特务都信以为真，没有搜查了。但也有为虎作伥、强迫解放社员写悔过书的。

接着地下党员谢子朴被捕了。当天就被押到新化敌军司令部去了。在白色恐怖之中，也有人经不起考验，动摇了，逃跑了，地下党员董德聚叛变了，由于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党组织没遭受破坏。

过了几天，我们又活动起来，重新取得了联系。地下党员、油印工孙道到温塘和我取得联系，把谢子朴的被捕、其他同志的分散隐蔽的情况，以及匪特的活动、兵力、布署，作了详细的汇报。我们写了书面材料，派他送到安化解放军司令部去。接着，我们派人找吴威荪总工程师，要求设法营救谢子朴。他派了总务课长、会计课长去新化保释。

为了加强通讯联络网工作，我们在矿山通往安化一带的通道，以当地学生为主，组成了一个四十多人的联络网，加速了消息的传递。不久，我带着潘洪铭去了安化。

我到安化大约一个星期后，大部队由南挺进，我又随一四七师解放“鸡叫岩”。听说一六〇师（邵阳军分区）已到温塘，当晚，我们又返回温塘，与部队取得了联系。第二天黎明，锡矿山又重新解放，敌军撤退了。同志们把镇长李汉勋和“地头蛇”刘伯璠绑到司令部。邹务三回来了，我们下了他的枪，他大闹一阵之后，回新化去了。这些人后来都被镇压了。

部队暂时驻扎在锡矿山待命。我们抽调了四十几名工人和新化县地下党总支派来的刘泉清成立了矿山支前站，负责筹粮。

几天以后，进军号角响了，消灭白崇禧残部的战斗命令下达了。各路大军向前急进，新化解放了，锡矿山解放了。

部队离山后，留下两个重机枪连保卫矿山。

上级委派了军代表，人们忙着恢复生产。举世闻名的锡矿山回到了人民手中。至此锡矿山地下党组织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护矿迎解的艰巨任务。

（冷水江市委党史办供稿）

解放前夕湖南海员工人 进行的护船保产斗争

黄敬龄* 整理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湖南，遇上了一场比一九三一年水位还高的大水灾，逃荒要饭的越来越多，大多数海员家里揭不开锅，当时招商局等所谓国营轮船公司的官员都准备逃命，民营公司的老板们则在观望徘徊，盘算如何“应变”。白崇禧部窜入湖南后，实行所谓“交通管制”，胁迫民营轮船公司的船只承担军运，甚至派兵上船勒令停驶客货班，专听军差，使得很多海员陷入工资无着、日食难继的困苦境地。

五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多钟，长沙发生了一起白崇禧部队纵火毁船的事件，引起了海员工人们的警觉。那晚，在怡和码头101号趸船外边，停靠有九艘轮船，其中一艘叫“利生”号的突然起火，情势危急，其他各船解缆逃离火区时，竟被靠在最外档的湖北水警局的“仁邵”号上的水警开枪阻拦。结果火舌延伸，烧毁了包括“利生”轮在内的轮船四艘。海员们从这一事件以及看到所有轮船上都有士兵上船看守的情况，意识到白部将在溃逃之前对内河船只进行大规模的破坏。针对这种情

* 作者原系湖南省民建、工商联干部，现已去世。此文是作者调查研究和查找有关材料后写成的。

况，湖南地下党组织立即采取措施，依靠海员工人和人民群众，保护船只和物资。一场护船保产的斗争便在湖南内河展开了。

力 保 江 轮

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湖南内河正值汛期，水位上升。这时，突然开来了大批的江轮，光是停泊在长沙的大轮船和登陆艇就有四十六艘，总共二万五千匹马力。显然这是一支重要的运输力量。这些船只是在白部强迫下由长江开进湖南内河的。其中马力在一千匹以上、或者载量在一千吨以上的大轮船有二十艘，还有两艘登陆艇。敌人在溃逃之前，就下令要各轮全部集中停泊，企图加以毁坏。因此，保住这批江轮，是护船保产的首要任务。

党在湖南的地下组织，非常重视这批江轮，针对敌人的阴谋，作了周密的部署。党在招商局的地下工作同志杨维新、文志杰等；及时发动招商局的职工，成立了“职工联谊会”；通过这个组织，对职工和船员进行了思想动员，号召大家奋起保卫人民财产，进行反破坏的斗争，积极带头和起着骨干作用的有招商局长沙办事处职员汤正甫，华字204号登陆艇轮机长江根生，二副路景泰等。

首先，海员工人们施用计谋，使敌人改变了破坏计划。本来，敌人打算在七月中旬将这批大船集中一处全部炸沉。但船主们不愿使私人财产毁于一旦。海员们分析了情况，利用资方这种心理，暗中劝说船主贿赂官员，改变计划。船主们接受了这个意见，花了一些钱物，买通了长沙绥靖公署科长石飞和水运处参谋薛斌等人，把炸沉船只计划改为炸毁机件。

其次，避开敌人监视，用缓拆、假拆及拆次件，留主件等办法，瞒过敌人，保全财产。当敌人紧催快拆时，海员们故意

拖延时间，放慢进度。当敌人上船监拆时，他们就设法阻住敌人进入机舱。如七月二十四日敌人登上华204艇监拆机件，船员就说发电机坏了，舱内开不了电灯，同时在通往机舱的过道、梯子上洒上许多机油，敌人看到舱内墨黑，楼梯又滑，只得站在舱门干喊“快拆”，船员们随手拆下几样次要机件，送上舱面，让敌兵拿走。有些船上虽然主要机件被迫拆下毁掉，但船员们事先保存了图纸，复制了模型。所以在解放后很快就能修复运转，及时恢复航行。

第三，互通情报，加强联系，团结对敌。这些大船，都有较好的通讯设备，船员们就利用船上的电讯设备，随时相互通气，统一行动。六月间，华211艇被掳差去衡阳，孤艇在外，力量单薄，易被敌人就地破坏。停在长沙的204艇船员就一面利用艇上电台，与211艇联络，要他们谎称必须回长沙修理，并买通长沙水运处批准返回长沙。

第四，巧妙分散隐蔽，避免敌机轰炸。船员们千方百计地避开敌人耳目，把船开出港外，散开躲避，使敌人使用空军炸船的阴谋，也成为泡影。

外 港 周 转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本省有相当一部份轮船还在外港航行。它们有的是正常开往省外去的客货轮，有的则是被国民党军队掳差出省的，单船在外遭受敌人破坏的危险性较大，但海员工人们尽最大的努力进行了反破坏斗争。并且随机应变，采取巧妙的斗争策略，达到护船保产的目的。

一九四九年七月份，本省长津公司的“永绥”轮被敌军掳差到了湖北宜昌，当时宜昌已临近解放，而“永绥”本船所载的几艘驳船、民船上，满载着大批电机器材，还有不少武器弹药。国民党军队原想将这批物资掌握在手里，载载顽抗，

后来战局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就打算将船货一起炸毁。当时“永绥”船队停靠在宜昌附近，还有湖南籍的“普济”、“新顺”两轮也停在那里，在紧急情况下，各船船员都被迫离船上岸，仅“永绥”轮的大车李连生一人还留在船上未走，他为了保全这批人民财产，决心坚守岗位。后来一些敌人窜上轮船，准备放火烧船，李连生一看来者不是原先掳船的那些人，便沉着而严肃地同敌兵周旋，推托说这些武器和物资是马上要送往前线打仗的，要处理也得等押船的官长到场。就这样把敌人哄走了。当敌人纵火烧着邻近的轮船时，李连生机智地解开捆索，隔断大路，把船货保全下来。次日，解放军神速地解放了宜昌，“永绥”载的武器和材料全部由解放军接收了。

同一个时间，复华公司的“复源”轮也被敌军掳差到了宜昌。在宜昌解放的前一天，敌军正准备烧船，该轮大副左东汉等想尽办法应付，拖延时间。抓住一个机会，将船开到附近小港汉内隐蔽。第二天宜昌解放了，“复源”马上与“永绥”会合，就地担负运送解放军过江追敌的光荣任务。

机 智 护 产

八月五日长沙和平解放前后，几艘散在省内各航线上的长沙港籍的轮船上的海员们同样勇敢机智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为保卫人民财产、支援解放大军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下面就是两个生动的事例。一是“都匀”轮智赚“保安旅”。七月十八日，“都匀”轮被湖北保安旅掳扣，载运该旅官兵五十多人，军马三匹和大批枪弹粮秣，由湖北驶进湖南。二十二日船到澧县对河黄沙塘时，澧县已经解放，船上敌军还睡在舱里。当解放军在岸上鸣枪命令“都匀”轮驶近时，大副侯东生知道这是人民子弟兵发的信号，连忙哄骗船上敌人说“这是国军要船”，边说边把轮船驶向澧县河岸，等到敌人发现情况不对，

持枪强迫侯大车掉头回驶时，全船船员一起围拢来，都说“是国军，错不了”。机舱里忙开快车，轮船以最高速度驶入澧县岸上解放军火力射程之内，船上敌军逃生无术，只得乖乖地举手投降。

二是“同康”轮忠心护财产。八月初，“同康”轮还停在衡阳，处于敌军控制之下，凶残的敌军已强迫拆了船上机件，装上火车，只等开车逃走，还打算放火烧船。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解放军的炮声响了，敌军慌忙溃逃。这时，留在船上的大车吴敬巨和一个工人，立即直奔车站，从车上把机件搬运回船，赶紧安装，解放军一到，该轮就迅速投入了支前运输。

冒 险 闯 关

长沙和平解放后，有几艘隔绝在外的轮船，闻讯冒险赶回，闯过重重关隘，投奔解放区。这里举述两船轮船上海员工人的英勇事迹。

停在衡山马公堰的“盛利”轮（解放后为“胜利”号），原是七月间被国民党海军掳差去衡阳的。海员们早就暗中计议，要严防敌人破坏，要找机会开回长沙。由管理员周世桂出面，向敌军谎报了锅炉机器都坏了，非修不可的情况。经过几番交涉，才得其同意，把船放到衡山修理。海员们抓住这个机会，在航行途中，把船开到马公堰暂时躲避。长沙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后，他们立即升火北驶，昼夜兼程地直奔长沙，中途遇过不少阻拦，他们都是闯关而过，真是“鱼奔深潭客奔家，千难万险都不怕。”

更惊险的还有“国安”轮冒着枪林弹雨开回长沙的故事。八月五日深夜，停泊在湘潭杨梅洲的“国安”轮，正处在敌兵魔掌之下。大车范德发，思量着战局的发展，担心着船只的安全，翻来复去睡不着。忽然听得看守船只的敌兵同一个上船传

信的敌排长小声讲话，听出他们在讲长沙已经解放，株洲也被解放军占领，去衡阳已不可能，只有往湘乡、宝庆（邵阳）逃命，以及只等师部下令，就把“国安”号炸掉。范德发听了，又喜又惊，等那排长走了，守船的卫兵睡熟，就赶紧把船员们集合到后舱，开了个紧急会议，大副谢长生，大车范德发都主张要保住船只，开回长沙。并且讲明这是一着死里逃生的险棋，不是容易走好的。大家一致同意要闯过难关，第一步是要把要守船的丘八弄开。

天亮以后，船员们吃过了早饭，才把那个敌兵叫醒，告诉他说：大部份船员已吃过了饭，饭菜都吃光了，连范德发、罗桂华二人也没吃饱，现在由范、罗二人为东，招待老总上岸去喝两把酒，吃顿便饭。大家又是哄，又是劝，把那个敌兵拉到岸上小饭馆里，范罗两人你一杯我一盞地轮流敬酒，把那个丘八灌得烂醉如泥，倒在回船的半路上，爬不起来了。

范德发、罗桂华上船后，船上已作好开航准备。大副谢长生一声钟铃，下令开航，朝长沙方向疾驶，行经湘潭小东门时，两岸响起了枪声，顿时弹如雨下，这是敌军在疯狂地开枪拦截“国安”轮。船员们马上卧倒隐蔽，谢大副把船挨近湘江东岸行驶，范大车把车速开到了最大限度，船似离弦之箭，飞速北驶，虽然舱面弹痕累累，但人和机器都安然无恙，终于闯过了敌人火力封锁，于中午到达长沙。

船靠码头以后，船员们不顾疲劳，怀着翻身的幸福感，投入了欢庆解放的人潮中。范德发、谢长生马上找到解放军的后勤部门，高兴地汇报冒险闯关投奔解放区的情况，并且请求立即分配任务。他们受到指战员们的热情接待和一再表扬。第二天，“国安”轮就投入了支前运输，船员们浑身是劲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解放战争时期邵阳地下斗争回顾

叶 蓉*

一九四七年秋我在长沙《新潮日报》编副刊。冬季，报社面临停刊的危险，一方面国民党对进步的新闻界实行残酷镇压，一方面报社在经济上也陷于困境，组织上不得不作疏散党员和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准备。恰巧，这时邵阳《劲报》通过新闻界的关系，来长沙聘请编辑，于是省工委便派我去邵阳开辟工作，我于一九四八年初与江鹭同志一同去邵阳，我任《劲报》总编辑，江鹭同志主编副刊。

邵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代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猛烈地冲击了封建阶级及土豪劣绅的统治，“马日事变”后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遭到屠杀，熊熊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一九三七年党中央派高文华同志来湖南主持省委工作。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省委机关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随即迁往邵阳，徐特立、高文华、帅孟奇、周里、李锐等同志都在这里工作过，省委和邵阳中心县委先后在邵阳办过《观察日报》，《力报》，《真报》，这些报纸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持抗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

* 作者当时任《劲报》总编、邵阳中心县委副书记、湘中二支队副政委等职，现任湖南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封闭进步报纸，杀害共产党员，从而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我来邵阳时除邵东农村保留了一个支部外，全区已无党的组织。

邵阳的反动势力也是很强大的。国民党与三青团牢牢地掌握地方的统治权，而党、团之间矛盾尖锐，争权夺利十分激烈，但在对付共产党这一点上，他们则是一致的。我们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求生存和发展。

《劲报》的创办人是尹如圭和禹问樵同志。他们是一九三九年的党员，因“皖南事变”上级组织被破坏而失去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並沒有消沉和退却，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作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他们在邵东团山接办了一所小学，团结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又办一张四开油印的《开平周报》。这张具有进步性的周报很受读者欢迎。一九四七年夏迁往邵阳改为铅印的日报。由于经费、设备难以解决，乃于年底与三青团办的《铁报》合并改名《劲报》，打着三青团的招牌，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是尹如圭和禹问樵（尹任社长，禹任主笔），我们去后即与尹、禹商量，经济一定要独立，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我们算了一笔帐，报纸只要发行3,000份以上，就可以维持下去，在经济上绝不能受别人牵制，这是报纸生存的重要条件。

我们就以《劲报》为基地，在敌人的心脏中，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与形形色色的反动派进行了艰巨、复杂而曲折的斗争。

二

我们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四八年二月到六月，主要是了解情况，接触各界人士，建立工作关系，为全面开展党的活动打下基础。第二阶段，从一九四八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运动，

准备武装起义。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到九月，在全区举行武装起义，打击敌人，迎接解放。

我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到邵阳的。六月，省工委派刘少川同志来《劲报》工作，担任采访部主任。七月发展江 鹭 同志入党，江鹭同志是音乐工作者，自己能谱曲，他在昆明搞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所注意，而出走到香港，通过李凌和刘乐杨同志的介绍来湖南工作。他是一个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报社有了三个党员，成立了支部，我担任书记。我们三人除在报社工作外，还在几个中学兼了课。我在偕进中学教文史，刘少川在天纵中学教理化，江鹭在邵陵中学上声乐课。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们的阵地得以扩大，活动范围也广阔了。我们在课堂上经常结合教学讲时事，从学生熟悉的农村的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讲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从报上战事消息讲到国、共两方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引导他们自己去思索，自己去做结论。学生对讲时事很感兴趣。平时，我们找机会与教师、学生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帮助他们进步。我们在文教界的影响明显扩大了。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在报社发展了覃文魁、禹问樵、尹如圭、郑有理等同志入党，并派禹问樵同志回邵东团山建党。随后，在教师中发展了左维、周泽民、李云涛、肖云端、吕剑滢、吴步尘等同志入党，在学生中发展了莫昆州、了锡祥、黄笃民、曾一、曾惠平等同志，在工人中发展了王哲敏同志，并分别成立了教师、学生支部和工人小组。同时，在北大读书的刘劲同志和中山大学毕业的伍魁元同志的组织关系也由省工委转到邵阳。另外，省工委派雷普文、熊松同志来邵阳作统战工作，不久，又派李龙牧、谢翼、杨奉达等同志前来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秋，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工委决定合并邵阳城、乡党组织，成立邵阳中心县工委，以

统一和加强党的领导，由龙仲同志和我担任正、副书记。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得到巩固和发展。到一九四九年上半年，除已有的万安支部外，又建立了二个支部，即团山支部和武冈县金称市支部（现在划归邵阳县），城市各支部也有较大的发展，加上省工委陆续派来一些同志，这时全区党员总数已达120余人。

一九四四年，龙仲、常杏云、王来苏等同志随省工委书记周里由黔返湘，省工委以特派员名义派龙仲回邵阳工作。第二年，他在邵东发展了赵万里、赵克盾入党，连同原已入党的龙成伯同志共四人，建立了万安支部，龙仲同志任书记。一九四五年二月根据省工委指示，成立了“青年救国会”（下简称“青救”），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在龙仲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以龙成伯、赵克盾、赵万里、王启山等同志为核心的干事会开展斗争。它的任务是：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筹组抗日救国游击队；发展“青救”组织。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仅二个月的时间，发展会员100余人。搞到三枝长枪，二枝短枪，组成游击队，由赵万里任队长。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青救”这一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形式亦无存在的必要，宣布解散，另外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将“青救”骨干分子分别编入马克思主义小组。经过审查和考验，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春，先后入党的有赵赞魁（王启山）、赵赐生、陈求生（胡紫）、何牧、赵旭程、赵芯芳（李平），羊知非（左邱），赵伯云、赵刚、龙侗、赵承轩、赵恺之（王林）等30余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经上级批准，成立了总支，选出龙成伯、赵克盾、赵赐生三人为总支委，龙成伯任书记。下设四个小组。

这一段时间，他们大都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在“青救”的群众基础上，进行秘密工作，酝酿成立地下农民协会，

地下贫农团，还发动大家动手写文章向香港、上海、长沙等进步报刊投稿，揭露国民党的罪行，报道人民的苦难。一九四八年秋，万安总支部积极筹划武装起义，为此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于一九四九年春天在邵东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团山支部是一九三九年由彭柏林同志建立起来的，禹问樵同志任支部书记。一九四〇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邵阳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党的重要骨干李化之、彭柏林、李琦、周道甘同志先后遇害，团山支部即与上级联系中断。

一九四八年秋，中心县工委派禹问樵同志返回团山，重建组织，开展工作。同年十二月发展禹纪方、禹洁入党，成立支部，任命禹问樵为书记。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党员已发展到31人，支部也由三人扩大到五人，支部工作更加广泛深入。这一时期共办农民夜校19所，发展地下农会会员700余人。发动了拖租、减租运动，启发和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一九三九年夏，我党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武装封闭，吕振羽同志带领师生疏散到金称市，金称市支部就是在此时建立的。先由省委直接领导，后交邵阳中心县委领导。第一任支部书记江明（吕振羽同志的爱人）副书记吕一平。江、吕二同志一九三九年冬调走，由吕楚成、李树成分别担任正、副书记。一九四四年秋邵阳沦陷，他们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九四九年春，他们与中心县工委取得联系，组织上派龙仲同志前往审查，经过了解认为这个支部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下来进行斗争，基本上好的。因此，同意吕楚成、张必烈、李众青等同志重新入党。其他成员的组织问题通过考察逐个解决。莫新春同志起义后，他们在部队，在地方上作了大量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

三

《劲报》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对敌斗争的重要工具。到一九四九年春报社已有了七个党员，完全控制了编辑部。报纸的观点是鲜明的。它通过客观报道的形式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本质和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报道敌人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和出现总崩溃的态势。从而教育广大群众认清形势，提高觉悟。

《劲报》是一张八开小报。一版为国内外新闻，二版是各地通讯，三版是副刊。一版的新闻基本上采用外国通讯社和香港进步报社的电讯，中央社的新闻稿经过改写再刊登，如“共匪”改为共军，辱骂我党、我军和解放区的词句都予以删除。各地通讯的内容着重报道国民党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以及风起云涌的学潮、罢工罢市和大后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材料来自香港的《华商日报》，上海的《文汇报》《观察》杂志和本报的特约记者。三版副刊，登载杂文、散文、诗歌、民歌和小说，投稿的大都是进步教师和学生。对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四版为本市新闻，反映邵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不登黄色新闻。

由于《劲报》的进步性、战斗性，改版后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发行量由500至600份上升到5,000余份，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然，这一切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和怀疑。编辑部工作人员不嫖不赌，生活严肃，与社会上报油子的作风迥然不同，他们觉得奇怪，三青团的头子多次打听我们的来历。加上报纸内容与国民党的报纸大不一样，这种怀疑有增无减。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们连续报道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情况，特别是报道廖耀湘被俘的情况，给邵阳各界以极大的震动。廖耀湘是邵阳人，在当地有相当影响，而我们的报道又早于中央社。敌人曾为此召开特种情报会议，党、政、军头头都参加，会上研究了封闭《劲报》、

逮捕《劲报》工作人员的问题。当时军统特务赵斌与尹如圭私交甚好，他还兼任了《劲报》经理，我们通过尹如圭对他作争取工作，使其破坏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保安司令魏镇（兼行政专署专员）、副司令宋涛（兼副专员），都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在会上对国民党中统头子封报、抓人的主张，魏、宋提出查一下消息来源再说，有意把中统的方案压下来了。会后赵斌将会议情况透露给尹如圭，尹来找我商量对策，我考虑我们用的是外电，不是捏造的，是有根据的，敌人来查，我们可以拿出原稿来看，民办报纸采取外国通讯社的电讯，是很普通的事。我们一定要镇静，报纸的报道要一如既往。这个信息传到敌人阵营后，这件事才在表面上平息下来。

还有一次在地方新闻上登载了县长徐君虎抓赌的消息，引起一场风波。原来赌场是大恶霸陈光中开的，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是血洗江西莲花的大刽子手，后因贪赃枉法被蒋介石革职，他回到邵阳后，广纳流氓地痞，自立山头，开设赌场妓院，强夺民女，无恶不作，地方上的人莫不怕他。徐县长敢于摸老虎屁股，亲自带武装去抓赌，双方几乎兵戎相见，由于徐县长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定的态度，陈光中才软了下来。报纸刊登这条消息以后，陈光中即派出十几个流氓前来闹事，想砸掉报社。我们亦不示弱，组织了二十几名职工“严阵以待”，并表示报社的严正立场，申明只要消息是事实我们就一定要发表，你们再闹，我们就到保安司令部去评理。这些人怕事情闹大，后果对他们不利，便灰溜溜地跑掉了。

我们以《劲报》和学校为阵地，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建立外围组织，在江鹭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一支40余人的歌咏队，每周活动一次，在报社编辑部由江鹭教唱，唱的都是革命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等。这样集中

活动，目标过大，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决定分散活动，于是这10多人，就将革命歌曲的种子播散在城镇、农村、中学、小学。

另外，我们通过报纸与十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进行联系，成立了一个文艺研究小组，每周集会一次，或者讨论文学上的问题，或者座谈时事和教育问题。

我们还通过拜访、交朋友的方式与教师接触，介绍他们阅读进步书报（报社有一个小型图书室，收集了一些较好的报纸、杂志，这些报刊在外边是看不到的）。这样，就把一批知识分子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了。不久，拥有100多名会员的中小学教师联谊会也组织起来了。

在此基础上，城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简称研究会），城郊建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工会），成员共有100余人，都是思想进步的教师和中学生，县工委派周泽民、朱莫克、赵克盾同志去领导这二个外围组织。他们在内部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新华社的评论，对外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办民众夜校，散发传单，收集情报。党通过他们，联系了广大青年群众和知识分子，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歌咏队、研究会和“青工会”的骨干后来大都入了党，有很多同志参加了武装斗争。

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城市支部在省工委特派员刘寿祺同志的领导下，在邵阳全区开展了护厂、护校和保护人民财产的运动，留在城内的党员（那时中心县委已于六月转移到农村领导武装斗争）全力以赴地来抓这项中心工作，以王哲敏同志为首的工人小组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在邵阳办了一个乡村工业示范处，长沙和平解放后，长沙绥靖公署、省政府迁到邵阳，绥靖公署主任兼省长黄杰企图将示范处的设备、汽车、资财夺走。有鉴于此，城市支部决定成立工人纠察队，指派王哲敏任队长，开展护厂运动。工人纠察队团结发动广大

群众与国民党进行了公开的，隐蔽的斗争。国民党十四军想把汽车、汽油搞走，工人纠察队就把汽车零件拆散，使汽车开不动，秘密地把汽油桶埋在土里，把大批银元、金条丢入水塔池内，纠察队手持木棍、铁棒日夜巡逻放哨，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解放之日将1,000余吨钢材、设备，40余台机床，50余辆汽车，600多桶汽油，三万块银元，1,000余两黄金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人民。

四

统一战线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邵阳保安司令部司令魏镇（兼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副司令宋涛（兼副专员）向我党靠拢，积极参加和平起义。魏镇属桂系，备受蒋介石嫡系的排挤，对蒋不满。宋涛大革命时代曾任国民革命军的师长，参加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脱离了党，但对党还有一定的感情。省工委为了加强统战工作，派雷普文和熊松来邵阳，以行署秘书的身份为掩护进行工作，并与魏、宋建立联系。魏镇、宋涛在客观上对地下党的活动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他们曾二次营救中心县工委书记龙仲同志。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四月，龙仲同志向省工委请示汇报后返回途中，行抵邵东麻阳祖遇到军警的检查，发现他身上携带有党的文件，即将他逮捕关押在保安司令部。翌日熊松同志前来报信，询问陈田（龙仲同志的化名）是不是党员？说他监狱里只报了姓名，没有暴露身份，我告诉他：陈田是县工委书记，要马上援救他。熊松回去向魏、宋直言相告，由宋涛下令释放了龙仲同志。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我们二支队与黄道奇同志领导的衡西四支队在衡邵边境会合，二支队正在会合之际，突遭敌人袭击，四支队只好撤回衡西，我们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邵阳、祁阳边境活动。龙仲当天下午深感四支队内都出现分裂迹象（他在衡西工作

过，是衡西党支部的创建人），就毅然决然地只身去衡阳作调解工作，在途中被叛徒发现出卖，再次遭到逮捕。保安团迅速将他押送邵阳，我们闻讯后马上派人通知熊松、雷普文同志，请他们设法营救。同时，省工委也得到龙仲被捕的消息，即派刘寿祺同志来邵阳活动，经他与熊松、雷普文的努力，朱涛决定秘密释放龙仲。在刘寿祺同志的陪同下，龙仲同志坐李觉的汽车安然抵达长沙。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程潜、唐生智、刘兴等来到邵阳，策动和平起义，他们在参议会召开有关人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魏镇、宋涛、成刚（驻军军长）、丁廉（县长）、谢煜涛（参议会会议长），肖昆（副议长）等。与会人员在一面红绸上签了字，同意在八月响应程潜在长沙的和平起义通电而举行起义，但成刚和丁廉是两面派，在关键时刻他们背信弃义，致使邵阳的和平起义夭折。魏镇、宋涛不得不率领国民党汤季楠师的二个团以及地方保安团向龙山方向撤退。不久，宋涛带领30多人枪据转来到邵东与地下党领导的二支队会合。

在警察部队中，我们也进行了策反工作，警察大队分队长匡松在严怪愚、肖云端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渐由同情革命转变到帮助革命。他经常收集情报，为刘湘沅、伍魁元同志填写化名身份证，给地下联络员提供进出城的方便，保护地下党同志的安全。八月中旬县长胡惕强令警察大队向隆回撤退时，匡松率领40余人枪举行了起义。第二天胡惕将匡松的老父、妻子（已怀孕五个月）一家三代枪杀于大祥坪，国民党的残暴行为令人发指！行将灭亡的敌人更加疯狂，他们到处捕人，监狱有人满之患，在仓促逃跑前，他们还在城墙外枪毙了十余名嫌疑犯，其中包括长沙和平解放后回来的三青团的头子黄甲。

对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头目，我们采取了攻心战，中心县工委在五月间向他们寄发了警告信，命令他们在解放军来到

前，不得破坏和转移国家资财，不得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应立功赎罪，争取人民的宽大处理。除了卿国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丁廉、胡惕等少数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外，大多数人不愿与蒋政权同归于尽，他们为了寻找个人的出路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来与我们拉关系，特别是商会、工会和工商界的上层人物。我们转告他们，要他们相信党的政策，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保护好人民的财产。

我们通过外围组织对一部分动摇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做争取工作，如县田粮处处长唐典，绥靖公署的机要秘书、军统特务艾雨军，参议长谢煜涛等都是经过争取工作投降或起义的。因此，县田粮处的全部档案被完整保存下来了。敌人军事活动的机密情报，也是艾雨军提供的。

导群中学校长夏时是邵阳著名中统头目，此时正处子逃和不逃的矛盾之中，我们想派人去摸一下他的真实思想，五月间邵阳出现了严重水灾，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同志准备搞一次救灾公演，演出曹禺的话剧《日出》，为难民募捐，拟借用导群中学的礼堂，于是派敖振民同志出面与夏时接洽，看看他的态度如何。夏时对敖振民说：“共产党快来了，你还搞什么公演？你须知上台容易下台难，我劝你还是不搞为好，我是准备脚板擦香油，他们来得快，我就跑得快。”如此看来，他逃跑的决心早已下定，敖只好从侧面试探说：“解放军还没有打到长沙，你就准备开溜了。向你借个礼堂用几天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只是说，“你们替共产党搞义务宣传，怎么会没有关系！”敖说：“《日出》是著名的话剧，作者曹禺不是共产党，是尽人皆知的事，我们为难民募捐而公演，怎能说是替共产党宣传呢？”他迟疑了一会，最后还是同意借用礼堂。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判断夏时是难以争取的。果然，在邵阳解放前夕，他就随国民党的军队逃跑了。

“研究会”的成员在护校、护厂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都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分别与邵阳中小学进行联系。当时我们在偕进中学、导群中学、邵陵中学和省立六中等好几所中学，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办。偕进中学校长马鼎、教导主任苏抱樵政治态度比较明朗。教师王昌明参加过大革命（后脱党），敖振民曾在抗战初期在中心县工委领导下办过《真报》，参加过共青团。我在偕进中学的活动，马鼎、苏抱樵不是不知道的。他们多少起了一些掩护作用。左维同志曾在导群中学教书，另外还有“研究会”的骨干刘勋晋等同志。江骛同志在邵陵中学兼课，进步教师胡子康支持我们的工作。六中有我们的学生支部，他们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学生。除了这几所学校，其余中学我们的影响不大，因此，城市支部决定通过“研究会”的同志去作发动工作，首先要发动各中学的校长，这是问题的关键。经过一段时间的个别工作，天继中学校长伍芝，循程中学校长贺涤心，群策中学校长陈吉瑞，爱莲女校校长刘荇以及县中、简师的校长都响应党的号召，共同来做好护校、不停课的工作。全市中小学都坚持上课，教学秩序正常，除个别人逃跑外（如夏时），所有校长都坚守在岗位上，直到解放。

工商界的稳定与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关系极大，城市支部用比较大的力量抓这一方面的工作，党通过各种关系联系了姜持重、聂海平、李坤鸿、刘仲樵、谭繁昌、詹秉渊等代表人物，争取他们靠拢人民，抵制国民党军队派粮派款，共同出力维护市场稳定，安定人心，制止大商人卷资外逃，各工商业照常营业。这些都已基本上做到了。

五

湘中二支队（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总队湘中第二支队）是在邵阳、武冈等县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万安乡进步青年李建中等十余人受桂北武装斗争和宁乡姜亚勋起义的影响，夺取万安、靖合两乡乡公所的火枪，宣布武装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四、五十人，他们缺乏明确的目标，加之成分不纯，已经出现垮势。在紧急情况下，龙仲由长沙赶回邵东，派王启山、赵伯云、李平等同志到这支队伍中去加强党的领导，首要的任务是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在此基础上整顿军纪，清洗了一些不纯分子，枪毙了一个临阵脱逃，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坏队员，同时吸收一部分贫农团团员，改善部队的成分。从此，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到五月份已达100余人，活动在邵（阳）衡（阳）、祁（阳）边境。

一个月后，张大野（张秋岩）、张立吾（陆枝），以邵东两市圪一支20余人的农民武装为骨干，用武力收缴了四望山警察大队的全部火枪，举行了武装起义，并与活动于祁、邵边境的王佐、吕慎部队合组为“华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张大野一九三九年入党，后因上级组织遭到破坏而脱党。一九四九年初，他曾去香港与华南局联系，华南局同意他们搞武装斗争，答应起义后派人来）。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到300余人，不久，因与王佐、吕慎部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张大野率100余人向李建中部靠拢，两支部队经常在祁、邵边境联合行动。

同年春，武冈县白仑乡乡队副莫新春在进步青年唐道光、李梦麟的影响下率部起义，一个月之内，队伍由50余人扩大到300余人，他们打出“华南总队第三大队”的番号。其时，该部并无党员和党的组织。他们渴望党的领导，四出派人寻找。我们得悉这一信息，四月份即派莫昆州同志（六中学生党员、白仑人）秘密回乡了解情况，随后中心县工委根据莫昆州同志提供的情况作了研究。决定由龙仲同志亲往考察。在白仑龙仲同志与起义的领导人莫新春、曾明洲，唐道光，李梦麟

等进行了接触和交谈，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经过调查了解，龙仲同志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支部队的成份虽然比较复杂，但起义的领导成员，大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基本倾向还是好的，经过改造是有希望的。中心县工委同意龙仲同志的意见，决定第一步吸收曾明洲，张必烈，李梦麟入党，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第二步，全区总起义时，再派干部加强领导。六月，接省工委关于在邵阳地区武装起义的指示后，即派江骛、刘少川、覃文魁、谢翼、杨奉达、莫昆州、丁锡祥等以及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到莫部领导武装斗争，正式授予湘中二支队第三团的番号，任命莫新春为团长，李梦麟为副团长，江骛为政委，曾明洲为副政委，唐道光为政治部主任，刘少川为武工队长。其余的党员都到大队、中队担任教导员和指导员，以掌握部队的领导权。

另外尹如圭同志在太一、太二乡掌握了一支具有两面性的武装，共有300多人，分成三个中队，部队构成基础是乡公所乡丁，成份十分复杂，兵油子占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为数甚少，对于这样的部队，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不花一番气力这个部队是很难改造好的。三月初我们派了何牧、刘劲同志去该部作政治工作。不久，《新潮日报》主笔李龙牧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准备秘密逮捕，省工委得到确实的情报后，将他转移到邵阳，县工委派他去尹部。在尹部建立了党的支部，有计划地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为即将来到的全区性的武装起义打好基础。

六月中，我们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在邵阳全区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二支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尹如圭、王政直被任命为正、副司令员，龙仲、叶苓被任命为正、副政委，李龙牧、李云涛为正副政治部主任。下辖五个大队，李建中为第一大队长，陈求生（胡紫）为教导员，尹如圭兼第二大队长，何牧兼

教导员，张大野为第三大队长，王家栋为教导员，第四、第五大队合并为三团，任命已发表。

在接到省工委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时，我们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有利的条件是：一、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全国胜利在望；二、群众的斗争情绪普遍高涨；三、党在邵东有了一定武装基础和群众基础。但不利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一、国民党的军队云集湘中，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二、我们武装斗争的地区正处于衡宝、湘宝两条公路之间，地形于我十分不利，加之邵阳又是湘桂铁路的侧翼，白崇禧势必派重兵坚守；三、农村正陷于青黄不接之际，部队给养困难；四、我们在邵东虽有一定的基础，但区域不够广大，不够巩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决定以离公路较远的邵阳四盟山为根据地，莫新春部在武（冈）、邵（阳）边境活动，李建中、张大野部在祁、邵边境活动，尹如圭部在邵、湘（乡）边境活动，形成犄角之势，东面受到压迫，可向西面转移。粮食取之于国民党的赋谷和大户的粮食，在力量的配备上，以龙仲、叶苓为二支队领导机构留在邵东，因为邵东情况也比较复杂，主力应该放在这里。

尹如圭直接领导的第二大队六月中在邵东起义后，即按原定计划，扫除东乡地主武装。大队到达二乡边境，即分二路出击，中一乡地主武装闻风而逃，中二乡的枪枝则全部缴获，共长短枪40余支，内有重机枪一挺。部队在中二乡集合后，又开往仁风乡与约在这里等候的李建中、张大野部会师，沿途我们开仓济贫，散发传单，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我们雨中行军，道路泥泞，农民纷纷担煤碓铺路，晚间持火把相迎，情绪十分热烈。

正当尹、李、张三部在仁风乡会师之际，仁风乡乡长宁瑞林率领乡公所武装举行起义。这次起义是由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宁同奎，羊春秋策划的，我们将该部改编为第七大队，任命宁瑞林为大队长，宁同奎为副大队长（后宁瑞林被俘叛变，改由宁同奎为大队长），调何牧任教导员。

会师的第二天凌晨，我们集中全部兵力围攻张极垣部，张部驻扎在离仁风乡廿多华里的坝上张家，有人枪百余，张极垣守在祠堂里负隅顽抗，我们打了一个上午没有拿下，部队不得不撤离，造成这次战事失利的原因是事先对是否打张极垣，领导层认识不一致，而在军事上也缺乏统一指挥和正确的布署。这一仗不但没有吃掉张极垣，我们自己反而伤了一个人，对士气颇有影响。

下一步如何行动？原来计划是准备到四盟山建立根据地，但鉴于那里地瘠民穷，群众基础差，给养困难。经过研究，决定仍回邵东万安、太一地区取得给养再作决定，不料我们回到太一乡，尚未站稳脚跟，敌人就开始“围剿”了。

这次“围剿”的主持者是丁廉（原为邵阳县长，因破坏邵阳和平起义有功，被黄杰提升为行署专员），动用了二个保安团、三个警察大队以及陈齐、匡国军、张极垣、邓杰、谢鹏飞等地方土匪部队共五千余人，兵力十倍于我，当时尹如圭的第二大队加上司令部的人员，不过四百余人（李建中、张大野两部都留在衡宝路以南，合计300余人），针对敌人的进攻，我们在军事上的布署是：组织六个游击小组，绕到敌人的两侧和后方，以拖延敌人的进展，主力则向邵阳、湘乡边境转移。

当我们撤退到湘乡边界时，敌人已占领太一乡乡公所所在地团山，与我们相距十五华里，其后继部队由万安乡经流光岭源源来往团山。七月七日那一天，我们决定夜袭敌人的过路部队。组织了一支200人的突击队，把一些老弱病残留在司令部。袭击的结果不佳，那些战士大都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一见少数敌人，就先放枪射击，而敌人还击时，他们沉不住气，显得非常

慌乱，因此不得不迅速撤退，与前次一样，又打了一个没有把握的仗。

在我们袭击的那天晚上，敌人已分三路向我们进攻了。天明，我们在返回路途上，枪炮声已在司令部方向响起了。我们判断司令部已被包围，乃折回衡邵边境，第二天得悉司令部留守人员，武器，资财全被敌人劫走。十日，我们与衡西李建元部在衡阳境内会合，当时我们决定将主力移至衡宝路以南，留一个中队在路北打游击。

我们部队当天夜晚行动，十一日上午正准备通过水东江时，即与敌军遭遇，一部分冲过水东江到达路南，一部分过不了江留在路北，领导机构立即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大多数同志主张化整为零，我主张基本上保持主力，一部分化整为零，因为部队素质较差，化整为零后难以控制。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服从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当场决定将部队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回到太一与湘乡边境活动，一部分在太一、太二之间活动，一部分在太二与卫东乡之间活动，我与尹如圭率第一中队回到太一乡（龙仲同志此时已去衡西李建元部）。

我们回到太一、湘乡边境，在那里隐蔽了四天，其时敌人几乎全部压在太一境内，我们孤立无援，又与外界失去联系，长此以往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决定选择十六日夜晚转移到万安乡。据了解那里没有“围剿”部队，也容易与李建中部取得联系，那天黄昏，部队集中，下半夜开始急行军，行至六合亭时，只见前方是一块峡谷地带，两丘之间只有一条小路可通。我们遭到敌人的伏击，尹如圭同志因右脚受伤被俘，我则突围跑出，但腿部已受伤。我跑出伏击圈，在荒野的一间农民小屋中住了一夜，翌日凌晨向这位忠厚、善良的农民道谢后，便向万安乡方向走去，下午才找到了我们的武工队。我因流血过多，一见到自己的同志就昏倒在地。

事后知道，伏击我们的是匡国军匪部，二大队中有叛徒将我们的行动计划和时间密告了匡国军。因此，我们受到伏击。尹如圭同志当晚遇害，匡匪割下他的头，连夜送往邵阳悬挂在府门口“示众三天”。尹如圭同志牺牲后，那支带有封建性的起义部队（原为其父大恶霸尹先觉所控制）也就随之垮掉了。

在我达到万安乡时，敌人的部队又回过头来围剿李建中、张大野部。张部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李部凭借熟悉的地形和较好的群众关系穿梭于祁、邵、衡边境，与敌人周旋，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八月初，省工委派刘寿祺同志协助重新调整二支队。任命叶苓为司令员兼政委、张大野为副司令员，李云涛为政治部主任，李建中为参谋长（此时龙仲、李龙牧、王政直等同志均脱险抵达长沙）。下辖三个大队（一、三、七大队）和莫团，撤消第二大队的建制，总共有1,100余人。

我们总结了前次挫败的经验教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素质有所提高，战斗力也得到相应的加强。部队后来发展到1,400余人。

这时，白崇禧部队已全部撤至衡邵地区，企图在衡邵线负隅顽抗，我们已处在大包围之中。八月中旬，我解放大军分两路向邵阳推进，东路已达湘乡的青树坪、界岭一带，西路已进抵邵（阳）新（化）公路的龙溪铺一带，十七、十八日大炮连续响了两天两夜。我们估计，解放大军会很快拿下邵阳，因此，立即通知三个大队集中起来，以便配合大军的行动。但是，解放军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不仅未向前推进，反而稍稍后撤，东路退至湘乡的虞圻，西路退出新化县，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一个多月，是军事上的间建期。白崇禧为了拔除后方交通线上的障碍，乃下令对我二支队进行全面围剿，在邵东使用3,000兵力，在武冈使用5,000兵力，分进合击，拟将我彻底歼灭。敌

入“围剿”的方式也改变了，到一个地方就“清乡”、查户口、捉干部战士的家属，妄图切断群众与我们的联系，在行动上极其诡谲，昼伏夜出，分股搜索，面对这种严重形势，二支队领导机构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彻底分散，另组成若干精干的短枪队，声东击西，灵活出击，不断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镇压为虎作伥的恶霸地主。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晚上休息，白天活动。

在敌人的残酷“围剿”中，我们也遭到很大损失。三大队的教导员王家栋同志被俘，惨遭杀害。莫团中队长唐桂元同志英勇牺牲。此外，还有20多名战士阵亡。

九月下旬，我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白崇禧的防线，敌军土崩瓦解，纷纷逃窜，我们迅速集合部队，有力地配合大军解放了邵阳、武冈二座县城。

解放后，部队集中整编，莫新春的三团改编为省军区独立17团，一、三、七大队改编为独立16团，龙仲、张大野、李建中等同志分别到这二个团担任领导工作，我和其他同志则留在地委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沙兄弟书店

邓 墨 如*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党在长沙创建了一个传播新文化和革命思想的据点——长沙兄弟书店，由我担任经理，周逸萍同志任副经理。现就回忆所及，将建店的前后情况概述如下。

从重庆到长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国内外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指示重庆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同时，决定从这三家书店抽调一批干部，派往曾被日寇占领过的大中城市去建立党的出版发行阵地。当时，刘逊夫等同志被派去上海；欧阳章、刘起白、尤开元、金思明同志被派去武汉；我和周逸萍同志被派到长沙。我们一同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底从重庆出发，这正是国民党忙于下山摘桃子、接收大员满天飞的时候，水陆空交通工具都被官僚和大亨们所控制，黎民百姓要买飞机、汽车、轮船客运票，难于上青天。在此情况下，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雇到两条木船，由长江顺流而下。同坐这条船的除上述同志外，还有《新华日报》社的戈宝权同志、开明书店的傅彬然同志和生活书店的曹辛之同志的爱人陈文巧和她的姐姐陈文菊女士。大部分是党员和进步人士。我们

* 作者原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当时任长沙兄弟书店经理。

离开了“浓雾”弥漫、空气窒息、特务横行、民怨沸腾的重庆，来到船上，都有一种“步入扁舟心坦然”的感觉。十几个人挤在前后舱里，毫无拘束，亲密无间，可以纵情歌唱，畅谈一切，自然别有天地，令人心旷神怡，并为两岸美好的风光所陶醉。三家书店的同志，利用短暂的休闲时期，有的在抓紧时间学习，有的在促膝谈心，有的在总结斗争经验，有的在为未来工作周密筹划，大家对革命前途和党的事业充满了希望。在船上，戈宝权同志给大家很深的印象。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在同志们的要求下，讲述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见闻，讲述与邹韬奋同志的深厚情谊，讲述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艰苦岁月，讲述与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亲密关系，讲述写作和编译工作的经验，使大家增长了知识，受到了教益。傅彬然同志是出版界的前辈，他谈笑风生，所讲的出版方面的史料和开明书店、广西文化供应社的有关情况，大家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陈文菊、陈文巧女士，为人正直，纯朴善良，乡井情深。我和周逸萍同志与她们结为乡亲。她们的父母居住在长沙。陈文菊女士回家探亲，当知道我们到长沙人地生疏时，便主动给其父母写信，介绍我们去她家住宿，并要父母在各方面尽力给我们以帮助。

我们的船装载着十几个人和几十大包书刊、纸型，负荷重，靠橹桨划行，船速很慢，日行夜泊，曾在丰都、万县、巫山、宜昌、沙市、岳阳、嘉鱼等几十处地方停留。因此，未能“千里江陵一日还”。航行近一个月，才到达武汉。我和周逸萍同志在汉口逗留几天，将几十包书刊托运后，便乘车南下。这时，交通秩序很乱，粤汉铁路还未全线通车，我们坐汽车牵引的轻便火车至岳阳，再坐木船至长沙。到达目的地已是朔风怒号的十二月初了。这次长途跋涉，所经之处，满目疮痍，大家对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无不义愤填膺。

书店的筹备和命名

我们一到长沙，就立刻去上学宫街居由巷一号拜访陈文菊、陈文巧女士的父母。其父陈正勋（下称陈老先生），号禹襄，生于一八八六年，长沙县人，虽已年逾花甲，但身体结实，精神矍铄，犹如四十开外的壮年。他毕业于将弁讲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时，是叶挺同志部队的官员，在汀泗桥战役中负过伤，后在湖南杂税局任职。宁汉分裂后，挂冠为民，对蒋介石残酷屠杀革命人民极为不满。他为人纯厚耿直，性情豪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陈耿同志及其爱人许升同志去延安工作之前，陈灿文同志去洪湖参加革命之前，都曾得到他的资助。陈文菊的母亲刘五云，系城市妇女，主持家务，非常贤慧，善与人处。他们看过女儿的介绍信后，把我们视若上宾，热情接待，再三挽留在他家住宿，盛情难却，只好听从安排。我们住下来以后，便拿着刘逊夫同志的介绍信，去桐荫里五十一号看望湖南省府顾问、省公医院院长曹伯闻和他的爱人周凌云同志，受到亲切的接待。曹历任湖南省建设厅长、民政厅长、浙江第七区专员、湖南第八区专员等职，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接触极广，有一定声望和影响。一九三二年我党刘道衡同志来湘开展工作时，曹与他的爱人给予很多帮助。后来，他们又资助上海社联办刊物，对我地下省委负责同志周里和熊子烈、曹治阳等同志尽力掩护，帮助不少。我们与他虽是初次见面，他却非常友好，态度诚恳，一再表示：如有什么困难，当尽力帮助解决。

接着，我们走访一些书店，了解市场情况。当时的长沙，由于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蹂躏，社会文化状况十分落后。整个长沙市共有二十多家书店，其中专卖教科书和各种参考书的十家，经销文具为主兼卖一些书刊的九家，经销书籍为

主兼卖文具的四家，有一家主要销售儿童书籍，有一家专卖地图。进步书店有徐汉卿、徐伟兄妹开设的求知书店，孙阜民等同志开设的中国书店，郑励新、陈明、陈茂志等同志开设的大公书店，沈立人、陈静山、蒋绍葵等同志开设的文化书店。进步书刊较少，于是，我们携带书目到几家规模较大的书店去销售，大约个把礼拜，就把随身带来的书刊全部批发出去了。这一消息迅速传开，不少的书店便主动找上门来洽谈业务，要求建立联系和批发书刊。我们与武汉联营书店关系密切，该店也是党领导的书店，经理马仲扬同志，对我们大力支持，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又从武汉联营书店运回几批书刊，很快销售一空。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作了过细研究，认为在长沙建店营业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于是，边向上报告，边着手筹备。

在陌生的地方筹建书店，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时我们资金短绌，没有铺面，困难不小。但是，进步的事业，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赞助是分不开的。在筹建期间，陈老先生曾大力给予帮助，他托人在蔡锷路伍家井与宝南街两条巷子之间（现在的蔡锷路一八四号）为我们租到了铺面。湖南省邮政管理局伍正心同志听说我们要在长沙开设书店，便主动到居由巷一号与我们联系，说他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长期读者，渴求进步，向往未来，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愿意向我们书店投资，共同为进步文化事业贡献力量。我们立即对伍正心同志的情况进行了了解，据反映，他思想进步（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很好，在邮政局职工中有一定影响，是办《邮声》刊物（进步的）和与黄色邮务工会作斗争的骨干，他们确实想为进步文化事业出力，向我们书店投资是真诚的。当我们得知这些情况以后，便同意接受投资一百四十元（银元），这对书店的建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非常感激。

筹备工作快要结束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能否挂“三联书店”的招牌？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和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的出版发行机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传播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在各个阶段的政策和主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它们恨之入骨，把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国统区的许多分支机构已被捣毁、封闭或被迫关门。国民党政府日益反动，他们是绝对不允许“三联书店”在长沙合法存在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我们把书店的名称定为“兄弟书店”。这是“三联书店”的化名，其寓意是三家书店亲如兄弟。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一切就绪，“兄弟书店”便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正式开张营业。

五个月的苦心经营

兄弟书店的招牌挂出来后，对长沙文化界、图书出版界、教育界以及广大青年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每天店门一开，人如潮涌，川流不息，要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打烊整理内务。

书店的工作人员共计九人，除我和周逸萍同志外，还有伍迅云、邓钧洪、周玲、李茵、孟可、陈文彪、邓逸等同志。我和周逸萍、伍迅云同志自始至终在书店工作，其余的同志都是中途或是接替性进店工作的，有的只工作个把月就离开了。我和邓钧洪同志是党员，其余的都是进步青年，有的是建党对象。从总的方面说，大家表现不错，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奋学习，艰苦奋斗，始终保持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好思想、好作风。

兄弟书店经销的书刊，种类繁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

社经哲史，教科文卫，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他销售的书刊，除马、恩、列、斯的理论书籍外，还有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许多革命理论书籍。大部分书刊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出版的，是上海三家书店、重庆三联书店、武汉联营书店、广州兄弟图书公司供应的。毛主席的著作和有些革命理论书籍，当时在国统区不能公开出售。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一颗为传播革命思想的赤诚之心，他们对顾客进行仔细的观察，凡肯定是进步读者，便给予暗示，约定时间，把藏在别处的禁书秘密地送到读者手里。此外，我们还经销由《国民日报》编辑主任黄明同志（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主编的湖南地下党合办的《人民世纪》，还与湖南大学进步学生的领袖汪澍白同志（不久后入党）联系，经销他们“世纪社”出版的《天下文萃》（进步刊物），并作为这两个刊物的代销处，向省内外同行推销。由于兄弟书店销售的大部分是进步书刊，这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读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在这里得到自己喜爱的精神食粮，都为之雀跃，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当局极为不安，虎视眈眈，想伺机加以破坏。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对各界人民的民主运动和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进行疯狂的破坏。二月在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大批特务破坏群众庆祝“政协”的会场，狠毒地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几位国内外有声望的人士。接着又发生了大批特务捣毁《新华日报》馆的事件。其他城市进步书店被封闭的消息，也相继传来。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在长沙已有明显的征兆。

为了使书店在这种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存在下去，我们持邵荃麟同志的介绍信，去赐闲湖看望和求教肖敏颂同志和他

的夫人曹国智同志（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肖敏颂同志，学生时期参加“一二九”运动及救国会工作。抗战时期，历任长沙市文抗会常务理事、中苏文化协会秘书、广西大学教授等职。原是中共党员，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民盟南方总支部执委。当时他在长沙从事民主运动，开展地下民盟工作，我经常与他联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有事便和他商量。

书店经营一段时间之后，陈老先生便来告诉我，说有个同族不同宗的堂弟，住上学宫街二十二号，叫陈士葵，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要员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的经理，到处打听我和周逸萍的来历，摸我们的底细，并且透露说：兄弟书店不象一般书店，行迹可疑，正受到密切注视。大约在四月中旬，邓钧洪同志离开书店去《国民日报》工作，李茵同志前来顶替他的职务，地下党的同志劝她不带行李，说书店已被国民党注意，存在的时间可能不长了。接着，伍正心同志前来反映，说他从堂叔伍钟山（楚怡工业学校教导主任）那里得知，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已指令各个学校，不准学生到兄弟书店看书和买书，否则，以“左倾分子”论处。与此同时，我们店里也出现很多反常情况：一是那个陈士葵以中国文化服务社经理的名义，打着洽谈业务和了解行情的幌子，多次假惺惺地登门“拜访”，问这问那，神态异常，口蜜腹剑。陈士葵历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和书记长、长沙市政府文教科长、长沙市党部书记长等职，是湖南中统特务重要分子，一贯从事特务工作。他所开设的“中国文化服务社”是文化特务机构，专门从事破坏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和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尽管他巧舌如簧，我们则心中有数，严加防范。二是有一位奇怪的女人，自称是三青团主办的《中兴日报》门市部经理的老婆，突然光临。我们之间，素昧平生，毫无半点瓜葛。可是，她简饰淡抹，装着十分纯朴善良

而又非常温顺脆弱的样子，常来与我们的工作人员接触。开始只是一般社交，问寒问暖，山水虫鱼，随便闲聊。经过一段时间，她却得寸进尺，从谈生意到了解我们店里的内幕和工作人员各方面的情况，而且多次作为不速之客闯进我们的宿舍。对这样来路不明和居心叵测的人，我们始终保持应有的警惕，她只能是“机关算尽空无获，来去匆匆枉费神”。三是店堂里常来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夹在人群中交头接耳，左顾右盼，鬼鬼祟祟。

面对这些情况，绝不能等闲视之。我们的对策是：一方面，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提高警惕，谦虚谨慎地接待顾客，坚定不移地做好工作；另一方面，立即将一些违禁书刊转移到梁宜苏、罗迅青同志和张竹云同志家中，请其代为保管。梁宜苏和罗迅青是夫妇，是地下党员（当时把他们看作进步人士），家住南门口南极里二号。梁当时隐蔽在国民党空军电台当领班，其父梁镜魂曾是李济琛、宋希濂的幕僚，与李、宋交谊很深。张竹云同志是进步学者廖伯华同志的遗孀，与三家书店特别与读书生活出版社关系密切，家住中正路（现在的解放路）登隆街口杂货铺楼上，没有社会职业。转移在他们家里的违禁书刊，都保存得很好，没有出问题，这对我们秘密地传播革命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被迫关门和安全撤退

一九四六年五月底，我苏北区党委宣传部华应申同志托刘逸夫同志给我写信，要我去辰溪把他长期匿居在那里的母亲和妹妹（应吉）接来长沙，再托人送往上海。我认为这是党交给的任务，是我长期仰慕的老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便马上照办。当我把华世母和应吉同志接到长沙，非常疲惫地走进店里时，还未坐下，周逸萍同志便急忙告诉我，说大批特务已封闭了求

知书店，徐汉卿、徐伟兄妹被捕，下落不明，中国书店被特务捣毁，所存书籍和文具被抢劫一空。同时还说，陈老先生已得到可靠消息，敌人封闭、捣毁求知书店和中国书店之后，马上要搞我们，必须早作防备。为了研究对策，我们立即向陈老先生了解详情。据说：陈士棻在一次谈话中，对兄弟书店、求知书店、中国书店极力诽谤，尤其对兄弟书店非常脑火，可能很快会下毒手。在此紧急情况下，我们立刻去武汉向邵荃麟同志汇报。邵是文化出版界的老前辈，是新知书店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兄弟书店不能继续办下去，可关门停业，撤退至武汉办理结束事宜。

怎么撤退？这是大事，必须周密考虑。经与周逸萍等同志商量，决定施用缓兵之计，以便争取时间处理一些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与敌人周旋。第一、请陈老先生去见中统特务陈士棻，说明我们是他女儿的好朋友，是老实商人，确无越轨行为。第二、把兄弟书店的处境告诉曹伯闻院长，请他在国民党中、上层人士中做些劝说工作。第三、与肖敏颂同志一道分析形势，研究敌人的动态，请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中起些缓冲作用。第四、陈老先生还介绍我们去见三青团长沙市分团部的视导陈佛舟，请他为我们向有关方面说项。陈佛舟与陈老先生是同宗兄弟，情谊较深。此人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大革命时代，在郭沫若、李富春同志部下工作过。他在国民党、三青团的地位虽然不高，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找过一些人，说了一些好话。他还建议我们去见湖南省三青团支团部宣传处长兼《中兴日报》社社长甘复初，说甘管宣传、新闻、出版方面的工作，如他从中疏通，定能得到反动当周的谅解。

去不去见甘复初？开始我们有些犹豫，怕受骗上当，后来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去比不去好。去，可起一些麻痹作用，可

了解一些动向。我是一个人去见甘复初的，首先作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兄弟书店的负责人，是陈佛舟先生要我来见他的。然后简要地叙述兄弟书店遭诽谤的情况，请他主持公道，为我们向各方面美言几句。他沉静了片刻，便滔滔不绝地说了些青年人应该如何如何之类的官话。接着，问我是什么地方人？过去是干什么的？书店是哪些人开办的？有多少资金？与哪些书店有来往？生意好不好？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有假有真，大部分是假的。当我谈到资金少和生意不大好时，他便马上插话：光卖书刊不行，《中兴日报》门市部生意很好，你们两家可合伙扩大经营！他这个意见是不能同意的，但为了缓和矛盾，赢得时间，我却扬言他的建议可以考虑，不过，个人不能作主，要回去与表弟（周逸萍）商量后，再作具体答复。甘频频点头，没有提别的什么问题，这次会见就到此结束。

经过以上这些活动，根据各方面的反映，估计国民党有关当局还不会马上对我们采取不测行动。于是，我们抓紧时期，迅速撤退。

一、提前撤走部分人员。正在准备撤退时，隐蔽在《国民日报》任编辑的邓钧洪同志，因遇上一位做特务工作的原在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注意了他的行动，身份已经暴露，经省工委负责人决定，要他马上离开长沙去苏北或华北解放区工作。我们托他顺便把快要分娩的周玲同志送往武汉，把华世母和应吉同志送往上海。此外，还要李茵、孟可同志提前离开书店。

二、疏散财产。为了不惊动敌人，我们白天照常开门营业，晚上便把需要寄运的东西，都用邮寄或向铁路局托运的办法运走。门市部陈列的书刊和私人必需的用品，在关门停业的前一天晚上，雇一条船连人带物全部运去武汉。

三、清理帐目。在几天时间内，把与长沙同行的往来帐全部结清。关于伍正心等同志的一百四十元投资，也如数归还，

但未付分文红利，深表歉意。

四、出顶铺面。在撤退工作中，感到最棘手的就是铺面出顶的问题。可是，事出意外，大家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却非常凑巧地遇上原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过的熊岳柏，他正准备开店做香烟杂货生意，因找不到铺面而着急。在此情况下，经周逸萍同志介绍，很快就把铺面转让给他，双方皆大欢喜。当时与熊有个君子协定，就是我们在一个晚上把该运走的东西全部送走，留下货架和柜台，由他陈列好出售的商品，作衔接性的开门营业。这样，我们撤走后，店门一开，只见香烟不见书，兄弟书店不翼而飞，人们为之诧异。

五、认真办理结束工作。待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全部财产安全撤走以后，梁宜苏同志代我购买去汉口的火车票，他穿上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服装，系上斜皮带护送我上车。我到达武汉后，便和周逸萍同志分别向新知书店的负责人沈静芷同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黄洛峰同志书面汇报，并请示工作。后来，我们遵照洛峰同志的意见，把全部财产和帐目移交给武汉联营书店。从此兄弟书店的结束工作顺利完成。撤退至武汉的同志，在党的关怀下，各自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兄弟书店从创建到结束，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同志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处于黑暗中受知识饥荒的长沙人民输送精神食粮，为党的文化出版事业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就我个人来讲，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未能使书店多延续一些时间，对此感到遗憾。在这里，我对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对已故的陈老先生表示最深刻的怀念！他明知兄弟书店就是“三联书店”，是国民党政府所不容的，却不怕受牵连，为我们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四处求援，真是难能可贵，不愧为我党的挚友。

野火春风战太行

穰明德*

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十二月，我八路军对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破击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它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气焰，致使日军惊呼“对华应有再认识”。不久，以冈村宁次为总司令的华北派遣军决定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这使得我敌后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斗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揭开了敌后抗战最艰苦卓绝的一页。我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起由延安抗大总校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兼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一段难忘的战斗岁月。

一

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日军疯狂地推行“囚笼政策”，在铁路、公路两旁大肆挖沟、筑堡、垒墙，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屠杀中国人民。以晋中昔阳为例，这个仅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县，被日寇打死、枪杀、活埋的抗日干部和群众就有数万人。西峪村有近百户人家，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队日军把全村男女老幼赶到村口，不由分说就用机枪疯狂扫射，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几分钟内全部倒在血泊中，尸骨成堆，血流成河，其状惨不忍睹。有一对死去的母子，婴儿仍紧紧地啣着母亲的乳头，母亲的手还死死

*作者原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兼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

楼着自己的亲骨肉，连指甲都深深地陷进了孩子的肉里。在离县城十八里的居仁村，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对敌斗争十分出色，自卫队仅有三条枪，曾粉碎了敌人数次扫荡，是日军眼中钉、肉中刺。一次四名干部不幸被捕，日军抓来他们的家属，当场砍下四个人头，还不准亲属哭泣，谁哭就用刺刀活活捅死。

斗争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化，坚持开展敌后斗争一天比一天艰难。加上华北地区连年干旱，粮食欠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常常挖野菜、摘槐树叶充饥。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油盐很难买到。倘若能吃上一顿小米饭，野菜里有点盐味，就算是改善生活，打牙祭开荤了。记得有一次刘伯承师长患眼病，医生嘱他多喝糖开水，可一打听白糖要几块钱一两，他笑着说：“不用买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于是他光喝白开水治疗。至于医疗条件就更谈不上。那时疥疮特别流行，许多战士都染上了，浑身上下又痒又臭，大家只得找来几块腐朽的棺材木头烧着来烟熏火烤。战士们为此还编了一首顺口溜：“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扭三圈，屁股扎老营。”体现了战士们苦中求乐的精神。并常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自勉。

总之，环境十分恶劣，敌人百倍凶残，生活非常艰苦。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开展敌后斗争呢？加上我旅当时减员不少，新动员来的战士又按师部指示全部拨给了五旅。我心中十分焦急，心想我旅力量越来越少，很难应付敌人。太行二分区的斗争还能坚持吗？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正在这时，刘伯承师长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刘师长在信中指出：“为了粉碎敌人‘总力战’的‘格子网’阴谋，我们必须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第一要加强游击区、敌占区工作，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开展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这是当前准备持久作战的三项中心任务。我们要采取

“隐蔽精干”与“长期潜伏”的方针，打入敌人内部，同时争取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第二要迅速建立我们部队的拳头，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机会狠狠打击敌人，将敌人限制在据点内。”信中刘师长还用“按跳蚤”、“啃核桃”的生动比喻，反复说明了建立拳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布置了我旅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开展游击区、敌占区工作，发动群众有步骤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因此，除保留三十团作为自己的拳头外，还要将二十八、二十九团的骨干抽出一部分来，充实到各县、区去，加强地方武装力量。”我和曾绍山同志把刘师长这封包含着深刻的战略思想的信向全旅指战员传达了，大家听后深受鼓舞，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二

我太行二分区主要是在晋中的和顺、昔阳、平定、寿阳、榆次、太谷、祁县、榆社和辽西（今左权）等县活动。“百团大战”前，晋中虽也有不少日军据点，但敌人只能龟缩在碉堡里。其余平原和大片山地都是我敌后抗日健儿的用武之地。破击作战时，我们的平射炮和迫击炮可以推进到离敌据点两百米左右的地方进行准确射击。“百团大战”后，日寇惊呼“对华应有再认识”，驻阳泉的日军头目派了日本特务清水到昔阳一带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阴谋伎俩。此人三十多岁，军阶不高，只是个伍长。但他可调动一个团的兵力，受旅团直接指挥。清水生性残忍毒辣，狡猾奸诈。当时有个县农会主席张爱之，在抗日根据地“东武川”不幸被捕。清水要他说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他至死不吐一字，就叫人剥光他的衣服，吊在树上，亲手拿刀割掉了他的生殖器，最后还朝其部位猛戳数刀，这位英勇的抗日干部被折磨死去。他的狡猾也蒙骗了一

些人，他常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做出怀柔的姿态，到一些村子拜访百姓，并送上些粮食之类的东西。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样他向一些群众骗取了不少有关我军的情报。

此人还有个特点就是不断改换伎俩，不肯轻易上当。如我们在弓家沟打了一次埋伏，烧毁了日军四十多辆军车，敌人气急败坏，派清水前往侦察情况。他向日酋建议，今后弓家沟仍可常来常往，虽是交通要冲，但八路不易埋伏，这次吃亏在于轻敌。因此，每次敌人经过这里，都要派人在周围三百米内进行扫荡，当确认安全后才通过。

清水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建立据点。首先他在昔西占领了张庄，作为昔阳县城伸出的触角，然后在昔北的锁房建立了第二个据点。锁房紧靠公路是南北交通要塞，控制锁房就意味着切断了昔西与昔东、平东之间的交通联系。紧接着又占领了离县城较远的沾尚，妄想阻止我军在平辽公路两翼活动，使我游击斗争无回旋余地。

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一个大队或中队在新建的据点驻扎几天，对周围进行一番扫荡，建筑初级工事后，就开到别处去了，只留下少数兵力防守。我们发现后，选择了离县城较远的沾尚进行袭击。敌人鞭长莫及，我们轻而易举地把沾尚夺了回来。然后请回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坚定他们同日寇斗争的信念，并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建立抗日武装。一些群众都希望我们留下来，我们主观上也认为，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保护群众，责无旁贷。于是我们坚守沾尚，同卷土重来的日军较量。但因敌强我弱，我们很难长期阻击敌人，打了几个回合又被敌人占领了，等日军大队人马走后，我们又把它夺了回来。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敌人虽然伤亡不少，但我们损失更大，群众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日军每次重新占领沾尚后，总要在村子里洗劫烧杀一场。

直到日军庞大的马坊据点建成后，我们才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同敌人硬拼消耗是愚蠢的，是违背毛主席、刘师长军事战略思想的。我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刘师长的亲笔信。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但有一部分干部战士思想不通，主张硬拼以保护群众。针对这种片面观点，我们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这些同志详细说明，与敌人硬拼、血刃，固然可以暂时保护群众利益，但因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这样打来打去，吃亏的还是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更损害了群众利益。而且硬拼消耗，不利于我们保持有生力量，同敌人进行持久的游击战争。我们还引导大家回顾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反第五次“围剿”时，由于排斥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王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跟蒋介石搞寸土必争，也筑碉堡、修工事，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这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主张，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进行了批判。我们再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了。我们主动放弃了沾尚。

三

清水很快知道我们改变了策略，他也变换了伎俩。日军兵力不足，想要扑灭我太行二分区军民的抗日烽火是办不到的。于是清水在昔（阳）西网罗一批汉奸、叛徒、地富分子，胁迫一些无辜群众建立反动武装——“灭共自卫队”，企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手段来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灭共自卫队”，就是所谓“棒棒队”。因其成员大多是被迫参加的，日本人对他们不甚放心，很少给其发枪，只发给木棒，人手一根，所以群众叫它“棒棒队”。

提起“棒棒队”的建立，也说明清水其人十分恶诈。他在张庄、锁房、沾尚、冀家脑、狼峪、北韦城、十字道岩、马坊

等地建立了据点，形成了遍布平西、昔西的“格子网”后，就在各村庄抓一批青壮年，采取先打后拉，软硬兼施的伎俩，逼迫他们表态“反共灭共，拥护皇军”，参加“棒棒队”。几个彪形大汉拉出几个人施以酷刑，鞭抽、刀刺、狗咬、铁烙、火烧、水烫、活埋，无所不用其极。据当时被抓的人回忆，有一个人被拉出后，用开水从头上往下淋，昏了过去，然后再用烧红的烙铁将他烫醒。人们见此惨状不寒而栗，无不唏嘘泪下。一些贪生怕死的人被清水拉了过去；少数死心踏地的汉奸卖国贼则加倍表示为敌人效犬马之劳；但更多的人不愿做亡国奴，背叛自己的民族，替日本人残害同胞，只是迫不得已口头表示“拥护皇军”，参加了“棒棒队”，而内心却没有屈服。当然更有至死不屈的英雄，如一个抗日积极分子不喊“拥护皇军”，清水恶毒地将他母亲抓来，同时将母子俩的衣服剥光，让他奸污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个青年忍受不了这种灭绝天伦的奇耻大辱，对准身边的日军猛踢数脚，清水见他不从，叫一名日军当众强奸了他母亲，他奋然挣扎反抗，清水就放出几条恶狗将他活活咬死。真是惨绝人寰，丧尽天良。对那些屈服和表面屈服的人，清水则施以小惠，请他们吃饭喝酒，然后发给衣服、木棒，正式成为“棒棒队”员。更险恶的是，清水企图瓦解我们的队伍，他选择一些与“棒棒队”有瓜葛的对象，暗地派人送上金钞细软，或以美色引诱，这样少数意志薄弱的人被拉了过去，使我们的斗争受到了一定损失。

清水经过一年多的惨淡经营，一群千余人的乌合之众，反动武装——“灭共自卫队”在昔阳拼凑起来了。清水先集中他们在县城受训，接受日本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思想，训练他们掌握一些军事常识和作战本领，为日寇推行“囚笼政策”，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培养爪牙，豢养走狗。尔后，一部分“棒棒队”员前往通向马坊的必经之地沾尚固守据点，进一

步修筑工事。为巩固昔阳，保护平辽公路，另一部分“棒棒队”员在日本人的带领下来到了马坊，修筑了一条直通马坊东面山坡毛儿脑的公路，并沿线加固工事，建立了碉堡群，不但有公路相接和蜿蜒小径相连，还有地道相通。

此时，清水来到马坊活动了一个时期，派了一个日军中队驻扎。清水为什么对远离县城的马坊感兴趣呢？这里气候酷冷，春风不度，吃住条件极差。日军驻防部队都是一月换一次，而清水则常来常往。原来马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地处我分区腹地，又是寿阳、昔阳，和顺三县交界处；西南又是我群众基础雄厚的老根据地，占领马坊就能截断我军与各县之间的联系；北面的寿阳，西北的榆次、太谷又都是敌占区，且靠近铁路线，便于敌军增援，夹击我八赋岭根据地。因此，占领并防守马坊，对牵制我军行动，觊觎我抗日根据地，割断各县之间的来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马坊遂成为我分区军民的心腹之患。

这时，我军已转移到八赋岭地区。我们放弃了过早打硬仗、收复失地的主张后，一些群众不太理解，地方党政少数同志也埋怨我们对敌斗争不坚决，想保存实力，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受损失。狡猾的清水趁机在各个行政村建立伪政权——

“维持会”，以笼络收买人心。一时间，整个二分区除靠近八赋岭的五个行政村没有伪组织外，其余各村都“维持”敌人了，日寇的反动气焰达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真有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我旅遇上休整也只好到南面的三分区去。我们对群众不敢相信了，他们对我们更有了不满情绪，“百大团战”前的那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淡薄了。

一次，我旅派一个同志去敌占区了解情况，都只能星夜出发，当他爬山越岭几十里，半夜来到家门口，还不敢进去，只得从邻居矮墙爬进院子，叫醒妻子，妻子对他说：“‘棒棒队’

天天都来家里搜查，骂我们是‘匪属’。村里‘兴亚会’（日本人操纵的伪组织）的人也常在周围游弋，扬言要活捉你。”天亮后，维持会长把他父亲叫走了，说是开抗日干部家属会，他吓得立即躲进了夹墙，心想自己进村没碰见人，连狗都未惊动，莫非父亲报案去了？心中好不生疑，直到父亲回来后，他才放心。父亲说：“刚才开会，要我劝你回来投降，说你在共产党那里做多大的官，回来还做多大的官，并要我带上干粮，明去探亲，暗中把你骗回来。我看你还是回来算了，不然真要让他们抓住，可要杀头的。”见父亲软弱，他坚定地回答：“我不能当汉奸，死也不能当，我抗日抗定了，就是死也不回头！”可见敌人是怎样挖空心思破坏瓦解我们的队伍，割断群众同我们的鱼水情。

有些“维持会”实际上是两面政权，会长由日本人指派，具体是谁，我们无从知道。清水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命令他们每天报告两次我军活动情况。多数人不忍出卖同胞，总是敷衍了事。有一个维持会长每次送情报总是几句原话：“匪首：县委书记程萍、县长王克坚、公安局长张立栋、县大队长刘风采、副政委傅贵祥，人数三百余，枪弹数半，衣服杂色。”从不报告我们的行踪、去向和军事意图。

但“维持会”、“棒棒队”等伪组织中确有些人是日寇的帮凶。他们鱼肉乡里，蹂躏百姓，探我军情，成为我敌后斗争的一大障碍，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虎口，一九四二年春驻小安丰的昔阳县政府一百多人，因密探报信，被敌人包围。县大队只有几十个人，他们边掩护大家撤退，边进行阻击，但因寡不敌众，伤亡很大。这就是有名的“小安丰事件”。

总之，我军在昔阳一带开展敌后斗争，已十分困难。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做法，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恢复鱼水关系，共同对敌。旅兼

军分区党委再一次学习了刘师长的信，制定了新的斗争方案。

四

首先，我们组织几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化装离开马坊前沿这块胶着地带，深入榆次、寿阳、平定以南的长凝、范村、洛塔等敌寇据点周围的“格子网”里进行秘密活动，开展政治攻势，以对抗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武工队中有当地人，熟悉地形，因此常选择夜晚秘密进入村子，贴上一些署名“八路军”的抗目标语，在附敌分子、奸细和汉奸的家里塞进纸条，警告他们洗心革面，弃暗投明。然后虚晃两枪，惊动四里，迅速离开村子。我们这种来无踪、去无影、半秘密、半公开的夜间行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一是群众知道了八路军还在坚持敌后斗争，并就在他们身边活动；二是一些附敌分子和伪职人员的劣迹有所收敛，不少人还改恶归善了。

武工队活动的次数多了，有的群众就主动出来与我们进行联系，我们也派人化装前往接头。从策略计，我们的人不从马坊一带北上，而是绕道太谷、榆次等铁路线，有时甚至取道太原再东行至寿阳、阳泉、平定一带站稳脚跟。有的通过亲朋戚友打入敌伪组织，有的通过各种渠道开设商栈小摊，从而取得合法身份，然后再深入各个村子与群众联系。这就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但坚持了敌后抗战，就是在敌占区我们也没有放弃斗争，这使群众看到了希望。我旅政治部有个二十多岁的女同志，叫曹春兰，靓扮成一个女学生，通过亲戚关系在阳泉落了脚，成为我军在敌占区的谍报员。平定有一伪军中队长是个为非作歹的害群之马，欠有血债，破坏过我地下党组织。曹春兰同志知道后，立即与当地群众配合，很快掌握了解了他的活动特点。一次武工队趁他同姘头寻欢作乐时，将他活捉，并就地伏法。当天，我们以平定县长的名义到处张贴布告，明正典刑，以示天

下。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一部分附敌分子也被争取过来，从而警告了胁从，孤立了汉奸。

与此同时，我们还决定变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政权。并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开明士绅，恢复建立每个村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

开始我们与个别进步群众联系，了解到一些维持会长的情况后，即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镇压了个别民愤极大的维持会长，大灭了敌伪的威风，大长了群众的志气。接着逐步建立地下政权和党组织。行政村长一般由我们争取过来的有民族自尊心的维持会长担任，可谓“一身而二任焉”。清水只知道这些人是他忠实的维持会长，却不知其中很多人又是我们更可靠的地下村长。从此，向日军报告的情况都必须经过我地下党组织指定的同志认可后，方能送出。因此，大大减小了我军敌后活动的危险性。

至于开明士绅，过去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同他们有矛盾，但他们和我们更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民族自尊心。基于这点，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做他们的工作，阐明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团结他们一道抗日。我还亲自化装教书先生，跟一些士绅打过交道。开明士绅一般都有学问，因此，同他们结交也必须懂得一点之夫者也，否则难以开展工作。“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在我马倥偬之余，我也读点古籍。对天文地理，野史掌故，略知一二。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常与开明士绅谈论今古，臧否人物，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所不至，关系打得火热，大有相见恨晚之憾。一次我对一个士绅讲到毛主席《论持久战》中的一句话：“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他讲：“‘人人得而诛之’是孟子在《滕文公

下》中讲的。”我说：“是的，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团结一致反对妥协的，如今我们炎黄子孙更要同仇敌忾。对付入寇，才对得起列祖列宗呀！”他听了连连首肯应诺，并引用《诗经》里的一句诗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后来我患了急性肠炎，因部队流动性大，无处治疗，与这位开明士绅联系，他表示接受。战士们把我抬去后，他精心照顾，病很快就痊愈了。他家离敌人据点只有几百米，由于他设法掩护，始终没被敌人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做统战工作的甜头。

五

我们采取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打入日寇伸入我分区腹地的庞大据点马坊以及其他一些据点，到敌人心脏里去战斗。并同武工队密切配合，分化胁从，消灭叛徒，打击敌人。

日军一般不让伪组织的人住在同一个碉堡里，只让其住在碉堡两侧下面的窑洞中，里面阴暗潮湿，臭气熏人，难以窝身。因此一些人都想脱离虎穴，回家团圆。“棒棒队”还不能进入据点里层的铁丝网，也不准单独外出活动。敌人知道，这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民族的意志是无法用武力征服的。因此，我们派其亲属明去探亲，暗做工作，明确告诉他们要识时务，共产党八路军既往不咎，只要抗日就是一家人。不愿做亡国奴的都不应该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多行不义必自毙”，谁做了坏事，群众心中有数，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都有数。另一方面，我们大量张贴关云长的画像和曹植的《七步诗》，用《三国演义》中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历史故事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古训去感化他们，劝其莫骨肉相残。由于我们对症下药做思想工作，效果很好，不少“棒棒队”员暗自跑回家中，有的还参加了抗日武装。

在分化瓦解伪组织和“棒棒队”的基础上，我们还选派了

一批坚强可靠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打入进去掌握领导权。先是物色几个我们相信，清水也相信，表面上反共，实际上已被我们争取过来的人到清水那去引荐。因为清水正要拉拢破坏我们的队伍，以达到他“以华制华”的目的。尽管这样，我们的人过去后，清水仍不肯轻易相信，总要亲自拷打，验明正身。为了对敌斗争需要，取得清水的信任和重用，过去的同志可向清水报告一些无关紧要的军情。如我军领导人的姓名、部队番号和最近到过哪些地方。但清水更感兴趣的是要这些同志去刺探我军行动。敌人这一手，我们早有所料，于是将计将计，借机杀掉少数十恶不赦的叛徒。这些同志先四处游荡一番，回去就向清水报告某某是通共分子，某某是八路坐探。同时，我武工队也故意“泄漏”此人是我们的内线同志，敌人听后，信以为真，清水立即命令抓来拷问，这些叛徒受不了酷刑，往往瞎编一套自己通共的供词，结果被清水一一杀掉，不费我吹灰之力。

为了有计划地挑选适当人员打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我们还让一批被捕后意志坚强而又有应付敌人本领的同志表面“叛变”，并通过司令部的情报站、政治部的敌工站和地委敌工部三方面配合，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取得敌人的信任和重用，掌握敌伪武装的领导权。以马坊为例，到马坊战役前，“棒棒队”的头目几乎已全是我们的。这正象《红楼梦》中太虚幻境中那副对联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我们通过敌人之手消灭叛徒，又以“叛徒”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既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又消除了我军活动的危险，还为我们最后战胜敌人准备了力量，真是一箭三雕。我们有位对党忠诚，又有才智的同志就是这样打入敌人心脏的，后被清水及山西省伪政府任命为昔阳县“灭共自卫队”政治部主任。

另外我们采取内线诱出，外线捕获的办法消灭了个别敌人特别信任的叛徒。某团有个宣传干事，被捕后叛变，日寇用其所长，任用他到太原一家反动报刊《新民报》当主笔，舞文弄墨，污蔑我军，还挑拨八路军、游击队之间的关系，给我敌后斗争造成了严重恶果。国人察之，皆曰可杀。我们通过太原情报网，摸清了他的活动习性。此人两大嗜好，一是酗酒，二是嫖娼。他进酒家常有日本人相陪，显然不便下手，上妓院虽是单独前往，但周围敌人如麻，捉拿也难成功。因此，就只能将他诱出太原捕获了。一天，几个内线同志将他引入一家酒店，灌得他酩酊大醉后又把他哄进妓院。待他出来时，已经懵懵懂懂，如堕五里云雾中了，内线同志对他说：“我们去郊外玩玩，捉他几个八路回来向皇军请赏。”他听了正中下怀，于是一起搭火车到郊外，骗他在一个小站下了车，被我久候的外线同志就地捕获，押回了根据地，公审后枪决了。此事干得滴水不漏，过了很久敌人才知道。

为了获取日军的重要情报，我们还组织武工队同内线同志配合，专逮日军翻译官。在范村我们逮住一个翻译，当时他在搞不正当的名堂，一时摸不清头脑，吓得颤颤发抖。武工队马上递给他一把钞票，然后要他报告日军情况。顿时，他有点受宠若惊，加上是朝鲜人，对日本人也有仇恨，于是将日军据点的内部情况和盘托出，为我开展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线索。武工队还告诉他，以后审问我们被捕的同志，必须蒙骗日本人，暗中保护抗日人员。对叛徒的供词不能如实翻译给日军。他都一一应允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一九四四年，我太行二分区的斗争形势日渐好转。这时我们开始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到处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按跳蚤”、“啃核桃”、拔据点、炸碉堡、截交通、毁地道，敌

人总是摸不着我们的去向。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因此，许多敌伪组织人员感到黄泉路近，末日在即，都纷纷与我军建立联系，为自己寻找后路，以挽救淹蹇的命运。太行二分区辖区内的敌占区逐渐变成了我军隐蔽的游击根据地。这时，“格子网”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网”中的已不再是我抗日军民，而是一小撮行将就木的日军和一小部分死心踏地的汉奸了。这点就连清水也无可奈何，只得望“网”兴叹，善罢甘休了。这正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终于咬紧牙关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为进行马坊战役奠定了基础。

六

为攻打马坊，我军从一九四三年底就开始调查马坊据点的碉堡、交通壕、电网、地道、窑洞的分布、方位、走向情况，在据点四周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例如夜深人静时观测据点里敌人的动静。另外，我们还在据点附近一步步走动，按黄昏、夜晚、晴天、阴天、雨天、雪天等不同情况，测定声音在什么时候振幅最低，肉耳能听到多远的脚步声，以便在我军行动时将敌人觉察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经过几百次观察和当地老农的经验，在黄昏下雪、北风呼啸时，我军行动的音响最小，且脚印可马上被大雪覆盖。

一九四五年初，太行二分区的斗争形势已由敌强我弱转变成势均力敌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迅速将政治攻势转变成军事行动。这时，旅兼军分区党委及地委拟欲攻打马坊。但如何打法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马坊是日寇经营了近五年的庞大据点，我们没有重武器，如果硬打强攻显然难以攻克。即算打起来，亦会相持不下，敌人援兵一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就要告吹。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组织一支敢死队通过内线策应潜入据点，从里面开花，克敌制胜。同时，让战斗力较强的三十

团埋伏在据点周围，防止敌人外逃；二十九团开赴游击区佯攻，声东击西，虚张声势，造成敌人以为我军意欲破袭铁路的假象；二十八团前往沾尚西南公路两翼潜伏，准备阻击昔阳方向来的援敌。唯独让马坊附近象火山爆发前一样平安无事。作战方案制定后，我们向团以上干部下达了预备命令，准备分头行动。

战前，三十团团团长李德生同志亲自化装成一个憨实的农民，背着一匡鸡旦和山药，由马坊敌工站负责人张喜年牵线，据点内线负责人接应，顺利进入了据点。内线负责同志带着李德生同志向哨兵说：“慰问皇军圣战，一点小意思的干活。”日军丝毫没有怀疑，还连连称赞：“良民，大大的好！”接着进入厨房，由内线同志带领李德生同志熟悉并掌握了日军电台、军犬、信鸽以及指挥所和日军小队长住处的情况。至此，我军攻打马坊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一九四五年三月四日下午，天空时而阴晦，时而放亮，呼啸的北风把空旷大地上的尘土卷得腾空而起，天空浑浊，大地昏沉，这正是一场大雪降临的前兆。下午五时许，天色欲黑还亮，暮霭袅袅，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了起来，整个天空一片朦胧的灰色。小雪很快形成了鹅毛之势，雪片被猛烈的狂风刮得漫天飞舞，大地顿时银装素裹，空气的能见度亦愈来愈低。据点里的敌人见大雪纷飞，寒风凛冽，都龟缩在碉堡里的窑洞中。这时，趁敌人麻痹，天色阴霾，我军一支两百多人的敢死队，个个轻装短火，由李德生同志率领，米乃高同志内应，迅速进入了“棒棒队”住的窑洞中，外面的脚印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了。

我和曾绍山司令员等披着军大衣站在离前沿阵地不远的指挥所里，望着漫天大雪，心中非常激动，想起了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名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兴奋地对司令员说：“今日天公

作美，马克思在保佑我们呵，看来这个仗是稳操胜券了！”司令员也高兴地说：“是呀！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全占了，岂有不胜之理？让我们等待着胜利的消息向刘师长、邓政委报捷吧！”

敢死队进入窑洞同长期潜伏的同志见面后，都十分喜悦，共话战斗生涯，展望胜利前景。大家边吃边喝，好不惬意，除了一些放哨的同志，大家还美美地睡了一觉，养精蓄锐，准备拂晓大显身手。一些战士还风趣地说：“清水经营了五年的据点，我们也能下榻一夜，可谓三生有幸。不过明日它就要从马坊镇上久远消失了。”

翌晨，雪停风住，天空开始放晴。象往日一样，日军全部站立在操场上做祷告，这些残暴的佛教徒一边念经，一边作揖，阿弥陀佛，叽哩哇啦，一片虔诚。但他们那里知道，正当他们祈求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菩萨保佑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敢死队分头行动，各自为战。一部分控制电台、军犬、信鸽，断绝马坊与外界的联系，一部分进入碉堡和指挥所制约敌人火力，截断据点指挥，其余主力全部袭击操场上做祈祷的日军。

立刻，我敢死队员推开通往操场的地道栅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涌而出。日军正顶礼膜拜，沉浸在虚无缥缈的宗教情绪中，手榴弹就在他们中间开了花，继而用短火点射，打得敌人失魂落魄，抱头鼠窜，许多日军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一命呜呼，魂归佛国了。

我据点外的伏兵也异军突起，紧密配合，冲锋陷阵，勇猛杀敌。整个马坊据点一片嘶杀，一片火光，敌人尸首到处横陈，没死的也丢盔弃甲，缴械投降。赤壁鏖兵三个多小时后，日军苦心营造了五年的马坊据点被一扫而平，共毁高约五丈，

墙厚八尺左右的大型碉堡四座，俘虏日军小队长等五人，日伪特务十余人，其余敌人全被击毙，缴获了机枪、步枪、弹药、电台等大批军用物资。下午打扫战场时，还获得了一大批板米、罐头、被服等战利品。可谓毕其功于一役。黄昏，我们迅速撤离了马坊。与此同时，我二十八团在沾尚与马坊之间的公路上，截获了一批日军运往马坊的军火粮秣。至此，敌人仍不知道马坊已经失守。这样我军不但拔掉了马坊据点，解除了我二分区的心腹之患，还一举光复国土四百平方里。

第三天，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报导了这一辉煌战果，并发表了《庆祝马坊大捷》的专题社论。同时，新华社转发了这一消息，全国各地报纸也纷纷转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心。

这里还有一个尾声。马坊大战后的第三天，日军才匆匆从寿阳、榆次、太谷兵分三路进军马坊，当敌人看到马坊据点断壁残垣，尸首狼籍，已变成一片废墟时，无不感到日暮途穷，大势已去，都无意再守，悻悻而归了。

过了一个星期，被俘的日军小队长因伤势过重死了。我们买了一口上等棺材，将他装殓好，素车白马送往日军榆次长凝据点，还附去一封日文信：“……我们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是没有仇恨的，可惜你们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到中国来侵略，残杀我无辜百姓……小队长先生因战负伤，治疗无效，于前日升天。现尊重贵军习俗，将尸首送还殓葬，以慰亡灵，……。”日军看了无不感动，以盛筵款待我护送人员，并以酒酬谢。从此，长凝据点的日军再没有在附近扫荡了。

马坊大捷后，我军还乘胜破袭正太铁路线。由杀敌英雄、侦察处长赵恒德同志率领武工队和寿阳独立营在寿东炸毁铁路一段，翻毁火车一列，活捉了山西省伪教育厅顾问、日军少将铃木传三郎等多人。并缴获了一大批战利品。至此，我太行二分

区的抗战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调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后，一次，陪刘伯承司令员乘马车去陇海战役前线途中，提起马坊大捷，他幽默地对我说：“你的疑虑早该消除了吧！好好回顾一下，当时是怎样恢复根据地的？怎样获得马坊大捷的？”我说：“全靠师长启发，群众支持啊！”的确如此，“百团大战”后，我太行二分区抗战形势由极端恶化到逐步好转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都闪烁着刘伯承同志军事思想的光辉吗？”

时过境迁，一晃过去了四十个春秋。解放后，我虽然再没有去过太行山，但每每当我想起那些可歌可泣的往事，回忆起那些终生难忘的战斗岁月，又仿佛置身于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太行山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



对《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中 汤弼中同志一文的订正意见

张季任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第125—140页汤弼中同志所写的《我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的几件事》一文中的第八节“为三五九旅南征开路当说客”，叙述的是他奉地下党的指派到宁乡田坪里说服何际元通知他的部队，让开一条路，使三五九旅顺利通过湘中前赴广东进行南征的经过。文中对何际元的部队三次称“忠义救国军”；对何的办事机构三次称“司令部”；对何的职务八次称“司令”。这些都是搞错了的，影响所及，在《株洲文史》第三辑第230—235页陈蔚农、汤大莎两同志所写的《汤弼中游说“忠义救国军”为三五九旅开道》一文又七次称“忠义救国军”，十九次称“司令”，以讹传讹，失去真相，有必要提出订正意见。

何际元部队的番号叫“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四纵队”，是一支军统特务武装；何际元的职务叫“指挥”，人们当面称呼他为“指挥官”，不是“司令”，因此他的办事机构叫“指挥部”，而不是“司令部”。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武装名目繁多，其中有两支主要武装力量：一支叫“别动军”，一支叫“忠义救国军”，都在重庆设有司令部，别动军司令叫周伟龙（抗战胜利时由徐志道改任），忠义救国军司令叫马志超，一九四六年三月都改编为交

警部队，徐志道、马志超都被委充交警总局副局长。原来别动军有七个纵队，纵队的头头叫指挥，不叫司令，何际元是别动军第四纵队的指挥，根本不属忠义救国军，也不叫司令。

我想发生以上错误是有原因的，抗日时期，国民党的部队都有一个代号，如彭位仁的七十三军代号叫“大庸”，王耀武的七十四军代号叫“辉煌”，而何际元的别动军四纵队代号叫“正义”，因“正义”与“忠义”字音相似，可能他们就误将何际元的部队说成为“忠义救国军”，

基于以上情况，特提出订正意见，以供研究史料的同志参考。

对邓晏如同志《忆塘田战时讲学院》一文的几点补充和更正

罗 余

阅《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其中有邓晏如《忆塘田战时讲学院》一篇。文内记述甚为详尽，但由于年代久远，可能记误，在个别地方与事实稍有出入。兹将我所知道的写在下面。

一、塘田战时讲学院院歌中有“实行抗战建国的主张”一句，文中将“建国”误为“救国”。又：“同学们，起来”，原歌词是“同学们，齐心”（见该辑第26、27页）。

二、讲学院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招的研究班只有一个班，即研究一班。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招的研究班原只一个班，后因人数较多，程度不齐，乃通过分班考试，把这个班分为两个班，即研究二班和研究三班，同现在的同一班分成快班、慢班情况差不多（见该辑第27页）。

三、研究二班和三班的课程，没有“中山学说”这一门。邓文中写的“文艺（选修）”课，原为“文学常识”，并非选修，另外还有“习作”课。当时的讲义，有的是老师自编的，如吕振羽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王西彦的《文学常识》，也有利用别家著作作讲义的，如李仲融教哲学，用的课本是沈志远著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见该辑第27页）。

以上这些，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并向省教育厅谭绍黄同志

（研二班的同学）征求意见，他也认为是这样的。事情虽小，但为了尊重历史事实，特提出供参考。另外在第25页有“三民主义教师廉叶（国民党派来的）”一句。对廉叶这个名字我还记得，至于他教什么课，政治背景如何，则已忘记。最近我看到魏方在一份关于《今天十日刊》的材料里，提到其中副总编辑叫廉士聪，在刊物停办后携带一批马列书籍去塘田讲学院教书。《今天十日刊》常有廉叶的文章，而塘田讲学院的老师中就只有一个姓廉的，廉士聪和廉叶是不是一个人？如果是，那到底是不是国民党派去的？这是值得慎重查明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派去的倒还罢了，如果不是派去的，那么这样一写，对一个人的政治影响是很不好的。这只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供作者参考。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六年改为季刊出版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过去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以书号形式作为丛书出版、新华书店内部发行。一九八五年九月，经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同意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改为期刊，并发给了期刊登记证第125号，以杂志形式出版，由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自办发行。今年拟出版两辑，一九八六年将作为季刊出版四辑。今后读者如需订阅和购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请直接与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发行组联系（地址在长沙市迎宾路5号）。

每辑定价1.25元，另加邮杂费0.12元。 （高）

